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 伟	朱 民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 祥
张卓元	陈 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高尚全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樊 纲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郑新立
副主编：王晓红

• 本刊专论 •

创新设计与中国创造	路甬祥 (005)
关于“十三五”规划要研究的十个重大问题	杨伟民 (012)
对我国当前通货紧缩压力的分析和对策建议	李德水 (020)

• 宏观经济 •

中国外汇储备及其运用的战略思考	陈炳才 田 青 陈安国 郑 慧 (025)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分析和展望	刘翔峰 (038)

• 国际经济 •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发展新趋势	白津夫 刘中伟 (058)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 应对“竞争中立”规则	冯 雷 汤 婧 (073)
人民币国际化回顾与新常态初期展望	王冠群 (084)

• 产业发展 •

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的协同策略研究 吴维海 郭慧文 (099)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17)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3)

• 英文摘要 (ABSTRACTS) • (131)



CONTENTS

Innovative Design and Created in China	<i>Lu Yongxiang</i> (005)
On the 10 Key Issues concerning the 13th Five – year Plan	<i>Yang Weimin</i> (012)
Analysis on Deflationary Pressure and Countermeasures	<i>Li Deshui</i> (020)
Strategic Thinking on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nd Actual Utilization	<i>Chen Bingcai , Tian Qing , Chen Anguo , Zheng Hui</i> (025)
Analysis and Outlook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	<i>Liu Xiangfeng</i> (038)
New trends in Services Produc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Bai Jinfu , Liu Zhongwei</i> (058)
Vigorously Develop Mixed Ownership for the Response to “Competitive Neutrality” Rules	<i>Feng Lei , Tang Jing</i> (073)
Review on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itial Stage Outlook of New Normal	<i>Wang Guanqun</i> (084)
On the Collabor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Smart City and Energy Saving Industries	<i>Wu Weihai , Guo Huiwen</i> (099)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7)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3)

创新设计与中国创造

路甬祥

摘要：通过回顾工业时代设计创新推动产业革命的历史，阐述了知识网络时代的创新设计（设计 3.0）的时代特征，以及创新设计推动引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的重要作用，并对提升中国创新设计能力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创新设计 设计 3.0 中国创造

作者简介：路甬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流体传动与控制专家。曾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英文 Design 一词源于古拉丁文 Designare，意为构思、计划。古汉语“设计”，是“设”与“计”的合词。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设”为“施陈也”，“计”即“会算也”，其基本含义是设想、运筹、规划和计算。就本质而言，设计是人类对有目的创新实践活动的创意和设想、策划和计划，是技术装备、工程建设、经营管理、商业服务和应用创新的先导和关键环节，是将信息、知识和技术转化为集成创新和整体解决方案，实现应用价值的发明创造和应用创新过程。设计创新不仅推进了农耕文明，而且曾引发产业革命，推动了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的进程。在现当代，人们不仅致力于设计创新产品，而且也设计创新工艺与装备，设计创新经营管理和商业服务模式。知识网络时代

的创新设计呈现新的特征，将引发新产业革命，也必将为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发挥引领作用。

一、设计创新与产业革命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设计创造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在延绵数千年的农耕时代，人们主要利用天然材料、依靠劳动中积累的经验传承和个人的创意创造，采用手工艺制作方式，设计制作了诸多精美陶瓷铜器、金玉礼器、兵刃胄甲、器皿傢俬、棉麻丝锦、服饰冠靴、房舍殿寺、园林美景等。中国古代火药的发明以及火冲、烟花的设计应用，造纸术的发明以及手工造纸工艺流程的设计，丝绸的发明以及缣丝工艺和提花丝绵织机的设计与应用，瓷器的发明以及瓷器制作工艺流程和瓷窑的设计，造型简洁、结构严谨的明清傢俱设计和精湛的制作工艺等，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以及明代设计制造的郑和出海远航的宝舡大船，明清时期设计建造的北京故宫建筑群及其丰富的宫廷珍藏，集中国古代设计精萃于大成，……等等，使得我国设计和工程技术走在当时的世界前列，并经由古代海上和陆地丝绸之路传播至东南亚、中亚和欧洲等地，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等也曾涌现诸多各具特色的重要发明和设计。但是由于在人造材料、能源动力、工作机器等生产力关键要素等方面没有取得创新突破，因而未能引发产业革命。18 世纪中叶，由于蒸汽机、纺织机械、金属切削机床、火车、轮船等机械设计和发明以及煤的开采利用、钢铁冶金技术和规模生产等，引发了第一次产业革命，英伦三岛崛起为“日不落帝国”；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由于电机电器、电力系统、汽轮机、内燃机、燃气轮机、汽车、飞机、核电等发明，机电设计和发明，以及合金材料、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材料等发明和规模生产等，引发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了电气化核能时代，德、美、日相继崛起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上世纪 20 年代兴起的工业设计提出“设计为人”，倡导技艺结合，功能与美学、经济相协调，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20 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发明了半导体三极管，设计了硅基电子功能材料和光刻工艺装备、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数控机床、商用机器等，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以数字化、机械电子一体化和柔性制造为特征的后工业时代，美国引领导了电子信息技术创新和微电子、计算机产业发展的进程，德、日、韩等国也在机械电子装备设计制造、消费类电器设计制造等领域形成了优势。

以设计促进产业创新是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共同战略。美、德、日、英、法、韩等工业化国家始终高度重视设计对产业创新的作用，纳入国家创新战略。德国早在 20 世纪初就确立了“设计定标准，设计定质量”的战略，从而铸就了德国制造品质和奔驰、宝马、

大众、西门子、博世等世界名牌。1969 年日本政府先后成立“设计行政室”和“日本产业设计振兴会”，推动设计产业蓬勃发展，使日本产品质量和品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快速提升。法国从戴高乐时代起，就在关系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的重要领域，坚持自主设计研发核电站、航空航天、高铁、核潜艇等装备并形成了产业优势。1998 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发表《21 世纪设计时代宣言》，宣告以三个“五年计划”实现设计立国，推动了三星、现代、LG、蒲项等企业创新，造就了韩国制造业的崛起。

新世纪，人类进入知识网络时代，形成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技术与市场环境，设计呈现出与工业时代不同的新特征，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果将农耕时代的传统设计定义为设计 1.0，工业时代的近现代设计定义为设计 2.0，那么，我们可将知识网络时代的创新设计定义为设计 3.0。

二、全球知识网络时代的创新设计——设计 3.0

全球知识网络时代，宽带网络将世界连接成为一体，信息知识大数据成为最重要的创新资源，全球宽带网络、智能交通物流、云计算、云存储等成为设计最重要的创新基础设施。全球市场多样化、个性化物质与文化需求持续增长，以及资源环境压力、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发展理念的进化等，推动了设计创新价值理念的进化。

知识网络时代的设计将具有绿色低碳、网络智能、超常融合、多元优化、共创分享等特征。知识网络时代的设计制造、运行服务、经营管理，不仅处于物理环境中，还同时处于全球信息网络环境中；设计制造和服务更依靠人的创意创造，依靠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人文艺术、生态环境等知识信息大数据和全球网络；设计制造从工业时代注重产品的功能和成本效益，拓展为注重包括制造过程、营销服务、使用运行到再制造等全生命周期的资源高效利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人文艺术等综合协调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转向多样化、个性化、定制式、更注重用户体验的设计制造和服务。宽带网络、信息开放获取、云计算、虚拟现实、3D+X 打印与精确成形与处理、智能物流等技术创新，为设计创造了全新的自由开放、公平竞争、全球合作环境，设计更加自由，奇思妙想的设计能被制造出来；设计与研发、制造、应用、服务相融合，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发展成为全球协同、共创分享的网络设计研发、制造和营销服务，制造者、分销商、运行服务商、用户乃至第三方“创客”皆可共同参与设计创新。知识网络时代的设计是人人可以自由参与、公平竞争合作、共创分享的创意创造；知识网络时代的资源能源开发利用将转向绿色低碳、智能高效、可再生循环、可持续利用，设计创造的重点领域将是绿色材料、超常结构功能材料、可再生循环材料，以及具有自感知、自适应、

自补偿、自修复功能的智能材料等，将设计创造多样的增材与减材、绿色低碳工艺与智能装备；空天海洋、深部地球、运载物流、化工核能、新能源、生物医学、微纳系统等超常环境、超常功能、超常尺度装备成为创新设计的新领域和新目标；计算机辅助设计也将发展成为基于全球网络、大数据和超级计算的数字虚拟现实，多元优化，超算分析、控制管理等操作系统、工具软件和嵌入式应用软件的设计创新成为竞争力和附加值的核心要素，并由此催生了以大数据分析、设计计算、虚拟制造、软件和服务增值为核心的网络设计制造、软性设计制造新业态；设计研发将融合物理、化学、生物与仿生、材料、工程技术、软件和计算等多学科、跨领域的系统集成创新，将融合理论、实验、虚拟现实和大数据等科学方法。

其实，设计的转型变革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已经开始。主动引领、积极顺应这一变革的企业得以强势崛起、超常发展，反之则衰落淘汰。比尔·盖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认识到，只要能设计开发一款界面清晰，简单易用的操作系统，便可将计算机变得人人可以使用。1981 年，微软与 IBM 签约，盖茨领导开发了适用 PC 的 MS-DOS 操作系统，后来发展成 Windows，还开发了办公软件 office 和浏览器 IE 等，曾占居全球个人电脑软件市场的 70% 以上的份额；1999 年微软创下 6205.8 亿美元市值，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IBM 因只专注于发展商用计算机和服务，失去了个人电脑和操作系统软件的巨大市场。1997 年乔布斯重返苹果公司，领导推出 ipod、iphone、ipad 等移动智能终端创新设计，引领了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新潮流。2012 年 8 月 21 日，苹果以市值 6235 亿美元超越微软列全球股市第一，而且创造了基于 iOS 操作系统和 APP Store、iTunes 等共创分享平台，推动了移动互联网金融、网络物流、网络零售、网络娱乐等新兴业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娱乐方式。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等企业曾不乏卓越的手机设计，也曾是移动通讯产业的领军者，但未能抓住网络智能终端的创新设计而衰落。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新型传感技术，通过“引擎健康管理”网络服务的创新设计，赢得了全球大型发动机 50% 的市场份额。波音 787、空客 A380 等都是采用全球网络协同设计的成功案例。

三、创新设计与中国创造

经过 30 余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大国，但发展主要依靠高要素投入、低成本优势，以及引进资金、技术、装备和管理，付出了巨大资源环境代价。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未来 5~10 年将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经济升级版、迎接世界新产业革命挑战的关键时期，但我国多数企业主要依靠代工生产和仿制，

创新设计能力薄弱仍然是制约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跃升的主要瓶颈。提升创新设计能力，对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实现创新驱动、跨越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创新设计是实现从跟踪模仿到创造引领的关键环节。创新设计是产品和产业创新链的起点和源头，不仅能提升产品的功能、品质、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还可以创造和引领新的市场和产业。我国载人航天、北斗导航、嫦娥奔月、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特高压直流输电设备等依靠自主创新设计系统集成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成为我国重大工程技术装备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标志；中车集团、中铁工程设计院等通过自主设计研发实现了我国高铁工程系统的集成再创新，使我国高铁运行和建设里程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高铁产业的领跑者。小米公司选择高性价比市场定位，依靠自主创新设计体验卓越的用户界面、独具一格的硬件设计和营销策略，仅用了三年时间，2014 年全球销售突破 6112 万台，成为国内外米粉们追捧的智能手机品牌。我国汽车业因过度依赖技术引进和合资，自主设计、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缺失，虽是全球乘用车产销第一大国，却形成了外资以 40% 的资本、占据了 50% 市场份额、攫取行业利润 70% 的被动局面。

创新设计是推动制造业实现“三个转变”的重要抓手。创新设计通过创意创造，集成信息、知识、技术和服务，推动制造业实现由设计研发到制造服务的全产业链的创新变革，引导企业从 OEM 向 ODM、OBM、OSM 转变，是我国制造业摆脱“微笑曲线”底端困境、实现价值链攀升的关键。华为公司致力坚持创新设计先进通信产品和系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从一个后起的中低端通信设备生产商发展成为先进通信装备、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和智能用户终端的提供商，不仅进入世界 500 强，而且名列“全球创新竞争力百强”和“全球百强品牌”。格力公司坚持以创新设计主导技术、产品、管理与服务创新，家用空调产销连续 7 年居世界之首，成为享誉全球的名牌。宁波太平鸟、青岛红领等服装企业运用互联网和创意创新设计实现全球个性化定制、网络经营，实现了销售和利润的逆势大幅上扬、品牌增值，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增效的范例。

发展创新设计是把握新产业革命机遇的必然要求。当前，以信息、能源、材料、智能制造、生物等技术为主导的新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将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革的引擎。大数据、云计算、全球信息物流、3D 打印等全新的信息网络—物理环境催生出创客、众包、众筹及个性化、定制式设计制造、网络设计制造、软性设计制造与服务等新业态，开启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时代。美国政府为了巩固全球创新优势地位，2013 年投资 3.2 亿美元成立“数字制造和设计创新研究院”，2014 年奥巴马

总统宣布每年投入 25 亿美元推动“创客”发展。2011 年欧盟成立设计领导力委员会，制定面向未来创新设计的《欧洲非技术性创新与用户创新联合计划》，并颁布《为发展和繁荣而设计》纲要。2013 年德国政府在《德国工业 4.0 战略》中，把适应网络智能制造的软件、系统等创新设计作为关键环节。日本致力发展无人工厂和协同机器人，力图抢占网络智能设计制造的先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微软、英特尔、苹果、谷歌等一批 IT 及互联网企业依靠创新设计，长期占领 PC 操作系统、CPU、商用计算机与服务器、移动智能终端、搜索引擎等全球市场的主导权，引领了全球相关产业创新发展的潮流。抓住创新设计才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立于不败之地，面对新产业革命与我国发展方式转型交汇的难得机遇，我们应当通过创新设计引领带动关键产业领域变革升级，抢占知识网络时代的先机，成为高端设计制造服务和新兴产业的领跑者。

创新设计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新设计推动了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上世纪 70 年代末，波音公司通过创新设计和系统集成，仅耗时 28 个月就研制出载客量大、航程超长的波音 747，纵横蓝天 40 余年，成为各国民航大型跨洲客机的首选。据美国设计管理协会 2013 年发布数据，福特、微软、耐克、可口可乐等“以设计为主导”的企业，10 年来股市市价表现高于标准普尔指数 228%。阿里巴巴公司创新设计了独特的电商信用体系和多元化大数据平台，形成了淘宝、支付宝、余额宝、菜鸟等新商业模式，成为全球电商领导者，上市市值达到 2480 亿美元，一度超过亚马逊和 e Bay 的总和，为亿万国人提供了网络商务、创业和融资的新模式，促进了相关产业信息化、网络化的进程。深圳大疆公司集成无线传输、GPS、高性能航空摄影平台、模块化硬件、嵌入式控制软件等技术，创新设计四轴消费应用无人机，通过网络营销方式，近 5 年营收增长近百倍，成为全球同行业的领军者，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 2014 年全球十大科技产品的第三位。

提升我国创新设计能力，应实施“重点突破、支撑引领、开放融合、以人为本”总体战略。通过创新设计探索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创造强国之路，重点突破设计软件等共性关键技术，在重点产业领域实现创新跨越，提升产品及工程系统、工艺装备、经营服务等创新设计能力。通过创新设计全面提升自主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两化”融合，迎接全球知识网络时代的新产业革命挑战，支撑引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国防安全保障能力，实现富民强国的中国梦。开放融合全球先进设计理念、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推动跨地区、跨产业、跨学科融合发展，形成面向产业、和谐包容的创新设计服务体系，推动中国设计走向世界。依照用户需求驱动创新设计发展，大力培养创新设计人才，以人为本，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将人口红利转化为创新红利，支持推动向中国创造转变。

——提升重点产业领域的创新设计能力。通过创新设计提高关键技术创新、系统集成创新、服务模式创新的能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在传统制造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实施创新设计示范工程，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设计能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拥有自主品牌的世界著名企业。

——利用创新设计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创新设计提升钢铁冶金、纺织服装、家用电器、建筑建材、能源电力、交通运输、公共安全与国防等工业的装备制造、系统集成和服务水平，实现从产量规模到质量效益、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变，支撑“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从输出产品到输出系统和服务的转变。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创新设计。重点提升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智能电网、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大数据应用、云计算、软件、互联网、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的创新设计能力，推动业态创新，加速形成国际竞争优势。

——推动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领域的创新设计。重点提升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社会管理与服务、生态与环境等领域的创新设计能力。创造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和装备支撑体系，建立先进设计规范 and 标准，提高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社会服务的保障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能力。

——加强设计共性关键技术的创新。发展信息化设计与过程集成的设计、复杂过程和系统设计等共性技术；强化绿色低碳、网络智能、个性与定制化、商业模式、服务和品牌设计等关键技术。自主研发用于智能产品、智能制造、智能管理及大数据挖掘等领域的设计工具、云计算、虚拟现实、智能控制、操作系统和嵌入式应用软件等。

——建设完善创新设计生态系统。制定创新设计发展产业政策，设立创新设计基金，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媒用金协同的创新机制；建立以市场应用为主要依据的创新设计竞争力评价指标，完善创新设计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各类创新设计教育，促进国际交流，构建创新设计人才体系；培育建设质量第一、用户至上、创新引领、诚信合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设计文化。

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产业发展实践表明，必须强化设计在产业创新链中的关键作用，把创新设计作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家“十三五”和中长期发展规划；通过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完善支持保障措施，制定创新设计行动计划，促进产学研合作，着力提升企业创新设计能力，加快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

(下转第 24 页)

关于“十三五”规划要研究的 十个重大问题

杨伟民

摘要：“十三五”规划不仅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收官规划，而且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第二个 35 年发展开启航程的规划。本文提出，在“十三五”规划中必须回答如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何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如何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如何改变传统发展方式、如何扩大国内需求、如何推进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如何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如何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如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如何扩大对外开放等十个问题。

关键词：“十三五”规划 新常态 目标 改革

作者简介：杨伟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十三五”规划非常重要，不仅是一个收官规划，而且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第二个 35 年发展开启航程的规划。以下十个问题是在“十三五”规划中必须回答的。

一、如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十三五”规划最大的特点就是收官规划，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在 2020 年前完成，这是研究“十三五”规划面临的最

大挑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之下，有若干方面的目标或指标，包括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工业化基本实现，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等等。此外，还要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十三五”规划，要清晰地告诉市场、企业、人民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是什么，现在期望值似乎太高，没有理解什么是全面小康；第二，实现路径是什么，哪些重大方针政策必须坚持、毫不动摇，以稳定社会预期，同时有哪些新思想引领下的新思路、新措施，以增强信心，动员人民去努力做，而不是去争论。

二、如何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中，有两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硬目标，即到 2020 年 GDP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过去的高速是确定的，即 GDP 增速为 10% 左右（1979 年—2014 年 GDP 平均增速为 9.8%）。但中高速是多少还没有确定，这就带来难点。一方面，现实的、客观的、常态化的增长率尚未确定；另一方面，完成 GDP 十年翻一番的底线是确定的。

从总供给、总需求、劳动力、储蓄率等增长的基础条件看，实现 GDP 翻一番的潜在增长率是足够的，但要把潜在增长率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长，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就国内看，最主要的是三件事：经济体制的深刻改革、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入转变。

三、如何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

党的十八大确定的数量指标还有城乡居民收入十年翻一番。“十二五”规划提出“两同步”“两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十二五”前四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改变了过去经济增长普遍快于居民收入增长的现象，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得到了改善，居民收入比重提高，企业收入下降，政府收入小幅上升。这是一个好现象，但这一好势头是不是一个趋势性变化，“十三五”是否会继续延续，取决于分配政策的调整力度。

一是实现居民收入中高速增长，比 GDP 中高速增长更重要。若居民收入增长大幅下滑，很可能使发展方式回到投资驱动的旧常态，并给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日本近些

年经济几乎零增长，但居民收入年均增长 2%，所以社会很稳。要研究如何继续深化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一方面，要适度降低企业主要是金融和垄断行业盈利占国民收入比重；另一方面，要稳定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再提高。近几年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仍在提高，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要澄清一个概念，政府收入不等于财政收入、不等于税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原则是“稳定税负”，这是对过去以提高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为目标的财税改革的一个重大修正。财税体制改革，包括社保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有关涉及政府投入的改革，都要坚持这一原则。这不仅影响分配格局，还影响着我国的竞争力，影响着制造业未来的前途。

二是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更快一些，这比居民收入的平均增长更重要。要在普遍提高居民收入过程中，逐步缩小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收入差距近年来有一定幅度的缩小，如城乡差距，但还不够。特别是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且还在扩大，这是不应该的。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抑制垄断性行业收入不合理的过快增长。《改革内参》曾介绍，2012 年金融业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9 万元，周工时 41.9 小时，而住宿餐饮业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3 万元，周工时 51.9 小时，后者收入仅相当于金融业的 1/3，工时却多 10 个小时。小时工资差距是否过大了？

四、如何改变传统发展方式

如果发展方式不变，速度高不一定是好事居民收入增长也不会快于经济增长。十八大提出“两个翻番”是有前提的，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如果传统发展方式没有转变，即使实现 GDP 翻番，也不应该说实现了十八大的目标。相反，如果发展方式转变了，而 GDP 没有实现翻番，也可以说实现了目标。

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全面改革，所以也可以叫改革发展方式。十八大确定的转变发展方式任务，需要在“十三五”规划中细化，找到发展方式背后的、下一个层面的、适应旧常态的做法，这样改革对象才能清晰，才能知道改革到底要改什么。如，过去一些地区把全面小康理解成本地人均 GDP 要达到全国水平，为此倒推一个增长速度，再倒推一个投资增速，然后围绕投资找项目、找资金，举债建设、卖地融资，而不管项目有无回报，借的钱能不能还上。再如，实现工业化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全国国土空间布满工厂吗？过去，各省、市、县，甚至乡镇，都要实现工业化，所以才有不计代价招商引资，有什么资源就挖什么资源，对本地企业采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电价优惠，企业要什么就答应什么，导致全国性产能严重过剩，培育了大量“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资金、

资源，全国性结构调整屡屡落空，资源配置效率很低。还有，各地区、各级行政区都要实现城镇化，盲目扩大城市面积、靠房地产推进城镇化、靠城乡一体化扩大建设用地，而不管人从哪里来，也不让外地打工的人落户，用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的高价，补贴工业用地的低价，补贴市政服务的低价，导致房价畸高，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过高。各部门也有很多旧常态的旧做法，比如到处搞试点、发帽子，与各地区签订战略合作，建设形形色色的试验区、先行区、示范区，区域规划满天飞，房价上去了、本地概念股上去了，真正要做的实质性改革、区域统一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却没有多少进展。总之，过去违背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做法，适应旧常态的发展方式，还有很多，都要改革。

五、如何扩大国内需求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不是供给不足，当然供给也有结构性失衡，有些领域严重过剩，有些领域潜在需求很大但供给不足。过去的规划是生产性规划，重点是规划 GDP 增长多少，内容主要是各产业向哪个方向发展、发展到何种程度。“十一五”“十二五”有了很大转变，开始重视需求从哪里来。“十三五”规划，应该更加重视如何扩大和挖掘需求潜力，把潜在需要变成现实拉动增长的需求，同时重视通过创造新供给，满足和引领新需求。

从消费看，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重视培育了几个全国性的、排浪式的消费热点，这是必要的，但今后要更加重视培育新的消费群体。80 后特别是 90 后农民工是一个潜在的新消费群体，是今后城镇住房、汽车等商品的重要消费群体，但若制度不明、政策不畅，没有稳定预期，这些消费就不能释放，所以要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从投资看，仍是“十三五”时期稳增长的关键，消费还不能取代投资的作用。关键是投资不要形成无效供给、过剩产能，应该投到最终消费的领域、激发新增长点的领域，并带动消费扩大。投资仍有很多空间，其中公共性更强的领域和分散性、创新性更强的领域空间更大，比如城市地下管网、环境整治、生态修复、农村公用设施，这些领域没有稳定的税收支撑或直接融资渠道，土地财政、贷款修路等投融资机制明显不适应。再如，新产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依托互联网的创新，包括商业模式、产业组织、个性化制造、新的分工网络、工业 4.0、跨界创新、分享经济等等。而我们现行的银行体制、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机制等，只是适应于传统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也适应过去的科技创新，但不适应这些新的创新活动，必须创新投融资机制。

六、如何推进经济结构深度调整

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重要判断：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同其他时期的五年规划相比，“十三五”规划更应该像一个具有调整意味的规划，既要重视扩大增量，也要重视调整存量，“补短板”与“裁长板”并行，既要补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如扶贫、教育、医疗等“短板”，更要截去一些方面的“长板”，“去产能”“去杠杆”“去债务”“去泡沫”，这些都是“裁长板”。“裁长板”的事解决不好，不仅发展的质量不高，还很可能引爆经济风险。美国经济最近复苏强劲，但美国为此付出了代价，在市场机制下，对存量进行了调整，比如工业增速一度跌到 -15%，产能利用率跌到 63.7%，同时，破产企业申请案件从危机前的 11.6 万件飙升至 42.2 万件。这种调整，为美国经济的持久复苏扫清了一些障碍。我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在乎了速度的率先企稳，但存量调整、“去产能”等做得少，如存在大量“僵尸企业”，成为继续前行的包袱。

七、如何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过去的城镇化速度很快，但那是健康、质量不高的城镇化。城镇化中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中央城镇化会议讲了人、地、钱、布局、建设、管理等六个问题，但核心问题是人。中央已经明确，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但目前落实进度很不理想，特别是对跨省流动的 7000 多万农民工没有政策考虑。中央也要求做好中央与地方的分工，但现在分工还不是很清晰，需要中央政府统筹解决，并与土地、户籍、社保、教育、住房等统筹研究。若这件事没有进展，还是就业进城，没有人口进城，将带来三个问题。一是“十三五”时期的城镇化率将大大放缓。过去，城镇化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农民工的增长速度。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年负增长，农民工增长速度必然放缓。上世纪 90 年代农民工年均增长 15%，新世纪头十年大概是 6%左右，2012 年是 3.9%，2013 年是 2.4%，2014 年降到 1.9%。农民工中，外出农民工增长更慢，只有 1.3%；年龄结构中，40 岁以下的比例大幅降低。按照这个速度降下去，“十三五”时期，是否会遇到农民工零增长局面，是否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使命行将结束？二是住房的刚需难以释放，房地产将难以启动。因为房地产的刚需是农民工市民化，现有城镇人口的住房需求主要是改善性的。三是由于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主体，在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 68%、在建筑业占 80%、在第三产业占 52%，农民工不能有效市民化，不仅关系今后房地产等消费需求扩大，更严重的局面是今后“谁来务

工”？而且，农民工流动来流动去，不涨工资明年就不来了，有些岗位出现新的“脑体倒挂”，虽然有助于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但又带来削弱竞争力问题，外资不愿流入甚至逃离，国际市场份额保不住，会加剧产能过剩矛盾，制造大国的地位面临很大压力。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认识还需深化，要看得长一些，考虑更周全一些。

八、如何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

新世纪以来，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出发，提出了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总体战略，同时从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角度，提出了主体功能区战略，在三中全会上升格为主体功能区制度。后来制定了一大批“一省一策”的区域规划，应该看到，在执行这些区域战略和规划中是有成绩的，比如增长速度出现逆转，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增速快于东部，区域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居民收入等方面的差距开始缩小。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盲目投资带来产能过剩，中西部地区产能利用率普遍低于东部地区，无序开发加剧了水土资源短缺、生态破坏、污染加重等。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提出水治理要转变思路，其中一个空间均衡原则，实际上空间均衡原则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布局都适用。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区域，都要按照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三者均衡的原则推动发展。很多区域“一方水土养不富一方人”，不得不促进人口转到承载力更高的地区。有些区域超出水资源承载力后，就要大范围调水，但对调出地区带来一些影响；有些区域开发强度过高，生态空间不足了，就会加剧雾霾光临的频率和程度。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个新概念，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实际上就是根据空间均衡原则，把空间结构调整作为重要任务，合理确定城市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等三类空间的比例。960万平方公里国土，有些是经济发展的空间，高密度集聚经济和人口；有些就是生态空间，不是集聚经济和人口的，而是集聚山水林湖的空间，是东北虎、大熊猫的空间；有些空间是集聚农产品生产的空间。后两个空间不是没有人，而是人口和经济低密度，农产品和森林、湿地、湖泊高密度，它们不是城市化地区。调整空间结构，要允许生态为主、农产品比重大的地区增长速度低一些，要支持北京、上海这类需要优化开发的城市地区增速低一些。同时，发展速度高一些的地区吸引了外地人口就业，就要促进外省务工的人定居，变成本地区、本市的新市民。这样，分子、分母以及中央的财政转移共同发力，区域之间人均收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差距才能缩小。

九、如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资源不足、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形势十分严峻，甚至某些方面还在恶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同时，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比如北京市民肯定更喜欢“APEC 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出发点就在这里，不是让这个区域再大开发、大发展。

“十三五”时期应该成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拐点，即从此以后应该好转，而不是继续恶化，甚至包括某些资源的消耗也应该达到或接近峰值。污染物排放总量能否达到峰值？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已经实现了总量下降，“十三五”时期，还要使一些污染物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同时，生态要得到改善，水土流失面积及荒漠化、石漠化总面积应该减少，森林、湿地、湖泊等绿色生态空间面积应该扩大，水源涵养能力应该提高等。

如何实现这种根本性的转变？第一，发展理念要改变。按照十八大要求，树立尊重自然、生态产品、空间均衡、承载能力、空间结构、主体功能、开发强度等理念。第二，发展方式要改变。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第三，治理体制要改变。生态环境治理体制要从重点建设生态、治理污染物，转向有效约束人的开发行为。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人类对自然无度无序没有底线开发的结果，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人，不在自然。重视加强防洪设施建设、地质灾害治理，治理水土流失、土地整治、生态建设等等都很重要。但关键是要纠正人的行为，破坏自然的事根本就不做，这样才能在源头上防止，而不是出了问题再来补救。避免一只手在修复，一只手在破坏，两只手都在花钱，若修复赶不上破坏，就要永远花钱，GDP 会增长，但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提高。

十、如何扩大对外开放

要防止一种倾向，认为中国 GDP 世界第二，制造业第一，货物出口第一，外汇储备第一，增长速度在大国中也是第一，该开放的差不多都开放了，不用继续扩大开放向别国学习了，不用扩大开放引进了技术管理了。如果自豪过度，就变成了自满。实际上我们与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差距还相当大，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尽管总量、规模上看起来很了不起，但产品的质量、生产效率（资本回报率、劳动生产率）、企业管理、技术工艺、能耗排放、品牌价值等方面的差距还相当大。

为什么最近国人到日本抢购价格远高于国产的日本品牌电饭煲、马桶盖呢？不是因为便宜。我们过去靠低价的竞争优势，世界到处都是中国货，但价格优势是最容易转化

的。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再工业化”，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恢复，而这期间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却在减弱。《改革内参》刊载的一篇报告提到，浙江某企业在中美生产同一产品，我国吨财务成本是美国的 2.5 倍、电力和蒸汽成本是美国的 2.2 倍、配件成本是美国的 3.2 倍；原料进口清关和成品出口清关成本美国是零，我国每吨分别是 28 美元、12.9 美元；人工成本美国是中国 3.6 倍、折旧美国是中国的 1.7 倍。综合起来，在不包括主要原材料成本、用地成本、物流成本、各项税费的情况下，国内生产的单位成本比在美国生产高 4.48 美元（该产品总成本是每吨 240 美元）。

要注意防止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分析论调，一说我们同发达国家有差距，就归结为缺乏自主创新、没有核心技术，归结为这些国家不向我们转让先进技术，要求国家拿出大笔的钱进行技术创新。其实，竞争力有些可能是技术问题，但更多的不是技术问题。从上面案例看，有技术工人素质、垄断造成的电力成本过高、金融体系及政策造成的财务成本过高、政府管制过多造成的清关成本和税费过高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只要我们改变一些，可能会迅速增强竞争力，反之从头开始进行技术攻关，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增强忧患意识，防止在国家发展竞争中、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是“十三五”时期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

责任编辑：李蕊

对我国当前通货紧缩压力的 分析和对策建议

李德水

摘要：当前，市场对通货紧缩预期有所加大，但还不能认为我国已经出现明显通货紧缩。更值得关注的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过于低迷。在通货紧缩压力和经济下行压力都比较大的时期，要增强定力，把压力转变为调结构、转方式的强大动力。建议要正确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引领经济新常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使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客观判断、正确引导通货紧缩的预期。

关键词：通货紧缩 经济下行 新常态 对策建议

作者简介：李德水，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世界许多经济体都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争着向市场“注水”，债务急剧上升，发达经济体通货紧缩风险明显加剧，国际金融市场急剧震荡。2014 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全年上涨 2.0%，12 月同比上涨 1.5%，2015 年 1 月同比只上涨 0.8%。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文章直呼“2015 年需警惕通缩风险”，市场对通货紧缩预期有所加大。对通货紧缩压力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和发展趋势的判断，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一、还不能认为我国已经出现明显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是消费者价格持续下降的一种货币现象，判断它的标准众说纷纭。但国际上一般认为，CPI 同比涨幅出现负增长并持续三个月以上即可视为出现通货紧缩。各大经济体的央行，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银行，都把 CPI 上涨 2.0% 作为苦苦追求的理想调控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去年的通胀率是处在国际上公认的最佳水平和理想状态，似乎不应以此为烦恼。而且我国当前的货币存量比较大，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的上涨，水、电力、煤气等事关民生的资源产品也在进行阶梯价格改革，这些因素将推动消费价格向上走。

二、更值得关注的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过于低迷

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已连续 35 个月处在同比负增长的状况下，从 2014 年 8 月以来出现了加速下滑的现象，12 月同比降低 3.3%，2015 年 1 月同比又下降 4.3%。原因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外部原因主要是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促使了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加速下降；国内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产能过剩、供需关系失衡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一）国际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直接拉低了我国 PPI

国际油价从 2014 年 6 月 20 日开始大幅度下跌，至 2015 年 1 月 25 日，布伦特原油收盘价为 48.55 美元，下跌 60%，这和我 PPI 从去年 7 月开始逐月加速回落的态势是相吻合的，也可以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是导致我国 2014 年下半年 PPI 加速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2014 年我国进口原油达到 3.1 亿吨，由于价格下跌相当于节省了 250 亿美元。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也促进了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下跌，我国钢铁、铜、铅、锌等金属的消费量均占世界消费总量的一半左右，其中相当多的原料是依靠进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对降低我国工业品加工成本也是利好。例如，2014 年我国进口铁矿石 9.3 亿吨，由于降价因素相当于为我国节省 272 亿美元。当然，国内的油田和铁矿山等初级产品生产企业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据了解，国产铁矿石的资源税如果由按量计征改为按价计征，仍然是有竞争力的。导致 PPI 低迷的源头发生在产业链的上游，且又主要在国外，这是天赐良机，并不足虑，关键还是要从我们内部找原因。

（二）国内供需关系发生逆转，出现产能过剩是 PPI 低迷的最根本原因

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1982 年—2013 年，我国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 21.2%， “十一五” 期间更是年均增长 25.5%。另外，从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到 2008 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 29%，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货物出口第一大国。与此同时，社会消费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大需求的强劲增长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总量的突飞猛进，也打造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目前已有 2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是，2014 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从 2013 年的 19.6% 回落到 1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更是从 2013 年 19.8% 的增幅回落到 10.5%，几近于“腰斩”，这是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由于世界经济总体不景气，我国外贸出口像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那种强劲增长态势已经一去不复返。2014 年外贸出口只增长了 6.1%，进口增长 0.4%，2015 年 1 月更是进出口双双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两大需求增长速度的大幅回落，凸显了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还导致了 2014 年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和产成品库存急剧增加。2014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达 10.5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0%，应收账款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高达 17%，而 1991 年清理“三角债”时全国工业企业不正常拖欠款与当年 GDP 之比仅为 9.5%；产成品存货 3.7 万亿元，增长 12.6%；各种存货包括产成品、原材料、中间产品等高达 10 万亿元。当然，存货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合理的周转量。同时，2014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年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3.3%，而其中 12 月同比却下降 8%；2014 年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增长 15.6%。

（三）影子银行急剧膨胀降低了资金流动性，提高了工业企业融资成本

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货紧缩毕竟是一种货币现象，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像是一个机体中的血液。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这里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影子银行，尤其是其中的理财产品快速增长。我国影子银行与国外不一样，国外是在银行之外操作的金融活动，而我们是以身行为主体联手信托公司等机构进行资金的体外循环，用放高利贷的形式获取高额利润，还冠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名义。各种理财业务人为延长资金链条，使资金利率节节上升，严重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利润，并且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资金池”和“金融堰塞湖”，降低了资金流动性。在这种金融生态环境下，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日子不太好过。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倾向，有些大企业包括一些央企和大型民营企业，不是把心思主要放在如何转型升级上面，而是去从事金融活动，认为干什么都不如做金融好挣钱；有的中小企业把银行按照国家政策导向放给它的贷款，不用于主业的发展而用于放高利贷。一旦那些债台高筑、

“饮鸩止渴”的企业撑不下去了，就会出现总爆发的可怕局面。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往往最终会转化为金融风险。

三、我国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总的看法是，新的增长点不但有，而且大量存在，潜力巨大。‘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就在我们身边，就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中。”这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新四化的发展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而差距就是商机，无论企业、城乡、经济和社会、环境和生态，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在科技创新方面更是没有穷尽的。

我国经济不会也决不允许出现“硬着陆”。2014 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已达 30.7 万亿元，增长 8.1%；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27.1 万亿元，增长 7.3%。可见第三产业的总量和增速均已超过第二产业，只要第三产业继续保持这个增长势头，并能消化由于第二产业增速下滑造成的影响，那么我们经济虽然还面临下行压力，却也不会大幅下滑。但还必须客观地看到，结构调整、经济转型是一个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工业部门要丢掉幻想，摒弃“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的消极心态，要咬紧牙关、励志改革和创新，挺过两年或更长一些时间便可渡过难关，预计到“十三五”规划的中后期，我国经济新常态之花将会开得更加艳丽。

四、对策建议

第一，正确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引领经济新常态。要真正把中央的精神转变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要切实解决一些地方存在的“懒政”和“呆政”问题。

第二，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在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和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着力推动工业及建筑业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各级政府要发动企业，积极为企业服务，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第三，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我国装备走出去；趁着工业品价格低迷的有利时机，安排一批关系民生和战略意义的建设项目；努力挖掘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各级政府要推进公共服务，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第四，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使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建议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召开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制定防范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的重大政策措施。在近代世界经济史上，几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由金融危

机引发的，我国经济已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对此不得不防。

第五，客观判断、正确引导通货紧缩的预期。不要“见到风就是雨”，夸大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市场对通货紧缩的预期太大，人们就不敢投资，也不愿意消费，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会形成恶性循环。宏观调控要把握这种大众心理学，引导好舆论。

总之，今年国际上通货紧缩的趋势比较明显，国内的供需关系也很难有大的好转，通货紧缩压力和经济下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我们要增强定力，把压力转变为调结构、转方式的强大动力，抓住宝贵机遇，经过两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必将取得重大成就。

责任编辑：李 蕊

(上接第 11 页)

参考文献：

- 1、路甬祥：《设计的进化与面向未来的中国创新设计》，《全球化》2014 年第 6 期。
- 2、中国工程院：《关于大力发展创新设计的建议》（中工发〔2015〕23 号）。
- 3、路甬祥：《中国制造的未来》，《MT 机械工程导报》2013 年 10－12 月。
- 4、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INDUSTRIE 4.0 Final report of the Industrie 4.0 Working Group April 2013 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Minister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f Germany.
- 5、Digital Manufacturing and Design Innovation Institute (DMDI)，www.manufacturing.gov.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中国外汇储备及其运用的战略思考^{*}

陈炳才 田 青 陈安国 郑 慧

摘要：外汇储备是国家经济实力和地位的象征，储备越多，战略作用越大，外汇储备是国家可以随时动用的资产。保障外汇储备安全的途径在于投资实体经济，要利用外汇储备增加产能以增加世界供给；调整外汇储备投资结构，扩大实体经济投资比重。在实体经济投资中，增加对农业和新技术的投资，加强基础设施海外投资建设。利用外汇储备推进行人民币国际化，应逐渐摆脱对美元清算体系的依赖；区分流动需求外汇储备与投资性需求外汇储备，国家可以将外汇储备资金直接划拨给政策性银行或者承担政策性项目的商业银行使用。运用外汇储备进行直接投资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

关键词：外汇储备 国家资产 投资战略

作者简介：陈炳才，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副主任、研究员；
田 青，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陈安国，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巡视员、副教授；
郑 慧，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处长、副研究员。

2014 年底，中国拥有外汇储备 38430 亿美元，庞大的外汇储备不仅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的话题，而且为国际社会所关注。欧洲一些危机国家期望中国购买其政府发行的国债，

^{*}本文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15 年度资助课题《中国外汇储备与资本输出新战略研究》的阶段成果。

一些发展中国家期望得到中国的外汇贷款或投资，以推动重要项目的建设。国内企业界、金融界也期望外汇储备能为自己所用，学界和决策层也在研究和考虑如何运用外汇储备。对于如何认识外汇储备，如何用好外汇储备，本文就这两个问题谈些看法。

一、如何认识外汇储备

对于外汇储备，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认识。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多了，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外汇储备。其实，当今外汇储备，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多与少的思维方式来对待了，而是要看到外汇储备已经从过去的外汇资金转变为外汇资本、外汇资产，可用进行直接投资的资产，其价值意义发生了改变。

（一）外汇储备是国家经济实力和地位的象征

外汇储备是中国最大的硬实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积累起来的成果，尤其是最近 10 多年经济高速成长积累的结果。最近几年，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外汇资金份额，倡导设立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都是源于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就不会有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

同时，外汇储备也是中国抵御外来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的有力武器，是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压舱石。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和金融不仅没有受到外部危机的传染和冲击，而且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和升值，国内经济和金融稳定，与充足的外汇储备关系密切。亚洲金融危机和 2014 年底以来的俄罗斯汇率危机表明，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难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突发事件，难以保障人民币汇率和金融的稳定。

当今世界，外汇储备不仅是支付和清偿手段，还是国家之间经济和金融信任、合作的基础，外汇储备的多少也反映国家货币的信用等级和货币的信誉地位。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外汇储备少，国家主权信用等级和企业信用等级往往较低，甚至在评级中被降低，引发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或震荡。而外汇储备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主权信用等级和企业信用等级，保持金融市场运行的稳定。

事实表明，外汇储备多了，别国有求于中国的事就多。外汇储备多，在国际众多领域的话语权就大。

（二）外汇储备越多，战略作用越大

外汇储备的增加，好比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收入低时，货币收入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收入高了，货币收入不仅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很大部分会用于投资、理财等。外汇储备少的时候，储备的战略作用很少，基本用于支付进口、偿还外债等，而外

汇储备多了，其战略作用越来越多，比如用于干预汇率波动，用于支持企业“走出去”投资战略，用于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项目等。外汇储备越多，战略作用越大，有些战略作用超越想象，甚至当下认识不到。

1. 外汇储备是化解内部金融矛盾和问题的有效途径

没有外汇储备的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就没有自己的资本金，无法进行股份制改制，也不可能上市，也不可能有当今的国际竞争地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有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花旗银行一年的利润可以买下中国银行业的全部资产，但中国的银行注入外汇资产并上市以后，再也没有国际金融机构可以吞并中国的银行业了，中国的多家银行已经排名在国际银行业的前百名之列，这离不开外汇储备的贡献。在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下，在美元、欧元主导的金融体系下，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也是未来商业银行进行国际竞争的有力保障条件。

2. 外汇储备是规避、抗击外来经济和金融风险的有效工具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能够保持汇率和金融的稳定，与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关系密切。外汇储备多了，国家干预市场的力量就强大了，就可以威慑投机资本，可以预防和应对投机资本的冲击。当本币汇率剧烈波动的时候，强大的外汇储备有助于稳定市场汇率。当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时候，巨大的外汇储备有利于企业 and 国家金融信誉的稳定和信用评级的稳定、提高，有利于降低国际筹资成本。与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比较，2011年以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急剧下降，汇率大幅度贬值和波动，通货膨胀高企，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外汇储备相对少。而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国内金融市场稳定，这与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和稳定密不可分。

3. 外汇储备是国家之间经济、金融乃至政治、军事、外交等谈判筹码之一

事实上，强大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经济、金融谈判和合作的重要筹码，成为影响一些国家资源、能源项目投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持力量。在中国国内需要资源、能源，而一些资源、能源国家面临资金或投入不足乃至经济衰退和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外汇储备可以转化为外汇贷款和外汇投资，既有利于东道国的资源、能源项目投资和经济、金融稳定，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提倡建设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如果没有外汇储备做后盾，推动起来就比较困难。有了强大的外汇储备，就可以开展基础设施、民生项目和资源、能源项目的投资与合作。

4. 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力量

2014年底中国外汇储备 38430 亿美元，外汇存款 5735 亿美元，合计有 44075 亿美元

的外汇资源。如果未来中国拥有 6~7 万亿等值美元的外汇资源，外汇储备达到 5~6 万亿美元，可以考虑将人民币与储备货币挂钩，宣布任何国家、机构持有人民币，可以随时兑换为储备货币给他们。这样，外国政府和境外机构就可以大胆放心持有、使用人民币，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作为结算、投资、交易、清偿货币，人民币业务就可以逐渐全面走向国际化。中国想把人民币作为特别提款权 SDR 的定值参照货币，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不会轻易同意。我们拥有的外汇储备多，有利于增加话语权。

总之，从国家谋略来说，外汇储备多，国际国内的战略作用也大。当然，将来外汇储备的增加，不应依靠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来实现，更多应该通过境外直接投资回报增加来实现。依靠基础货币投放来增加外汇储备，确实会形成负担，一方面会使人民币汇率升值，另一方面会多发基础货币，导致通货膨胀。

（三）外汇储备的本质是国内居民净储蓄，是国家可以动用的资产

中国有那么多外汇储备，但企业、银行要想使用外汇储备，并不容易。有看法认为，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发行人民币获得的，而人民币是中央银行对社会的负债，因此，谁要使用外汇储备，必须拿人民币购买。结果国内企业、银行用不上或用得少，大量外汇储备存放在美国、欧洲等国，购买国债、企业债、股票等，被美国、欧洲所使用。

1. 外汇储备实际是国内居民净储蓄

外汇储备到底是谁的资产？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加以利用？其实，经济学早就有了答案。中国的外汇储备，来源于贸易等经常项目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等资本项目顺差。宏观经济学认为：

一个国家的收入 = 消费 + 投资 + 贸易差额

经过移项，可以得到：

贸易差额 = (收入 - 消费) - 投资

即：贸易差额 = 储蓄 - 投资 = 净储蓄。

当今的投资既有国内投资，也有外商投资，企业也会到海外进行投资，因此，公式可以改写为：

贸易差额 = 储蓄 - 投资 (国内投资 + 资本流入 - 资本流出)

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的差即是资本项目差额，经过移项，得到：

贸易差额 = 储蓄 - 国内投资 - 资本项目差额

即：

贸易差额 + 资本项目差额 = 储蓄 - 国内投资 = 国内净储蓄

国际收支差额 = 国内净储蓄

由此可见，国际收支差额（不考虑统计误差）——外汇储备就是一个国家的净储蓄。如果一国存在大量国际收支顺差，就意味着国内储蓄或储蓄率高。可见，外汇储备是国内居民储蓄转化而来，是国家高储蓄结果的必然反映。高储蓄反映的是投资、消费需求不足，居民投资渠道太少，这与资本流出管制、资本账户开放不够关系很大。鼓励企业、个人“走出去”扩大投资，是增加居民投资渠道的一个重要途径。而消费需求不足，与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一般家庭不敢消费关系很大。

外汇储备就是国内居民净储蓄，但国内居民没有持有外汇储备，原因在于汇率升值，居民不愿意持有，中央银行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收购了外汇。而基础货币发行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全体居民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承受通货膨胀的损失表现为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

2. 外汇储备是负债也是资产，是国家可以随时动用的资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外汇储备是指货币当局掌握的可随时动用的外汇资产。其实，实事并非完全如此。美国、日本、英国外汇储备的持有者是财政部门，韩国由货币当局与财政部门共同持有。而加拿大通过向国际市场借款形成，管理是负债管理。外汇储备隶属谁来持有和管理，关键看是谁出资购买了。如果财政部出资购买（发行本币债券购买）形成外汇储备，这部分外汇储备就归财政部持有和管理，如果是货币当局用基础货币购买，就应归货币当局持有和管理，这样，在财务和资金管理体制上才有秩序。

中国外汇储备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在外汇市场购汇形成的，本质上是全民承受通货膨胀后央行（国家）获得的外汇资产。央行购汇所使用的本币就是中央银行的负债，而外汇储备体现为中央银行的资产。因此，外汇储备为中国人民银行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八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的全部资本由国家出资，属于国家所有。发行人民币本身属于国家行为，人民币属于国家所有，外汇储备本质上也是国家资产，是国家可以随时动用和使用的战略资产。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中国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发行人民币获得的资产，因此，外汇储备不能直接使用，必须拿人民币购买才能使用。其实，这种看法太过机械。中央银行自身不能直接使用外汇资产，但国家可以直接动用。国家向商业银行的外汇注资是最典型的国家直接动用外汇储备，将外汇储备直接注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资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也是国家直接动用外汇资产的表现。可见，外汇储备是国家随时可以动用的资产。

二、对中国外汇储备运用战略的新构想

1994 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障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巨额外汇储备保障了国内经济和金融稳定，威慑了投机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机和冲击。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运用外汇储备扩大进口，进行海外投资，并与中国制造和基础设施投资结合，开拓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新模式，对世界经济走出危机、避免金融危机的传染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国内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外汇储备如何发挥作用？

（一）确保外汇储备的安全

1. 注意规避外汇储备的主权风险

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企业债等，主权风险很大。2011 年欧美等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时，美国等冻结了利比亚数百亿美元的资产，伊拉克战争和朝鲜战争时期，美国也冻结了这两个国家的资产。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和欧洲采取了冻结部分资产账户的手段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这值得我们警惕。中国的崛起对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格局都会带来很大影响，如果出现中美关系恶化，中国近 4 万亿外汇储备面临被冻结的风险，这是无法规避的主权风险。需要采取各种方法和途径分散和规避主权风险，包括加强外汇储备的运用。

2. 要规避通货膨胀损失，规避金融资产价值缩水的风险

美元在全球的流通量越来越多，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各国拥有的美元外汇储备总额和美元外汇资产也越来越多，美元汇率和以美元标价的资产总体趋势趋向贬值，这会给外汇储备带来长期利益损失。更重要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虚拟经济比重高，资产证券化链条长，资产价格周期性危机是必然现象，每次危机之后，会发行更多的货币，外汇储备的购买力和价值因此而被稀释。不仅如此，中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欧洲的债券、股票等，其投资回报只有 4%~5%，相对直接投资回报来说，这个水平太低，不足以弥补通货膨胀的损失，不足以弥补资产价格缩水的损失。应该投资和购买能够抵御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缩水的实体经济资产。

3. 外汇储备安全的根本是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而不是投资美国国债

我们的外汇储备长期主要投资美国、欧洲的国债、企业债等，这确实保障了安全性、流动性，但收益有限。外汇储备如同银行存款，如果不加以运用，只能获得存款利率回报。只有与实体经济结合了，才能创造更大的收益率和更多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投资

虚拟经济，资金就是在金融部门打转，为美国金融和经济服务，不会为国内企业创造出产能。而投资实体经济，可以扩大产能和供给，解决中国 15~16 亿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求的资源和能源、技术与产品，也解决全球 70~90 亿人口的需求，而且可以通过投资获得的资产进行增值，获得更大、更多的外汇资源和外汇储备。

用外汇储备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战略构想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产能竞争模式国际化，即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国际直接投资，转化为合作国家的基础设施等，扩大资源、能源、农业和先进技术设备制造业等国际产能，使这些行业在国际上长期保持充分竞争状态，确保供求平衡和价格相对低廉、稳定。这样，外汇储备不仅可以获得比投资美国债券的更高收益，其安全性也比购买美国国债要高很多，而且对东道国的经济和国内经济发展有利。

（二）外汇储备的运用要有战略思维

1. 利用外汇储备再造一个中国产能以增加世界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2 万多亿美元，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使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很多产品产量和产能全球第一，而且国内制造业产品价格低廉。如果对外汇储备投资战略进行调整，拿出其中的 2 万多亿美元进行直接投资，与中国目前境外直接投资 6000 多亿美元结合，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就可以再造一个类似中国产能的全球产能供给，不仅可以扩大全球资源、能源的产能和供给，也可以扩大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产能和供给，扩大全球粮食、经济作物等产能供给，营造一个产能相对过剩、市场充分竞争、价格相对低廉的全球经济格局，也有利于中国的粮食安全。这既有利于中国扩大进口、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2. 外汇储备转化为直接投资的考核和评估要算大账、算长远账

由于产能扩张，价格低廉乃至下跌，外汇储备进行直接投资的收益短期内可能是亏损的，甚至长期亏损。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战略远见，即算国家大账，不计较企业投资短期损失的小账，算国家投资带来进口廉价的长期账，不计较投资的短期损失账。通过直接投资，可以带动全球投资和产能过剩，这样，中国进口产品才能廉价。以铁矿砂为例，2009 年以来价格持续暴涨，2011 年中国进口铁矿砂价格为每吨 178 美元，但中国 2009 年—2012 年进口需求扩张和企业在全球大力进行投资，带动了全球铁矿砂投资增加和产能增加，市场价格持续下跌。2014 年中国铁矿砂平均进口价格 100.4 美元/吨，进口规模 93251 万吨，增长 13.8%，但用汇比 2011 年价格节省 727 亿美元，2015 年价格如

果继续下跌到 80 美元/吨，当年进口比 2011 年价格就可以节省 900 多亿美元。而中国海外铁矿石投资总额也没有超过 1000 亿美元，近几年铁矿石投资的亏损与进口收益比，这点损失不算什么。其他石油、有色金属矿等投资也存在类似的效应。

这样说，不是不要考核海外投资的效益，更不是不要市场原则，而是要调整对某些外汇储备投资的考核周期和考核方式，如把基础设施投资的业绩考核时间拉长到 5~10 年以上；把对产能投资的考核与进口价格受益、国内产业安全和供求改善等结合起来考核。对一些国家的债务违约，只要保障资源、技术设备等供应，或者允许进行土地、农业、森林等资源开发，则放宽偿还期限。

（三）调整外汇储备投资结构，扩大实体经济投资比重

1. 外汇储备投资实体经济，间接获得价格话语权

中国是一个资源、能源、技术创新相对匮乏的国家，未来 14 亿~16 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更多需要依靠国际市场。过去的经验表明，中国过多地进口国际资源和能源会导致国际价格大幅度上涨，不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2009 年以来，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措施，不仅带来了国内产能扩张和供给过剩，也带动了全球产能扩张和供给相对过剩，价格持续下跌。以前中国一直在探索如何获得国际资源和能源的价格话语权、规则制定权，没有找到解决的途径，但 2009 年以来的产能和需求扩张给了我们启示，就是中国进口需求会导致国际价格抬高，刺激国际社会增加投资和供给，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市场价格会出现新的平衡，价格话语权自然实现。在产能和供求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价格不仅不会上涨，甚至会竞争性下跌，从而使资源和能源价格长期保持在相对合理水平。有鉴于此，可用考虑将外汇储备运用于国际上实体经济各个方面的投资，以满足中国未来的需求和发展。

2. 降低虚拟经济投资比重，提高实体经济投资比重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主体部分是国债、企业债和其他金融资产，对实体经济投资相对少。建议降低对美国、欧洲国债、企业债、股票等金融类资产的投资规模和比重，扩大对农业、能源、资源和先进技术设备、先进环境技术设备类国家和项目等实体经济的产能投资比重，扩大实体经济的投资比重。未来 10 年左右，在保持外汇储备稳定增长基础上（仅仅是外汇储备的利息每年就可以增加 1000 多亿美元），逐渐把外汇储备的 50%~60% 投资于实体经济，40%~50% 投资于债券、股票等虚拟经济。外汇储备资产投资结构调整，一方面可能带来有关国家国债、企业债、股票的票面价格下跌，提高其债券的发行利率，改变欧美国家企业与中国企业竞争长期存在的资金成本不平等状况，相对

降低人民币的资金成本，增加国际、国内企业对人民币的使用，提高人民币的地位；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投资增加，可以扩大产能，使市场充分竞争、保持价格低廉，刺激国内进口，如果配合国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其效果更好。

（四）把握好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方向

1. 继续进行能源、资源类产业直接投资

中国资源、能源相对匮乏，过去海外投资的首要选择是资源和能源，未来依然需要对资源和能源进行投资。全球包括中国未来的化石能源需求会大幅度降低，但这有一个时间过程。如果没有继续的投资，石油价格依然会上涨到较高水平，而每年保持一定规模的海外投资，有利于释放产能，增加供给，稳定价格。

首先，要发挥好机构的投资作用。继续发挥外汇储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砖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的投资、融资作用，必要时可以增加资金规模。发挥这部分资金参与全球行业、区域项目投资效应，改善一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资源、能源建设。

其次，继续双边和多边的能源、资源类投资。出于战略考量和获得资源份额的可能，建议继续保持对俄罗斯、澳大利亚、委内瑞拉、非洲、拉美、俄罗斯独联体等国家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类中资和外资企业的直接投资、外汇贷款、股权投资乃至收购兼并等，或者支持国内民间机构进行这类产业投资。

目前，国际石油、矿产等资源、能源类供求和产能过剩，价格相对低廉，中国每年保持一定的贷款支持或者直接投资，既可以满足东道国的资源、能源、基础设施发展需要的资金，避免资金缺乏带来的经济损失和企业危机，也可以保障中国国内的需求和价格廉价、稳定。考虑到美国石油产量增加潜力大、速度快，将很快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家，应加大对美国石油生产开采和勘探投资，必要时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2. 扩大外汇储备投资实体经济范围，尤其是农业和新技术的投资

首先，对实体经济投资从能源、资源类产业扩大到先进设备制造和环境污染治理技术设备等行业，或者在这些行业进行收购与兼并，扩大这些行业的设备制造产能，扩大规模经济效应，降低这些行业的制造设备价格，增加国内对这些产业和设备制造业的进口，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廉价的环境污染治理技术、设备。欧洲、日本等在设备制造及其技术上相对先进，尤其是在环境技术和设备上相对领先，如欧洲在水污染处理、垃圾焚烧、土壤和空气污染治理、检测和监管上，都有良好的设备和技术，这方面可重点在欧洲、日本进行投资。

其次，扩大农业（粮食等）、土地领域的投资和开发。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少，而人口

规模巨大，国内土地资源有限，为解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粮食担忧问题，可以考虑在非洲、拉美、俄罗斯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土地资源丰富国家，进行农业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把中国发展农业、增加粮食产量的经验运用到这些国家，增加世界粮食产量和畜牧业产量，使全球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这对全球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有利，对所开发的国家有利，对中国也有利。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可以通过世界市场来进行调节。

3. 加强对基础设施海外投资的配套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国家经济发展，必须解决落后、短缺的基础设施问题，对外直接投资要产生良性循环效应，要解决好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对海外投资所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要配套。如机场、港口、高铁、高速公路及其站点相互之间要互通互联，在机场、高铁站、公路站、港口等配套建设物流中心，减少货物装卸和运输成本。铁路、公路、机场站点要直接连接可以连接的城市中心区，城市轨道和交通、电力、电信、饮水、取暖等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海外投资，应相互协调和配合，防止国内企业在境外恶性竞争。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应进行战略布局。主动选择周边和符合中国战略需要的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结合“一带一路”有关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开发战略，通过国家之间双边的贸易和投资、战略谈判协议主动投资，以便利中国的贸易运输、缩短运输距离，保证资源、能源和贸易通道安全和畅通。例如，在石油管道的建设上，可以考虑在印度建立一条横贯东西的石油管道，西边连接中东产油国，东部连接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国的云南，这可以大大节省海上运输的路途。建立这样一条石油（天然气）管道，会给多个国家带来利益。

（五）利用外汇储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历史上，本币获得国际地位主要依靠战争，或者是依靠本币与黄金挂钩而获得国际信誉和信用地位，黄金不再作为国际货币以后，国际货币主要靠国家信誉和货币信用及其途径依赖、货币清算体系便利而获得国际地位。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历史经验，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1. 要借助美元地位提高人民币地位

在美元和欧元依然具有国际信用背景下，人民币需要借助这些储备货币的地位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国际信誉，从而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这要保持外汇储备稳定乃至增加，同时在双边贸易和投资谈判中，与协议国家进行谈判，要求协议国家在法律制度和政策上接受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融资和清偿货币，使人民币在境外成为合法、可交

易货币，从而可以用于银行间拆借和企业贸易融资等。中国也接受协议国家的货币进行计价、结算、融资、清偿等。

2. 应逐渐摆脱对美元清算体系的依赖

目前，所有的美元交易都必须走美元清算（SWIFT）系统，甚至人民币的跨境交易也需要走这个清算系统，美国完全掌握了中国企业和银行金融活动的细节。为此，中国应建立人民币的国际清算体系，进行双边、多边共享，减少对储备货币清算体系的依赖。当然，要建立人民币国际清算体系，必须允许人民币跨境自由流动，即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人民币账户，享受人民币国民待遇，降低其持有人民币的资金成本，增加流动性。否则，国际社会不愿意使用人民币。

3. 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乃至升值，而利率要降低

货币地位的提高和稳定，需要本币兑换美元能够保持升值和稳定，使国际上的企业和政府相信持有和使用人民币，不仅流动性强，其资金利率也相对低，而且是硬通货。这也需要人民币利率逐渐降低，与国际货币利率基本接近，国际社会才愿意扩大人民币的使用。事实上，目前国内人民币利率太高，企业感到融资成本太贵，降低人民币利率也符合中国市场趋势。

（六）区分外汇储备的不同功能，调整外汇储备管理体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外汇储备的定义局限在进口、外债偿还、汇率干预等，不能进行外汇贷款、贸易融资，不能进行外汇拆借、直接投资等。事实上各国政府已用于投资，购买国债、企业债、企业股票、股权，新加坡财政部设立全资控股公司进行投资。

1. 把外汇储备区分流动需求与投资性需求

教条地认为外汇储备只能用于进口支付、债务偿还等，实际是自我束缚。应该根据外汇储备的多少，区分流动性需求与投资性需求。即把用于保障进口支付和债务清偿、汇率干预，用于应对突发事件和金融稳定的外汇储备作为流动性外汇储备进行经营和管理。这部分外汇储备基本上按照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等三个原则要求进行投资和管理，主要用于购买美国、欧洲等国家的国债，或者是信用等级高、安全性和流动性比较好的3A级金融资产。

剔除了流动性需求的外汇储备，应该作为投资性外汇储备。这部分外汇储备也是资产——可以投资和盈利的资产，可以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资。作为投资的资产，其规模越大越好，资产越多越好。投资性外汇储备，其投资获得的收益越多，外汇资产也越多。作为投资，外汇储备随时可以与国家谋略结合，进行多方面的操作和运用。

2. 调整外汇储备经营、决策体制

流动性需求外汇储备按照目前的体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其规模不超过 6 个月进口用汇、当年短期外债清偿需求、汇率干预和突发金融事件等因素之和。如果不出现贸易、国际收支逆差，干预汇率比较少，满足进口需求的外汇可以缩减到 3 个月。根据 2014 年的数据计算，进口付汇 6000 亿美元左右，短期外债余额 7000 亿美元左右，其他应急性外汇需求 2000 亿美元左右，合计有 1.5 万亿美元作为流动性外汇储备就非常充足；其余 2 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作为投资性外汇储备。投资性外汇储备，应该以赢利性、增值性、安全性为原则进行投资，流动性不应作为第一原则。

建议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监管制度，区分战略决策和市场决策，战略决策由国务院做出，市场决策由部门和投资人决策，并建立起对市场决策和经营业绩的考核机制、责任约束机制，投资人才的使用要市场化。

3. 加强外汇储备投资的战略协调

应尽快改变由外汇主管部门对外汇储备进行全部经营决策的制度，根据流动性外汇储备需求和投资行外汇储备需求，成立不同的投资管理机构，将国家谋略和市场战略、企业进出口、海外投资战略结合起来进行联动，甚至在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合作的投资、销售、海运供应链渠道，在境外投资上进行协作。要改变目前中国投资公司与外汇局储备司在投资上的相互竞争关系，在新的体制没有产生之前，应进行投资战略协调，明确投资分工，防止相互竞争。

（七）创新外汇储备投资和运用形式

1. 创新外汇储备的运用形式

外汇储备既然是国家资产，国家就可以根据需要，采取多种形式的运用方式，而不必局限于必须购买外汇才能使用的运用方式加以利用。比如，中央可以将外汇储备资金直接划拨给政策性银行或者承担政策性项目任务的商业银行使用，或者委托其经营和使用，也可以直接划拨给中国外汇投资公司或者外汇局的投资公司。当然，国家直接划拨、委托外汇储备资金进行使用，需要对使用者进行业绩考核和市场问责。

2. 运用外汇储备进行直接投资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

外汇储备进行直接投资，形式可以多样，目前市场所采取的一切投资和融资形式都可以使用，不必拘泥于委托贷款、给商业银行贷款等。

一是进行企业股权投资或融资。可以考虑让外汇储备持有机构与行业战略协会或者与企业进行投资战略合作，各自以投资主体的形式进行投资、获得股权等，或者进行外

汇流动资金融资等；二是设立海外产业外汇投资基金，隶属国务院直接管理。对国家政策支持的外国投资产业进行外汇支持，政府可制定外国投资产业战略规划，明确支持收购、兼并、投资哪类行业、企业。三是进行外汇贷款。外汇储备持有机构可以直接贷款给国内企业或国外企业进行长期投资，或者进行流动资金贷款投资。外汇储备资金管理机构缺乏专业人员，可以通过商业银行进行委托贷款。四是通过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有选择地投资实体经济项目和企业。五是通过政府之间的双边协议进行优惠利率贷款投资或贷款。所有投资出现债务危机和偿还困难，可以考虑转变为股权、资源份额、长期经营权、土地、森林等。

3. 外汇储备的运用要采用市场化方式

现在，各方面都希望使用外汇资金，商业银行、企业、政策性银行都希望使用外汇资金，甚至作为盈利的一个手段。根据过去的经验，很多机构往往把外汇储备作为国家资产，作为唐僧肉，大家都想使用，没有偿还的意识和法律约束。

建议外汇储备的使用，采取市场化使用方式，即建立起具有法律和市场责任的约束机制。在资金使用上，要将各方面的利益和风险捆绑在一起，比如项目投资和贷款、参股股权等，企业和银行出主要部分，外汇储备管理机构出一部分，后续要有跟踪、监督，资金分次、分批到位。建立起外汇储备运用的有效监管模式，这方面可以借鉴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洲债务危机过程中，欧盟对危机国家资金援助的管理方式，确保资金有效使用，避免道德风险。对于风险比较大的投资，银行和企业应该是投资主体，外汇储备资金只是部分。国家对外汇储备资金管理机构、投资机构要有严格的业绩考核，可以纳入国资委考核系统进行统一考核。

参考文献：

1. 吴汉铭：《中国外汇储备权属与性质之法律分析》，《上海金融》2010年第2期。
2. 安邦咨询公司：《中国外汇储备资产运用的转变》，《金融时报》中文网2011年1月5日。
3. 彭玉榴、赵龙：《创新外汇储备运用 提高资产收益率》，《证券日报》2013年1月28日。
4. 钱箐旒：《外汇局成立专门机构 创新外汇储备运用》，《经济日报》2013年1月15日。
5. 吉翔、陈曦、夏园园：《基于战略视角的中国外汇储备多层次使用研究》，《经济问题》2013年第2期。
6. 陈炳才：《外汇储备不能成为纸上财富》，《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5月30日。
7. 陈炳才：《对外汇储备的几点认识》，《中国外汇》2013年第23期。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分析和展望

刘翔峰

摘要：中国 2014 年国际收支趋于基本平衡，但存在投资收益为负、外汇储备结构性风险等问题。基于国内外经济环境，2015 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可能呈现波动趋势，中国应当继续优化国际收支结构，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加强跨境短期流动资本监管，推动外汇管理改革，以推动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关键词：国际收支结构 国际投资头寸 外汇储备管理 国际收支平衡

作者简介：刘翔峰，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2014 年中国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错综复杂。全球经济活动弱于预期，IMF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不断下调世界经济增速，其中 IMF 三次调低经济增速到 3.3%。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出现新变化，发达经济体不断分化，美国经济复苏稳定，欧元区和日本基本陷入停滞，新兴经济体增速进一步放缓。从国内看，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基本平稳，但投资增长后劲不足、融资瓶颈约束明显、经济下行压力和风险较大。2014 年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区间扩大和美元升值影响，中国国际收支趋于基本平衡，但受国内外因素影响，2015 年中国国际收支仍然会出现波动性特征。

一、2014 年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新特点

（一）国际收支总顺差收窄

2014 年中国国际收支差额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国际收支顺差缩小。由图 1 所示，中国国际收支顺差自 2004 年扩大到 1779 亿美元，2010 年达到最高点 5246 亿美元，而后下降到 2012 年的 1836 亿美元，2013 年又升至 5090 亿美元，2014 年为 1178 亿美元。2014 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同比下降 75%，中国国际收支总顺差快速缩小的趋势非常明显。二是经常项目顺差有收窄之势。2008 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达到顶峰 4206 亿美元，以后开始缩小，2014 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为 2318 亿美元（见图 2）。三是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开始扩大。1998 年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 63 亿美元逆差，而后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格局保持多年，2012 年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逆差 318 亿美元，而 2013 年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则急剧上升为 3262 亿美元，2014 年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又出现逆差 960 亿美元（见图 2）。就中国目前情况来看，经常项目保持顺差，而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逆差，客观上中国国际收支开始趋于平衡，以双顺差为标志的外部失衡开始有所改善（见表 1）。中国这种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的出现和不断扩大是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削弱密切相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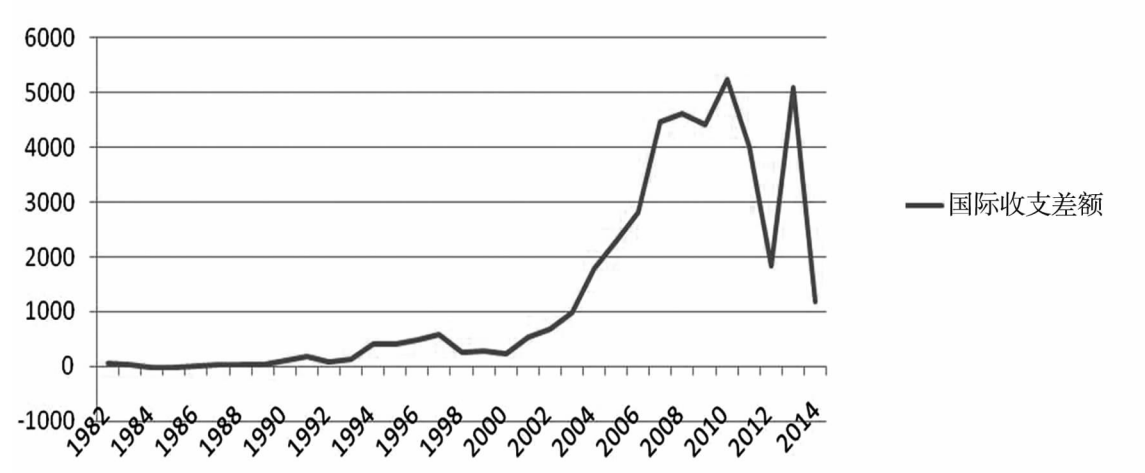


图 1 1982 年－2014 年的中国国际收支差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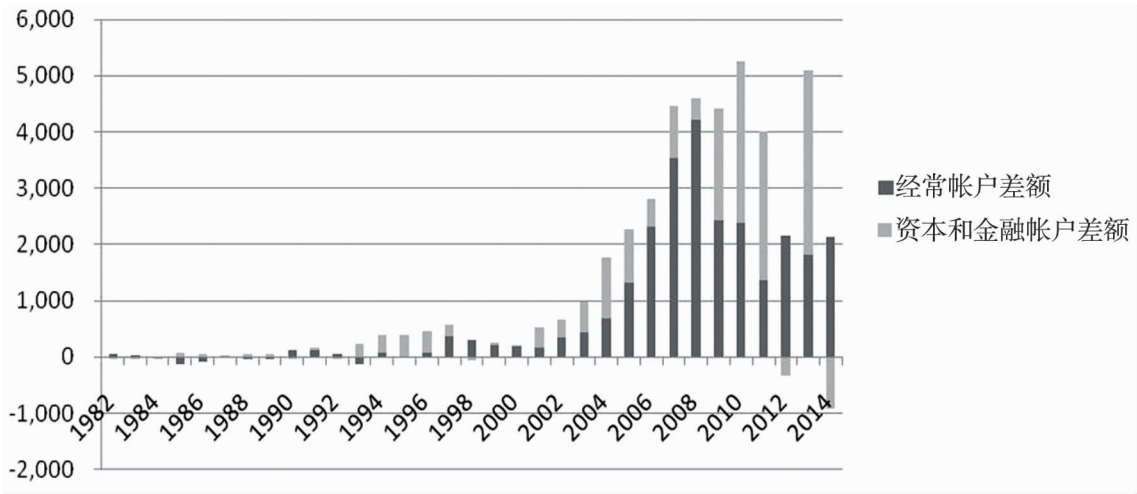


图 2 1982 年—2014 年中国经常项目差额和资本项目差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表 1 2014 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单位：亿美元）

项目 ²	行次	2014 年四季度	2014 年
一、经常项目	1	611	2138
A. 货物和服务	2	959	2738
a. 货物	3	1693	4719
贷方	4	6484	23541
借方	5	4791	18822
b. 服务	6	- 733	- 1981
贷方	7	343	1851
借方	8	1077	3832
B. 收益	48	- 244	- 298
C. 经常转移	49	- 104	- 302
二、资本和金融项目 ⁴	50	- 912	- 960
其中：直接投资	51	610	1985
三、储备资产	52	300	- 1178
3.1 货币黄金	53	0	0
3.2 特别提款权	54	0	1
3.3 在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	55	7	10
3.4 外汇	56	293	- 1188
3.5 其他债权	57	0	0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二) 2014 年国际收支项目呈现大幅波动

2014 年中国各季度国际收支的子项目出现大幅变动。由图 3 所示，2014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对国际收支总顺差的贡献率分别为 7%和 93%。其中，经常项目顺差 70 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 940 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 1255 亿美元。随着外需回暖，2014 年第二季度，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升至 734 亿美元，环比增长 9.5 倍，而资本和金融项目则转为逆差 162 亿美元，从而推动中国国际收支趋向自主性平衡；当季，中国储备资产增加 224 亿美元，同比下降 52%，环比下降 82%。2014 年第三季度，中国经常项目顺差 722 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 90 亿美元，储备资产减少 1 亿美元。2014 年第四季度，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为 611 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逆差为 912 亿美元，储备资产减少 300 亿美元，首次出现国际收支的季度逆差。除各项目大幅波动以外，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变化很大，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不断增大。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在 2014 年第一季度还很小，2014 年第二季度由于美国经济好转而带来中国外需好转，不过三、四季度呈现下降趋势（如图 3）。因此在未来一年里，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世界主要国家复苏步履蹒跚，对中国进出口也不能有过高期待。中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尤其值得关注：2014 年第四季度其逆差在急剧增大，资本流出规模已经超过了经常项目顺差。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国际资本受美元升值影响而大量流回美国，而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则导致企业结汇意愿减弱、境外存款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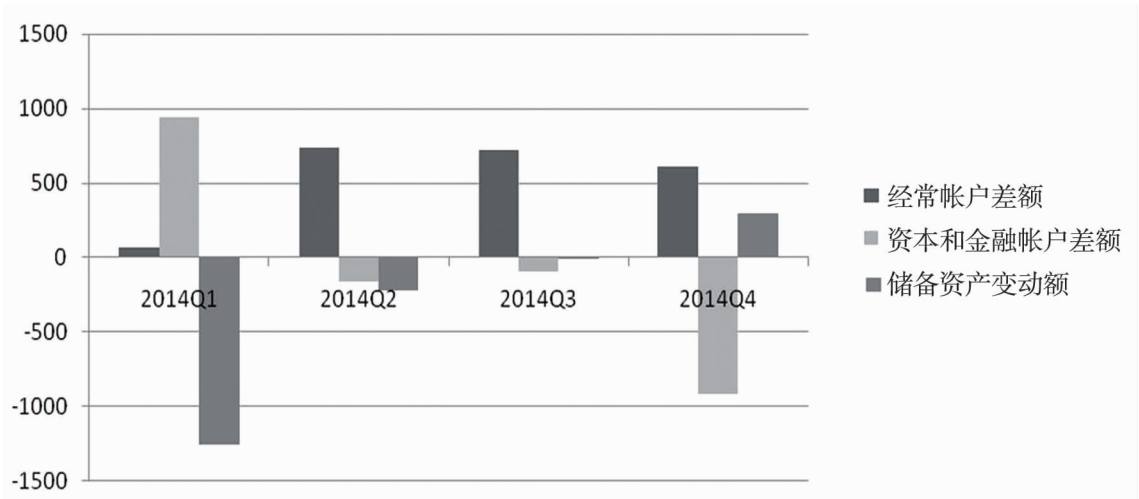


图 3 2014 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季度数据（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三）经常项目差额占 GDP 的比率趋于合理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经常项目差额占 GDP 的比例基本在正常区间，从 2008 年的 9.15% 下降到 2013 年的 1.96%，2014 年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例为 2%，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区间；二是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来自经常项目顺差，而经常项目顺差全部来源于持续大额的货物贸易顺差（见图 4），这源于长期 FDI 的超大规模流入中国导致的加工贸易带来的贸易顺差；三是国际贸易大为改善，2014 年 12 月中国货物出口按年同比增加 9.7%，进口则下降 2.4%，货物贸易盈余的上升意味着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做出了正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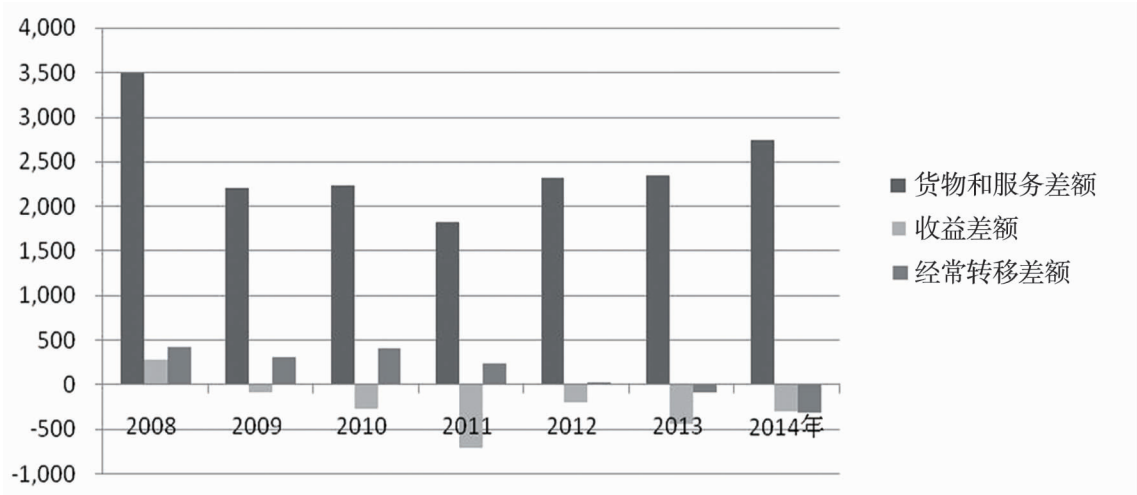


图 4 2008 年—2014 年中国国际收支表的经常项目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四）资本和金融项目大幅波动，其逆差来自“其他投资”

2014 年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逆差，且各季度波动很大。第一、二、三、四季度分别为 940 亿美元、-162 亿美元、-90 亿美元、-912 亿美元。如果对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结构进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其逆差主要是由“其他投资”这一项造成的，原因如下。第一，直接投资净流入，且增长较快。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14 年中国“直接投资”为顺差，净流入 1985 亿美元，比上年 1850 亿美元上升 7%，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流入国。第二，证券投资净流入，且增长很快。2014 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证券投资”为顺差，净流入 6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77%。其中，境外对中国证券投资净流入 1056 亿美元，同比上升 67%；中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 4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5%。第三，其他投资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2014 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其他投资”项下净流出 1289 亿美元，2013 年同期为净流入 505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外的贷款、贸易信贷和资

金存放等资产净流出 2297 亿美元，增长 1.7 倍；境外对中国的贷款、贸易信贷和资金存放等负债净流入 1008 亿美元，减少 25%（见表 2）。由图 5 可以看到，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逆差是由于“其他投资”波动造成的，即“其他投资”的净流出导致了资本和金融项目为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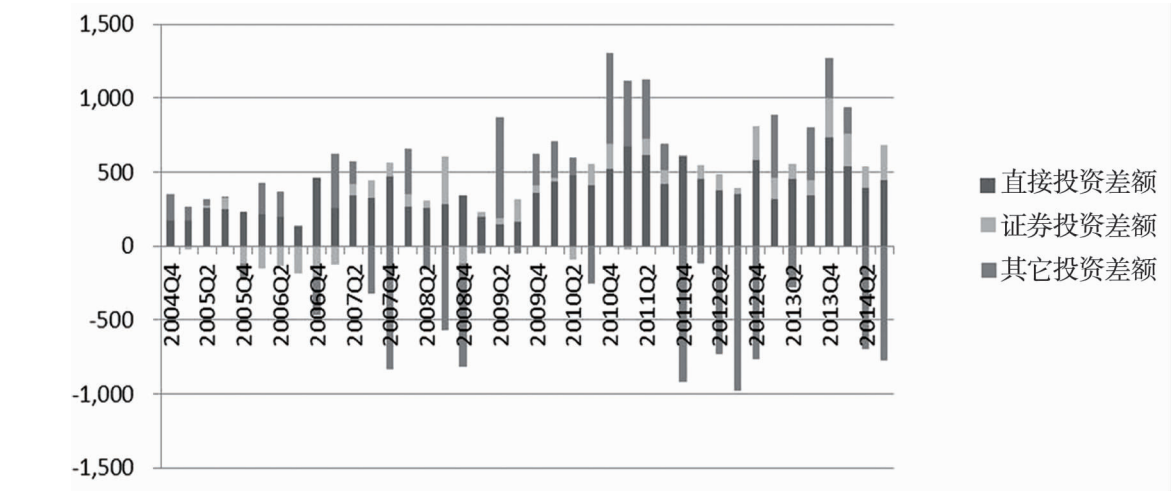


图 5 2004 年—2014 年第三季度中国国际收支表的金融项目构成（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表 2 2014 年前三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单位：亿美元）

项 目	行次	差额	贷方	借方
一、经常项目	1	1, 527	20, 529	19, 003
A. 货物和服务	2	1, 778	18, 564	16, 786
a. 货物	3	3, 026	17, 057	14, 031
b. 服务	4	- 1, 248	1, 507	2, 755
1. 运输	5	- 442	278	720
2. 旅游	6	- 772	379	1, 151
3. 通讯服务	7	- 2	12	14
4. 建筑服务	8	62	91	29
5. 保险服务	9	- 136	28	164
6. 金融服务	10	- 3	28	31
7.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11	67	130	63
8. 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	12	- 164	5	170
9. 咨询	13	121	315	194

续表 2

项 目	行次	差额	贷方	借方
10. 广告、宣传	14	9	38	29
11. 电影、音像	15	- 5	1	6
12. 其它商业服务	16	25	193	169
13. 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	17	- 7	8	15
B. 收益	18	- 53	1, 641	1, 694
1. 职工报酬	19	177	206	29
2. 投资收益	20	- 231	1, 435	1, 665
C. 经常转移	21	- 198	324	523
1. 各级政府	22	- 20	13	34
2. 其它部门	23	- 178	311	489
二、资本和金融项目	24	687	18, 180	17, 492
A. 资本项目	25	- 3	16	19
B. 金融项目	26	691	18, 164	17, 473
1. 直接投资	27	1, 375	2, 928	1, 553
1. 1 中国在外直接投资	28	- 557	419	976
1. 2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	29	1, 932	2, 510	577
2. 证券投资	30	604	1, 056	452
2. 1 资产	31	- 13	231	244
2. 1. 1 股本证券	32	19	138	120
2. 1. 2 债务证券	33	- 31	93	125
2. 1. 2. 1 (中) 长期债券	34	- 29	93	123
2. 1. 2. 2 货币市场工具	35	- 2	0	2
2. 2 负债	36	617	825	208
2. 2. 1 股本证券	37	306	386	80
2. 2. 2 债务证券	38	311	439	127
2. 2. 2. 1 (中) 长期债券	39	310	345	35
2. 2. 2. 2 货币市场工具	40	1	94	93
3. 其它投资	41	- 1, 289	14, 179	15, 468
3. 1 资产	42	- 2, 297	633	2, 929
3. 1. 1 贸易信贷	43	- 243	282	525

续表 2

项 目	行次	差额	贷方	借方
长期	44	- 5	6	10
短期	45	- 238	276	514
3. 1. 2 贷款	46	- 710	23	733
长期	47	- 297	0	297
短期	48	- 414	23	437
3. 1. 3 货币和存款	49	- 1, 318	326	1, 644
3. 1. 4 其它资产	50	- 26	2	28
长期	51	0	0	0
短期	52	- 26	2	28
3. 2 负债	53	1, 008	13, 547	12, 539
3. 2. 1 贸易信贷	54	- 30	145	174
长期	55	- 1	3	3
短期	56	- 29	142	171
3. 2. 2 贷款	57	193	12, 417	12, 223
长期	58	- 134	337	471
短期	59	327	12, 080	11, 752
3. 2. 3 货币和存款	60	824	941	117
3. 2. 4 其它负债	61	20	44	24
长期	62	19	24	6
短期	63	1	19	19
三、储备资产	64	- 1, 478	12	1, 490
3. 1 货币黄金	65	0	0	0
3. 2 特别提款权	66	1	1	1
3. 3 在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	67	3	6	4
3. 4 外汇	68	- 1, 481	4	1, 486
3. 5 其它债权	69	0	0	0
四、净误差与遗漏	70	- 736	0	736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二、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问题

（一）经常项目结构失衡严重，服务贸易逆差偏大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基本来自货物贸易。2014 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的原因在于出口显著提升。2014 年中国出口增加 6.1%，进口微升 0.4%，进出口总额仅有 3.4% 的升幅，连续三年未达到目标，但贸易顺差同比上升了 45%（见表 3）。中国出口上升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加速导致中国出口显著提升；而中国主要进口商品中，原油、大豆、铁矿石、钢材和铜材的进口量与进口价格都在下降，这可能与中国房地产投资继续处于弱势有关，而大宗商品价格颓势也导致企业补库存行为相对谨慎，因而中国进口下降，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增加。虽然中国已跃升至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但贸易结构升级依然缓慢。中国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增长较好，机电产品出口增速偏低。中国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增长较快，但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手机、集成电路等主要电子产品出口额均低速。就贸易方式看，中国目前一般贸易比重超过了加工贸易。在 2014 年前三季度中国一般贸易占比 54%，与上年持平；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合计占比 46%。中国的贸易伙伴仍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对发达经济体贸易增长较快，对新兴经济体贸易则走势分化。2014 年前三季度，欧盟、美国、东盟、香港、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在中国贸易中占比分别为 15%、13%、11%、8%、7%、7%、5%、3%。中国国内各区域的贸易发展情况也不同，中西部地区外贸发展动力强劲，其贸易占全国贸易的比重却只有 15%，但增速在 17% 左右，尤其是重庆、广西和湖南的出口增速均超过 20%；东部地区外贸占全国比重达 85% 左右，但增长较慢，只有 1% 左右。

表 3 2005 年—2014 年中国进出口总体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差额
2005	14219.06	23.2	7619.53	28.4	6599.53	17.6	1020.01
2006	17604.39	23.8	9689.78	27.2	7914.61	19.9	1775.08
2007	21765.72	23.6	12204.56	26.0	9561.16	20.8	2643.40
2008	25632.60	17.8	14306.93	17.3	11325.67	18.5	2981.26
2009	22075.35	-13.9	12016.12	-16.0	10059.23	-11.2	1956.89
2010	29740.01	34.7	15777.54	31.3	13962.47	38.8	1815.07

续表 3

年份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差额
2011	36418.64	22.5	18983.81	20.3	17434.84	24.9	1548.97
2012	38671.19	6.2	20487.14	7.9	18184.05	4.3	2303.09
2013	41603.08	7.6	22100.19	7.9	19502.89	7.3	2597.30
2014	43051.65	3.4	23431.3	6.1	19606.72	0.4	3824.58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2014 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为 1853 亿美元，进口为 3833 亿美元，逆差为 1980 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了 10%、16%、59%。服务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与上年持平，2013 年和 2014 年占比分别为 11.5%和 11.6%。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在进一步扩大，其中旅游贸易逆差居各类服务贸易之首，其次为运输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服务等。而咨询、其他商业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建筑服务则为顺差。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也反映出中国的贸易结构不平衡，应当加速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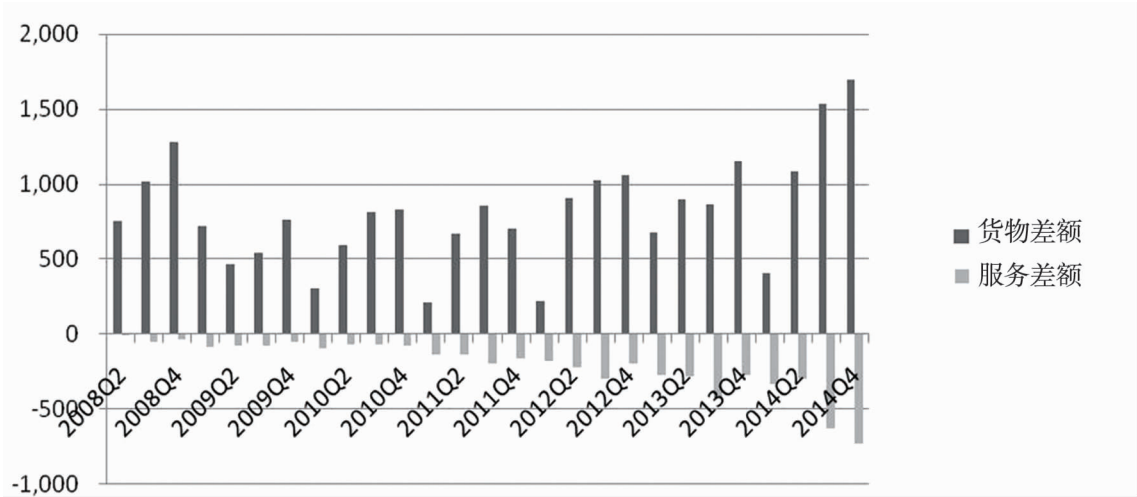


图 6 2008 年—2014 年中国货物贸易差额和服务贸易差额的对比（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二）资本和金融项目结构不平衡，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增大

1. 跨境直接投资的流入远大于流出

在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中的“跨境直接投资”项目中，跨境直接投资的流入远大于流出。2014 年全年中国跨境直接投资顺差为 1985 亿，其中服务业吸收的直接投资占一半以上。2014 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对外净投资增长很快，如图 7 所示，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

出双向流动，而且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比回流几乎多一倍。但是，境外对中国直接净投资的增长显然更快，境外投资净流入几乎是中国对外投资净流出的四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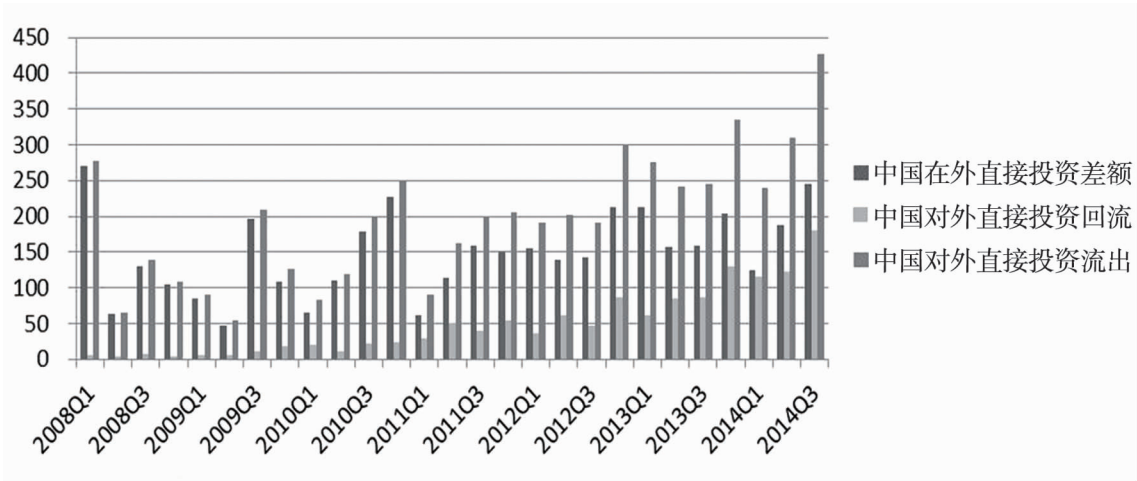


图 7 2008 年—2014 年第三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状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2. “证券投资”不断净流入导致中国股市和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监管更为困难

第一，中国对外证券投资是净流出。如图 8 所示，中国对外证券投资在 2014 年第一、第二季度是净流入，2014 年第三季度为净流出，前三个季度累计净流出 13 亿美元，2013 年同期净流出 56 亿美元，原因是中国对境外证券投资的净撤回在减少。从投资种类上看，中国对境外股本减持，对债券投资增持。其中，2014 年中国对外股本证券投资净回流 19 亿美元，2013 年为净流出 28 亿美元；2014 年中国对外债务证券投资净流出 31 亿美元，2013 年为净流出 28 亿美元。第二，境外对中国证券投资为净流入。如图 8 所示，2014 年前三个季度，境外对中国证券投资净流入 617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6%。其中，中国股本证券投资净流入 306 亿美元，债务证券投资净流入 311 亿美元，较上年分别增长 94% 和 30%。从投资期限结构来看，境外对中国证券投资偏向长期，表现为境外增加投资中国境内股本证券和中长期债务证券，而减持短期债务证券。这种证券净流入体现了 QFII 的流向（见图 9）。QFII 在 2012 年以来呈现明显的放量增长，目前总共获批准额度为 640.61 亿美元。由图 10 可见，2014 年 QFII 呈现急剧增长。由于外国证券投资的进入额度大幅增加，其对中国的证券投资也不断净流入，这与 2014 年中国股市大幅上升的趋势是一致的（见图 10）。但这部分资金可以随时撤出中国，增加了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和监管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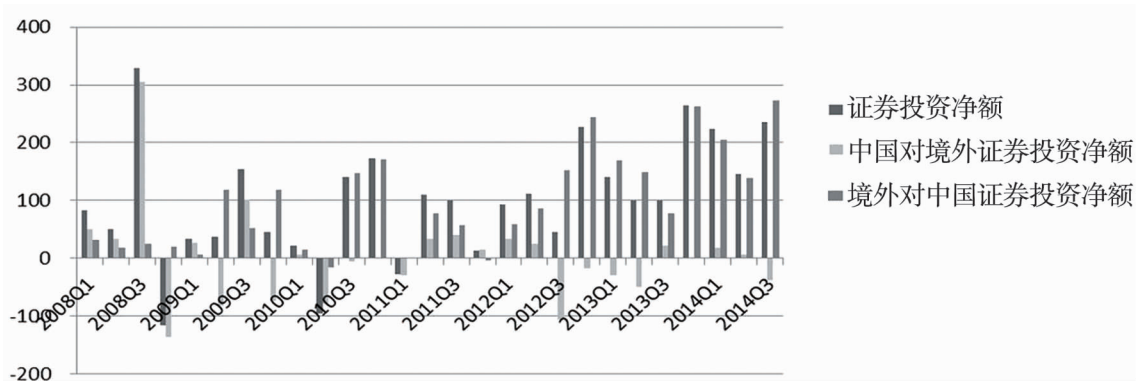


图8 2008年—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跨境证券投资净额（单位：亿美元）

注：中国对外证券投资正值表示净回流，负值表示净流出；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正值表示净流入，负值表示净流出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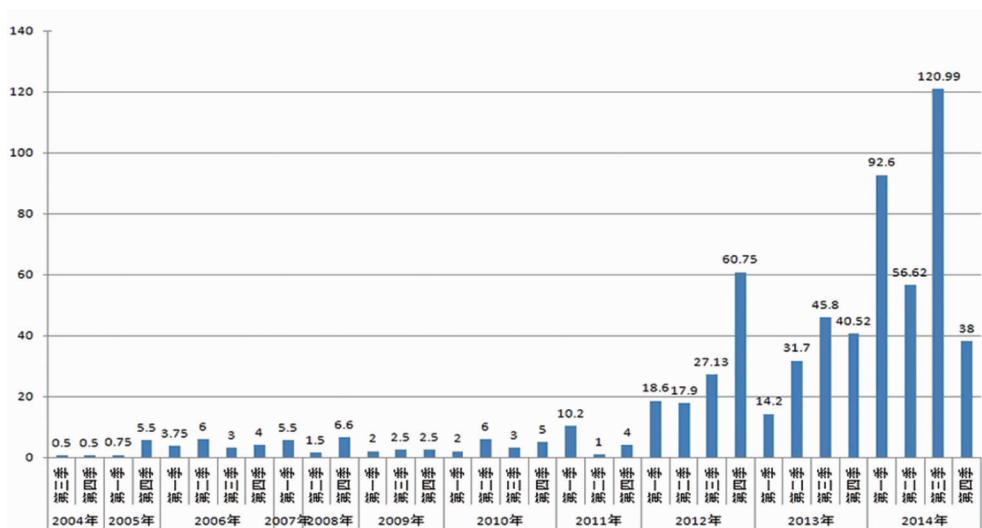


图9 2004年—2014年中国各季度QFII的获准额度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图10 2014年—2015年1月中国股票市场情况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

3. “其他投资”中的短期资产净流出比重过大

第一，中国“其他投资”非常活跃。“其他投资”成为影响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因素。2014 年第一季度中国“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等非直接投资形式的资本流动顺差为 402 亿美元，相当于经常项目与直接投资合计的国际收支交易顺差的 66%。2014 年第二季度中国非直接投资形式的资本流动转变为逆差 549 亿美元，相当于经常项目与直接投资合计的国际收支顺差的 49%，当季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转为逆差。2014 年第三季度中国“其他投资”的逆差为 772 亿美元，比经常项目顺差的 722 亿美元还多，当季资本和金融项目也表现为逆差 90 亿美元。

第二，中国“其他投资”逆差占资本金融账户的比重很高。2014 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该项下的资本流入和流出分别占资本和金融项下的资金流入和流出的 78%和 88%，其顺差和逆差也转化得很频繁、很剧烈。2014 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其他投资”净流出 1189 亿美元，其中，资产净流出 2297 亿美元，负债净流入 1108 亿美元，而 2013 年同期其他投资净流入了 505 亿美元。“其他投资”的流出资金多为短期性资金，其中，货币存款流出 1318 亿美元，高于贸易信贷和贷款总和，说明中国境内机构增加了以货币和存款方式的对外资产配置。这部分资金不仅很大地影响了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也证明了中国短期资本流出比较活跃。过去中国“其他投资”项下的流入资金尤其是短期贸易信贷、短期贷款大幅增长，原因在于中国境内本外币资金利率高于境外，中国境内向境外举债热情较高，境外对人民币资产需求也较强。但随着美元升值和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变化，资金开始流出中国。此外，中国“其他投资”项下的对外负债也在减少，境外对中国“其他投资”项下的资本净流入，即中国对外负债变现是净增加，前三个季度为 1008 亿美元，同比减少 25%。

（三）净误差与遗漏不断增加反映出隐性资金外流增多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的不断增加，反映出隐性资金外流增多。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用以保持收支平衡的净误差与遗漏项目自 2010 年以来已累计达到负 3000 亿美元以上，而 2014 年第三季度则创下了负 630 亿美元的纪录（见图 11）。这种资金外流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这类资金外流很难用监管手段加以控制，可能会影响到中国金融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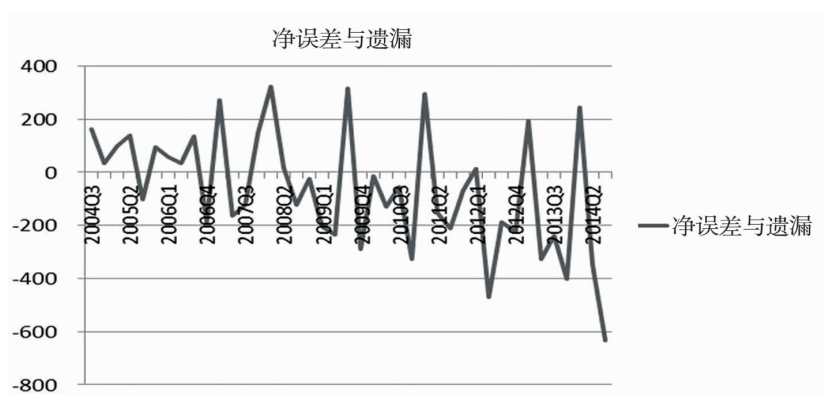


图 11 2004 年—2014 年第三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中的净误差与遗漏季度趋势（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四）国际投资头寸表反映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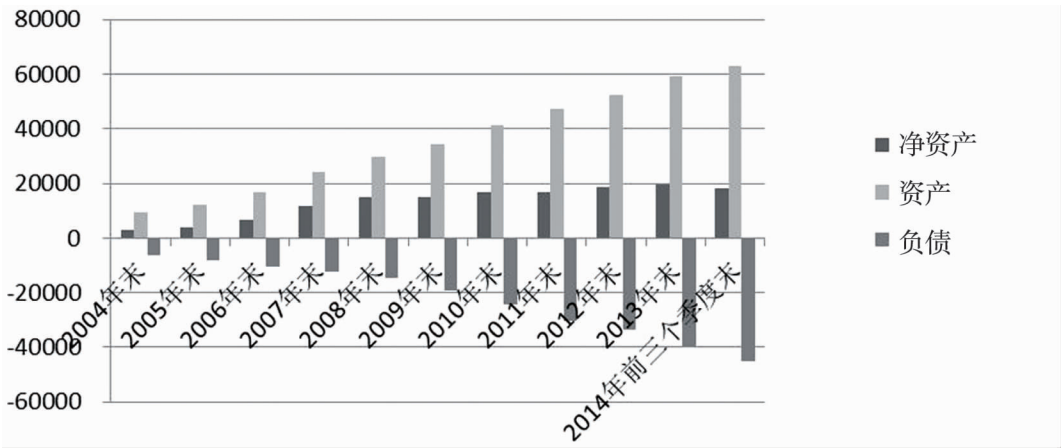
国际投资头寸表反映特定时点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统计报表，它与反映交易流量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一起，构成完整的国际账户体系。如果分析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见表 4），可以发现如下问题：

表 4 2014 年前三季度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单位：亿美元）

项 目	行 次	2014 年 9 月
净头寸	1	17, 962
A. 资产	2	62, 880
1. 对外直接投资	3	6, 648
2. 证券投资	4	2, 593
2.1 股本证券	5	1, 613
2.2 债务证券	6	980
3. 其他投资	7	14, 179
3.1 贸易信贷	8	4, 232
3.2 贷款	9	3, 715
3.3 货币和存款	10	5, 160
3.4 其他资产	11	1, 072
4. 储备资产	12	39, 459
4.1 货币黄金	13	410
4.2 特别提款权	14	107
4.3 在基金组织中的储备头寸	15	65
4.4 外汇	16	38, 877
B. 负债	17	44, 918
1.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	18	25, 454
2. 证券投资	19	4, 597
2.1 股本证券	20	3, 251
2.2 债务证券	21	1, 345
3. 其他投资	22	14, 868
3.1 贸易信贷	23	3, 335
3.2 贷款	24	6, 274
3.3 货币和存款	25	4, 983
3.4 其他负债	26	276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第一，2014 年对外金融净资产同比负增长。从对外资产和负债看，2014 年第三季度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 62880 亿美元，对外负债 44918 亿美元，对外金融净资产 17962 亿美元（见图 12），分别较上年末增加了 6%、13%和减少了 9%，中国对外金融净资产的增长出现了负增长。



12 2004 年末—2014 年第三季度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净资产状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第二，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明显存在主体错配。中国属于非成熟对外净债权人，对外净资产集中于中央银行和政府部门，对外净负债主体则为银行和企业等民间部门。截至 2014 年第三季度末，中国（官方）储备资产达 39459 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 1.7%；如果剔除储备资产，中国对外净负债变为 21927 亿美元，较 2013 年末增长 14%，可见中国民间部门对外净负债在进一步扩张。

第三，对外投资收益逆差扩大。中国对外投资收益项目的逆差扩大。2014 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对外投资收益项目下收入为 16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7%；其项下支出为 1694 亿美元，同比增长 9%；逆差为 53 亿美元，2013 年同期为逆差 27 亿美元。其中，职工报酬顺差为 177 亿美元，与 2013 年同期持平；投资收益逆差为 231 亿美元，扩大 60%。2014 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为逆差为 1129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外投资收益收入为 2808 亿美元，对外负债收益支出为 3936 亿美元。经过计算，中国对外投资年收益率为 6.3%，中国对外负债年收益率为 12.6%，中国投资收益总体为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以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储备资产为主，而对外负债则以高风险高回报的外国来华投资的资产负债结构有关。两者年化收益率相差 6 个百分点，可见中国投资收益还有很大改进空间。

第四，外汇储备的结构性风险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将近 4 万亿美元。通过以下计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外汇流动安全性较高。外汇需求包括三部分：短期外债清偿、证券组合资产变现和进口提前购汇。进口提前购汇又分为半年进口需求和一年进口需求两种假设前景。截至 2014 年第三季度末，中国短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 7089.55 亿美元，外资在华证券投资组合为 3744 亿美元，进口用汇按照 2014 年中国进口需求为 19499.89 亿美元计算。

第一种情景：一年的外汇需求：7089.55 亿美元 + 3744 亿美元 + 19499.89 亿美元 = 30333.44 亿美元，外汇储备 36627 亿美元，那么，外汇需求与外汇供给之比为 82.8%。

第二种情景：半年的外汇需求：7089.55 亿美元 + 3744 亿美元 + 9749.95 亿美元 = 20583.495 亿美元，外汇储备 36627 亿美元，那么，外汇需求与外汇供给之比为 56.2%。

从以上两种情景来看，即使出现资本外逃，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依然能够从容应对外部冲击。

尽管如此，中国过高的外汇储备仍然意味着明显的风险。

第一，对外金融资产中的储备资产比重过高。2014 年第三季度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 6648 亿美元，证券投资为 2593 亿美元，其他投资为 14179 亿美元，储备资产为 39459 亿美元（见表 4），分别占对外金融资产的 11%、4%、23%和 6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贷款两者合计占 34%，比例为历年最高，反映了中国企业和境内银行“走出去”的步伐在加快。中国对外证券投资与 2014 年上半年比重持平，说明中国境内机构对风险资产的偏好较低。2014 年前三个季度，剔除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的影响（下同），中国储备资产增加 1478 亿美元（2013 年同期增加 3006 亿美元），其中外汇资产增加 1481 亿美元。中国储备资产继续占据对外金融资产首位，占总资产的比重比 2014 年第二季度末仅减少 1%，为 2008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其规模仍然过大。由于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并存，意味着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富余外汇储备。

第二，负债类外汇储备增长将增加国际收支被动调整的压力。外汇储备增长有不同的来源，是源于经常项目还是资本和金融项目，以及在金融项目下形成的外汇储备中是属于资产类储备增长还是负债类储备增长，都必须理清。2014 年前三季度中国累计新增外汇储备源于经常项目顺差 1537 亿美元和资本金融项目顺差 687 亿美元。而 2014 年前三个季度的中国金融项目顺差基本都来自于“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项下的负债类储备增长。在金融项下，外汇储备的增长一部分来源于资产类项目，另一类来源于负债类项目。前者包括中国在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中的资产项下交易和“其他投资”中的资产项下交易；后者包括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中负债项下交易和“其他投资”中的负债项下交易。从中国国际收支情况看，金融项下外汇储备增长几乎完全依靠

负债类项目。从理论上讲，如果一国金融项下外汇储备的增长来源于资产类项目，则后期调整的主动性较大，若主要来自于负债类储备，则后期调整的难度较大。2014 年前三季度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负债结构中证券投资的比例上升，外国来华直接投资 25454 亿美元，证券投资 4597 亿美元，“其他投资” 14868 亿美元（见表 4），分别占负债的 57%、10%和 33%，这与 2014 年上半年比例持平。2014 年前三季度外国来华投资占比是 2008 年以来最低水平，而证券投资的比例上升，而其中股份证券又占证券投资的四分之三。如果资本和金融项目中的外汇储备增长来自这一部分，由于随时可以变现，显然风险很大。

第三，负债类外汇占款的下降趋势可能与短期投机资本有关。2014 年第一、第二、第三季度中国的外汇占款增加分别为 1255 亿美元、224 亿美元、-1 亿美元，呈现下降趋势（见图 13）。中国外汇占款负增长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是美元不断升值，短期资金大量流出中国；二是中国境内居民和企业倾向于持有外币，减少结汇，或者中国境内企业和个人转向做多美元，开始“负债本币化、资产外币化”的财务运作；三是中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企业对外投资增大，“其他投资”项下中国对境外资本出现净流出等。但是如前分析，这部分跨境资本的净流出是以短期资本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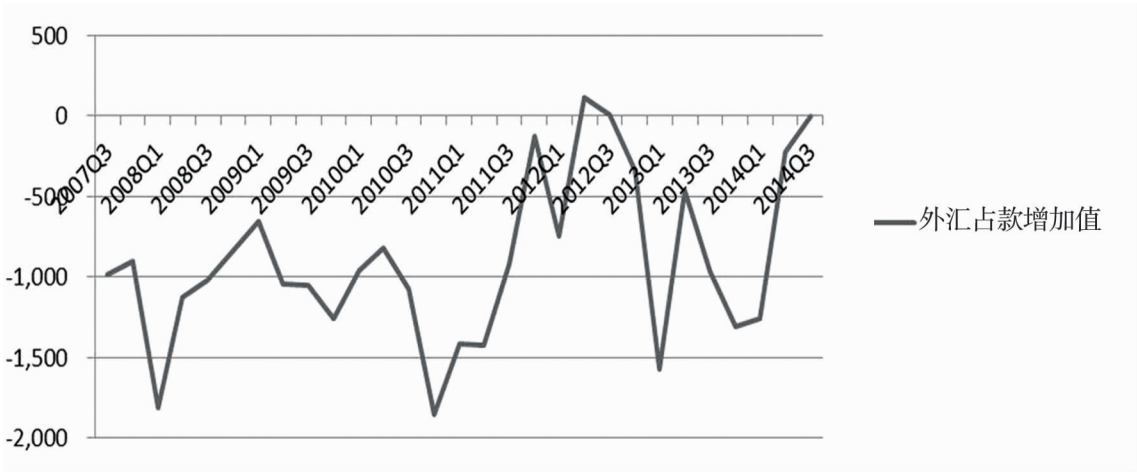


图 13 2007 年—2014 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外汇占款波动态势

注：外汇占款增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表现为负值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三、2015 年国际收支展望及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国际收支在 2014 年仍呈现出双顺差格局，而 2015 年中国将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中国国际收支有望进一步趋于平衡。

（一）2015 年中国国际收支展望

2015 年影响世界经济的主要因素如下：第一，世界经济复苏不均衡。2014 年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弱于预期，2015 年要好于 2014 年，美国仍保持较强的复苏态势，欧元区国家为避免经济衰退会采用更积极的货币政策，日本会逐渐消化其消费税率提高的负面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分化，增速继续放缓。世界经济继续缓慢复苏，IMF 预计增速在 3.7% 左右。第二，世界贸易继续低速增长。中国社科院预测 2015 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仅在 3.5% 至 4% 之间。第三，宽松的货币状况继续增大全球金融风险。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已持续 6 年。美联储已退出量宽政策，但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仍继续推行量宽措施，国际资本流向出现调整，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增加。第四，油价下跌是一把双刃剑。低油价有助于各国相关制造业成本下降，有利于原油消费国降低成本，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但是也将导致石油出口国尤其是俄罗斯经济风险巨增，对于很多国家的石化产业价格影响很大，会影响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第五，俄罗斯卢布贬值的影响。俄罗斯卢布兑美元汇率在 2014 年贬值 40% 以上，原因在于俄罗斯经济对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过分依赖。俄罗斯央行可用来干预汇率市场的外汇目前仅有 2000 亿美元左右，但其政府外债很少，债务危机的主要风险在于纯私人机构的外债上。这也提醒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要降低对出口的依赖、严格控制外债以及一定要有序放宽资本管制。第六，发达国家物价低位徘徊，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发达国家通货膨胀水平主要由供求决定。全球经济有效需求不足，难以出现需求推动的物价上涨。从供给看，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供给充裕，不会出现供给不足导致的通货膨胀。但是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通胀水平较高，其电力、天然气的垄断价格会加剧通货膨胀，其货币贬值的预期也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也加剧通货膨胀。

2015 年中国国际收支的基本判断是，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跨境资本流动双向波动加剧。一是中国将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尤其是货物贸易顺差还将是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经济增速为中高速，人民币利率仍会高于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利率，这使中国能保持对中长期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但是，2015 年全球经济温和增长以及商品价格探底影响，中国货物贸易虽然稳健，但进出口总值可能为个位数增长。二是资本和金融

项目可能会持续逆差。资金持续外流，以及中国不断加速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会促进中国企业加大“走出去”力度，银行在境外的存款也会增加，这些因素会导致 2015 年中国资本金融账户可能会延续 2014 年趋势，出现各季度的资本项目逆差。三是短期资本的监管难度增加。国际上的不确定性因素，比如全球的流动性过剩，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将继续分化，美国加息预期导致本外币利差缩小，将加速中国境内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币种结构调整；中国各项政策改革带来的股票市场上扬等利好情况，都会导致中国跨期短期资本流动加剧，从而增加监管难度。

（二）促进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建议

第一，加快服务贸易发展，优化结构，拓展空间。中国对外贸易正处于增速换挡期和结构转型期，制造业比较优势削弱，服务业亟需发展。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中国进入全球产业链的高端，才能促进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要优化贸易结构，提升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占比，加强对服务出口领域的指导。要以开放促发展，支持服务业企业通过新设、并购等方式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

第二，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投入国，2014 年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为逆差，根据上文分析，证券和“其他投资”项下的资本进出基本持平。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其他投资项下的资金输出明显增大，中国对外资本净流出持续增加，这得益于“走出去”战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未来中国资本流出情况还会持续。建议在“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对能源、资源类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周边国家增大以人民币为主进行的境外投资，继续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来推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

第三，注重外汇流动性安全，有效管理外汇储备。一是把流动性与收益性原则相结合，寻求流动性与收益性之间的平衡点。中国外汇储备充足，可以从容应对资本外逃的冲击。建议中国动态界定外储储备规模，并进而确定富余储备规模，将适度储备和富余储备分别管理。对于最优规模类的外汇储备，以流动性为管理目标；对于超过最优规模之外的外汇储备，建立积极的管理模式，通过专业投资公司运作以提高收益率。二是妥善安排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根据国际外汇市场上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变动趋势，前瞻性地优化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三是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出发，动用部分外汇储备，抓住石油等大宗商品国际价格较低的时机，采购石油、矿产等战略性和稀缺性资源。购买的战略储备物资，既可作战略储备，也可在适当价格上抛售获益。四是继续推进外汇管理改革。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已显著改善，但体制机制问题并未完全解决，需要深

化外汇管理改革。要制定改革总体方案，结合国际收支形势逐步重点推进。要打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管理的界限，通过统计监测、事中事后监管，使得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国际收支、外汇检查能协同互通。

第四，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扩大开放后，跨境资金波动可能会经常化。对于资金的流入流出要有心理和措施上的准备。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就有利于长期资本的流入，改革顺利推进就能解决一些价格扭曲，因此，中国经济只有持续发展才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人民币可兑换程度不断提高和市场扩大开放的挑战。

第五，加强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双向监管。短期国际资本通过相关渠道已经进入中国的证券和房地产等领域，进行投机套利活动，其潜在风险不可小视，应未雨绸缪，采取应对措施。由于全球量化宽松政策依然存在，人民币仍是相对高息货币，国际资本仍会进入中国境内进行套利交易，而美联储可能于 2015 年 9 月加息的预期会引起全球资本流动的大幅振荡，短期资本可能会加速外流，中国境内企业也将面临债务去美元化压力。而地缘政治冲突等突发事件也将给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在经常项目趋向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接近合理均衡水平的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增强，尤其是 2014 年第四季度，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远大于经常项目顺差。“其他投资”已成为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重要决定因素，“其他投资”的短期资金非常活跃，应当格外关注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中国要完善国际收支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健全外债和跨境资金流动管理体系，从而增强国际收支自主平衡的能力，以形成国际收支平衡的长效机制。此外，中国应考虑开征金融交易税，增加短期资本的进入成本，抑制短期资本的频繁流动。

第六，中国需要通过两个“优化”来调整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是长期任务。首先，中国要优化经常账户结构。中国的服务贸易相对于货物贸易是滞后的，中国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既可以扭转贸易账户失衡又可以减轻中国货物贸易的过度顺差，服务贸易发展对资本金融账户变化也有直接影响，帮助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其次，中国要优化资本和金融账户。要保持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中国 FDI 的净流入，由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风险，可能还要不断增加，因此要适当控制 FDI 的流量及流向，对大量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高污染的资金流入项目要严格控制，鼓励技术先进、附加值高、有助于提升产业结构的资金项目进入。因此，保持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要注重风险防范，实现良性循环，才能保证中国国际收支的均衡发展。

(下转第 72 页)

· 国际经济 ·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发展新趋势^{*}

白津夫 刘中伟

摘要：在全球价值链整合和产业跨境转移背景下，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在经济上对东亚区域贸易投资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伴随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融合互动，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全球转移，以及东亚区域内经济体自身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的诉求，逐步形成了富有东亚地区特色的服务生产网络。本文力图通过研究全球价值链的深度整合对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分析和反映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具体特征，同时对其未来可能对区域服务贸易发展与东亚经济一体化治理机制的启示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 东亚服务生产网络 服务贸易 服务外包

作者简介：白津夫，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
刘中伟，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21 世纪以来，伴随工业化国家消费需求模式的转变和跨国公司开展跨境外包的广泛兴起，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对外贸易发展，不断释放各自的生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合作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62015T57）的阶段性成果。

产和服务供应潜力，结合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全球转移的新趋势，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生成和延伸。同时，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升级又不断促进全球服务贸易衍生出新的特点：一是服务业与制造业不断融合互动，生产性服务贸易快速增长；二是全球性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转移不断加快；三是区域性和各国国内产业结构及布局不断调整，区域服务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诉求不断增加。

传统的东亚生产网络由“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演变发展而来，但自20世纪末起，随着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投资和生产战略的调整，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技术层次递减、垂直产业间形成分工格局的认识开始遭遇挑战。此时，东亚地区的生产和服务分工形式逐渐形成以“分散化”（fragmented production）为基础^①，遵循产品和服务在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展开地区性分工，特别是通过产业内及产品内服务贸易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网络状的新型区域生产和服务体系^②。

一、全球价值链的生成与区域生产网络的演进

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③，“在亚当·斯密看来，它几乎是作为经济进步的唯一的因素”。毫无疑问，国际生产网络框架的形成是分工国际化的结果，是生产过程和地理空间、社会制度相结合的生产组织形式。^④国际生产活动由原来主要是一国内部或区域间的分工转变成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分工，由企业内部的简单流程扩展为遍布全球的巨大网络。这种新型生产模式的出现，源于产品生产的价值链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价值链的生成和发展成为国际生产网络出现的重要微观基础。

1990年，迈克尔·波特在提出“企业价值链”概念的基础上，又将其理论的研究层面拓展到企业外部，并突出了价值链的空间分离。^⑤格里芬随后将“价值链”的概念推广到世界范围，并与国际产业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的分析框架，用以考察如何提升产品在国际产销体系中的竞争优势。该理论以

①这里的东亚地区是指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后文如涉及其他东盟国家时将予以说明。

②刘中伟：《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页。

④吴锋：《生产边界与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研究述评》，《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⑤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85年首次提出了“企业价值链”（value chain）的概念，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在其内部建立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价值增值活动”（value added），使得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产生增值效应，最终产生的增值总和就构成了企业的“价值增值总和”。参见朱妮娜、叶春明：《全球及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研究文献综述》，《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两个模式来探究产品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升级,并特别强调在构建全球商品链时需要注意投入—产出(input-output)结构、领域性、政治结构及制度框架。^①21 世纪以来,学术界开始普遍使用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术语,福瑞斯塔首次明确提出,全球经济中应将“全球贸易一体化”与“生产垂直分离”有机结合。其中,发达国家保留核心的生产和服务业,向外转移其非核心生产和服务活动,通过全球采购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则通过承接上述非核心生产和服务活动,介入全球价值链并不断实现升级。^②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及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的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③相比价值链在企业组织中的纵向维度特征,全球价值链是价值增值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体现,而全球生产网络则更成为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形式。产品构成越复杂,生产和服务工序越多,价值链的纵向维度就越长,并逐渐从组织规模和生产性主体上形成层级关系。同时,相关产业越庞大,进行专业化分工所获得的规模经济就越大。价值链横向维度的日趋发达,将从地理分布上不断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生产和服务网络结构。^④

国际生产网络(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的出现实际上是国际生产体系的重大变革,是全球价值链延伸和整合、国际生产模块化与服务外包(outsourcing)、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等国际化生产现象的总体概括。^⑤这一生产体系由此产生大量中间品和生产环节的贸易,其中大部分体现为生产性服务贸易,对不同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①Gary Gereffi,“The Organization of Buyer - Drive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How U.S. Retailers Shape Overseas Production Networks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in Gary Gereffi and Miguel Korzeniewicz, eds.,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Westport: Praeger, 1994, p. 74.

②姚战琪:《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战略及重点领域——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升级视角的研究》,《国际贸易》2014 年第 7 期。

③United Nations Industr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Report 2002/2003, 2002, pp. 107~116.

④T. Sturgeon and J. Lee, “Industry Co-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a Shared Supply Base for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paper presented at Nelson and Winter Conference, Aalborg, 2001.

⑤浦华林:《产品内国际分工与贸易对我国贸易平衡的影响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1 年第 4 期。

在理论层面，亨德森使用全球生产网络概念时提出，“全球”意味着多种规模范围，即生产网络可以是全球的，也可以是区域的。^①厄恩斯特和古里耶里、安藤光代和森田福成分别研究了日本、美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并从企业角度分析了美日企业在东亚以及拉美的生产网络，认为东亚的生产网络基础更发达，区域投资环境因素对推动生产网络发展更为重要。^②奥巴马采用 Kaplan—Meier 估计方法和 Cox 比例风险模型，研究了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东亚生产网络的稳定性，认为随着区域内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东亚经济体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贸易联系；同时，建立在生产链基础上的中间品和服务贸易与其他交易相比更具持续性。^③

在现实中，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生产网络的生产组织形式在区域层面的发展更加迅速。目前，全球主要有北美、中东欧和东亚三大区域性生产网络。其中，北美区域生产网络层次简单，以美国的跨国公司总部与墨西哥子公司间的前向或后向关联为主，即在墨西哥完成最终产品的组装后返销美国。中东欧区域生产网络比北美区域生产网络的区位分布更为广泛，但产品内分工体系并不完善，很多部门的中间品和服务依靠从域外国家或地区进口，特别是东亚国家对该区域生产网络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相比之下，东亚生产网络的空间分布非常广泛，包括众多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发展较为完善且特点鲜明，主要表现在一般机械、电子机械、运输设备、精密仪器等传统机械制造领域的企业内和企业间生产关系非常成熟。^④更重要的是，区域生产网络的服务生产和转移快速增长，越来越引起东亚贸易结构的显著变化，甚至改变了东亚区域内外国和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形式。东亚生产网络已经逐渐重塑了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分工结构，将服务贸易“嵌入”区域生产网络成为其新的发展形式，促进区域内各经济体共享服务产业链分工的发展机遇。这对推动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乃至区域地缘政治利益、国际经济关系和安全而言，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①J. Henderson and P. Dicken, et al.,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9, No. 3, March 2002, pp. 436~464.

②Dieter Ernst and Paolo Guerrieri,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Changing Trade Patterns in East Asia: The Case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DRUID Working Papers 97—7, 1997; Mitsuyo Ando and Fukinari Kimura,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NBER Working Papers No. 10167, 2003.

③AyakoObashi, “Stability and Resiliency of Produc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he Impact of theGlobal Recessio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nd GEP Conference in China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eld on November10—11, 2009.

④刘德伟：《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论文，2010年。

二、全球价值链整合中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融合互动

在新贸易理论研究中，作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服务贸易理论的代表，琼斯和凯茨考斯基提出了“生产区段和服务链理论”，探讨了生产方式改变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①马库森和弗兰克斯则分别从需求的角度分析认为，由于服务贸易尤其是生产者服务贸易具有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而且许多中间产品又具有差异化或与国内要素互补的特性，因此生产者服务贸易优于单纯的最终产品贸易。此外，弗兰克斯还强调了服务在协调和衔接各专业化生产过程中的外部聚集作用，以及生产者服务贸易对货物生产的影响。^②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兴起，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和国际服务外包迅速扩张，传统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构建正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价值链融合互动的方向整合，从而形成基于新贸易理论视角的全球价值链新布局。

（一）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产业分工细化和制造业跨国转移

伴随全球价值链的生成，制造业生产工序的分散化和生产环节的不断分工，催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以代工方式加入无国界的生产系统中，逐渐推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将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然而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供应关系所引发的企业学习效应，传统生产和管理活动中的服务不断分离出来，并得以成熟化和标准化，形成价值增值的新空间；而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则通过模仿和升级寻求向价值链高端移动，承接和发展制造业转移过程中的各类生产性服务需求（如图 1），从而逐步形成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互动发展的局面。

（二）服务业的全球转移和国际服务外包扩张的现实

随着发达国家向服务型经济转型步伐不断加快，世界整体经济结构加速向服务业转变，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大规模全球转移。其中，服务业全球跨境直接投资

^①Jones, R., & Kierzkowski, H., “The Role of Services in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Jones, R. and Kierzkowski, H.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asil Blackwell Inc. 1990.

^②Markusen, J. R., “Trade in Producers Services 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 pp. 85 ~ 95; Francois, J. F.,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 and th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 (23), pp. 109 ~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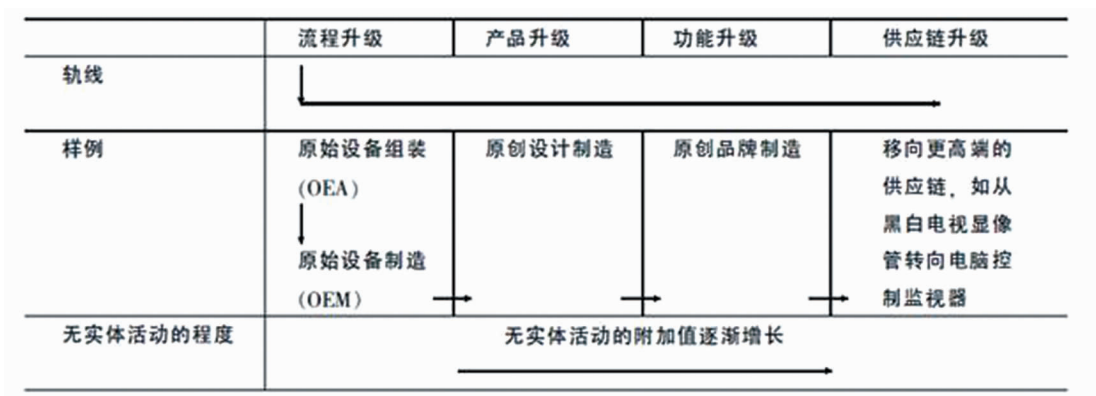


图 1 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可能路径^①

由 20 世纪 70 年代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 25%，大幅上升至 2005 年以来的 70% 以上，同时，全球服务业年均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超过 60%，全球贸易出口增加值的 46% 由服务部门贡献。^② 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科技研发、会计法律、教育培训和其他专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投资扩张势头强劲，促进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推动全球服务价值链日趋形成，成为改变全球服务贸易结构的重要因素。

服务业全球转移和跨境投资的重要载体是国际服务外包或称离岸服务外包，根据格里芬等人的划分可以包括信息技术服务外包（ITO）、知识流程外包（KPO）和商务流程外包（BPO），^③ 从 IT 工程应用技术和基础设施运营，到商务咨询分析和公关法律事务，再到企业资源管理和营销客户关系服务，使原来在一国或一家企业生产的服务转变为全球分散性完成，推动全球价值链向“服务价值链”转变。麦肯锡环球研究所的研究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境向外转移一美元业务，将节约成本 58 美分，主要来自于人员成本降低、人才素质提高和研发时间周期缩短等因素，采取国际服务外包的平均成本节约超过 65%。^④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全球服务外包产业规模约为 1.2 万亿美元，市场规模仍以年均 30%~40% 速度增长，发展势头日趋迅猛。^⑤

① B. Lüthj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The Case in Electronics Contract Manufacturing”, 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 2004.

② 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 (中文版)》，中国投资指南网，<http://www.fdi.gov.cn/>。

③ Gary Gereffi and Karina Fernandez—Stark, “The Offshore Services Value Cha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Crisis”,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262, 2010.

④ 张珺:《全球产业转移下的服务生产网络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科技管理研究》2010 年第 11 期。

⑤ 原小能:《国际服务外包与服务企业价值链升级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2 年第 10 期。

(三) 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下的全球价值链整合模式

以发展的视角看待全球价值链整合，不难发现当前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渗透，产业边界日渐模糊，兼具制造业和服务业特征的新型业态已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形式。一是制造业本身日趋服务化，在流程、产品、功能和供应链条升级上不断向服务业拓展和延伸；二是服务业发展日趋工业化，服务业凭借知识密集、技术集中、贴近需求和顾客等多种产业优势，不断与制造业具有的标准化、流程化和设备化相结合，将无形产品与有形产品相结合，形成一体化的最终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三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是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核心，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制造业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的辅助和粘合，可以根据对价值链环节和价值增值的重要程度，分为辅助生产性服务业和核心生产性服务业，从而确定哪些服务可以外包进行，哪些保留在企业内部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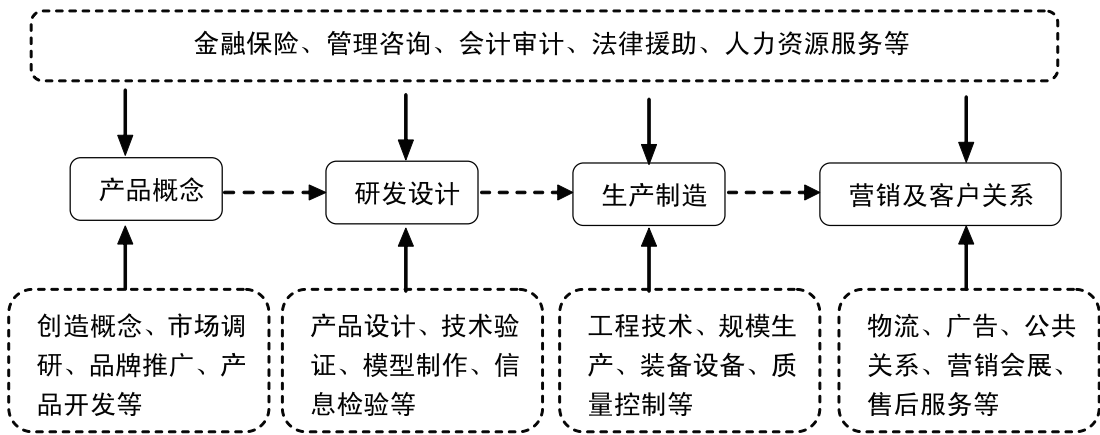


图 2 全球价值链整合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互动^①

伴随全球制造业转移的路径和需求空间调整，原有价值链中的制造业承接国也随之承接了对制造业提供支持的各类服务提供，根据国际生产网络中不同层级的厂商职能，从生产制造延伸到设计开发、产品定型、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如图 2），不断与各类制造业融合互动，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新布局 and 分散全球的服务生产网络。当然，发达国家仍大多处于全球服务价值链的主导地位，掌握高新技术和设计、市场资源和开发、资金筹措和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围绕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优势，开展服务产品测试、标准化生产维护和其他代工技术服务等劳动密集型生产性服务。

^①姚战琪：《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战略及重点领域——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升级视角的研究》，《国际贸易》2014 年第 7 期。

以离岸服务外包为代表，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仍然是主要的服务业务发包方，其中美国占全球市场的 64%，欧洲和日本分别占 18%和 10%，其他经济体所占比重不到 10%。^①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等服务业传统发达国家，承接了部分相对高端的服务外包业务，而印度和东亚地区经济体则是服务外包主要承接中心，但仍以 ITO 和部分 BPO 为主要形式，根据各自不同的特色领域，构成与之承接制造业发展相融合的全球服务提供者（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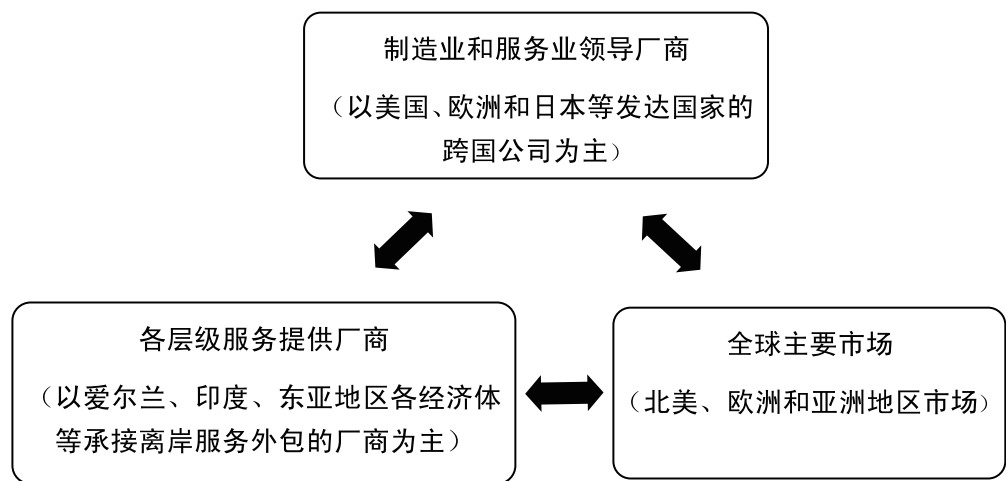


图 3 全球服务生产网络构成的基本框架

（四）全球价值链整合的内在矛盾与区域服务生产网络的发展动力

根据《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价值链及其复杂网络日益成为贸易的推动力，全球价值链增值的贸易模式主要由跨国公司的投资决定，跨国公司协调的全球价值链约占全球贸易的 80%。^②因此，在基于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的全球价值链布局中，跨国公司往往通过其跨境子公司、合资或合同关系等复杂的供应商关系网络和治理模式，实现在价值链中权力结构控制和经济利益分配的双重“话语权”。无论跨国公司采取所谓金字塔管理，亦或是扁平控制说，始终无法回避其对下游供应商带有控制与剥削的特征，成本和风险仍然是其战略考虑的第一要素。^③

然而，伴随服务业的全球转移，全球价值链整合所创造的贸易流不断呈现出扩散化和区域化特征，在价值链上下端控制关系中的自我矛盾性日趋激烈。一方面，跨国公司希望通过有效的合同关系，确保对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价格和质量的控制，保护和稳定

①原小能：《国际服务外包与服务企业价值链升级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2 年第 10 期。
②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中国投资指南网，<http://www.fdi.gov.cn/>。
③王中美：《全球价值链的新趋势、新平衡与关键命题》，《国际经贸探索》2012 年第 6 期。

自己的利润，通过更分散的生产和服务过程限制供应商的升级路径；但同时这种控制力的维系需要建立在对价值链中下端供应商专业化水平的培育基础上，并不可避免的集中在某些特定区域，而这些国家通过发挥学习效应，提升自身竞争力，直至带动整个区域的产业升级，区域内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也自然获得动力。另一方面，尽管全球价值链整合后的层级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但其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目的地，并不都是发达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不仅扮演着全球中间产品和服务生产的聚集地，同时也不断形成对上游市场的强大反制力，既反映在对国际大宗商品和各类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上，也体现在区域内外创建更下游的价值链，从而使得原来处于价值链低端区域经济体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因此，在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互动的趋势下，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同位置的参与者将越来越走向相互制衡，既不是简单的“地理上的转移”，也不是绝对的控制与被控制，互补共赢才是全球价值链整合发展的核心。未来，区域价值链的联系将比全球价值链更为重要，更大和更深的服务专业化、离岸服务外包的规模化和集约化、以效率和创新驱动的服务经济发展，将成为改变全球价值链层级状态的新动力，而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则成为维持价值链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的“润滑剂”和“加速器”，必然与价值链和服务生产网络形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内在制度性机制。

三、开放性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及其主要特征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制造业转移和升级为背景，东亚地区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为“雁身”、中国与东盟部分发展中国家为“雁尾”的，以产业间垂直分工为特征的“雁行发展模式”，从而使本地区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伴随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承接产业转移而带来的“经济起飞”，日本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日益复杂，原来层次分明的分工格局在相互赶超过程中不断模糊，“雁行模式”日趋式微。^①

同时，东亚经济却在不断调整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竹节型资本主义”（Bamboo Capitalism），即通过跨境直接投资、跨境生产协作和中间产品贸易的兴起，使东亚经济体不断成长，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多样性且充满活力的产业群和价值链、商品和货物贸易

^①刘中伟：《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当代亚太》2014 年第 4 期。

网络,^①即新型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和高水平区域货物自由贸易化机制。就其分工体系和贸易增长机制而言,弗兰西斯和耶茨认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亚国家正在价值链的不同区段进行专业化分工或称“生产分享”。^②特别是近十年来,东亚地区经济体又通过技术传播和技能培养、产业调整和规模经济,不断将服务业竞争力提升和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吸收到区域生产网络的升级中,将强大的生产能力、专业设计能力和自主品牌营销能力相结合,从简单的贴牌生产(OEM)发展到设计生产(ODM),正在向品牌生产(OBM)进行战略性定位和转型。其间,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成为重要媒介和工具,就此形成了开放性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基本特征。

一是东亚区域制造业生产网络发展成熟,在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互动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服务生产链转移有的放矢,较少出现中间环节的多次转移,服务成本、服务质量和专业化水平得以有效保证。二是东亚地区科技、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优势明显,承接服务的种类和领域广阔,既有为制造业提供支持的各类生产性服务业,也有单纯的服务产业转移,例如生物制药、微电子和通信技术、软件和创意文化产业等新兴服务业态。三是东亚区域各经济体各具禀赋特色,承接和开展的服务生产环节各有侧重。例如,中国、越南等国在软件外包和数据处理方面提供的服务,新加坡的信息枢纽和金融后台服务,马来西亚的企业后台运作和客户服务,菲律宾的呼叫中心服务和动画影像、数据输入处理服务等。四是东亚区域内外仍呈现服务业高低端差异,服务提供分散和集中并存。由于涉及知识积累和应用经验的差异,跨国公司仍然掌握更为复杂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主导权,除日本外的大多数东亚经济体尚处在中低端服务产业的分散趋同竞争中,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处于价值链的核心位置并未明显改变,呈现出区域内外开放、共享和互补的服务提供格局。五是区域内各经济体在服务生产网络中的经济地位和权力格局日趋非对称。经历多年经济的高增长,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东亚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实力、人力资本、专业技能、研发投入和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已逐步在区域内形成更高层次的服务业规模、专业优势和庞大市场。为此,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内部的服务价值链环节也将延伸不同层级状态,形成区域内不同附加值服务的相互提供与承接关系,并不断演进成为最终产品和服务消费的终端市场。

^①David Roland-Holst, IwanAzis, and Li-Gang Liu, “Regionalism and Globalism: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Trade Relations in Wake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ADB Institute Research Paper Series, 2003, p. 16.

^②Francis Ng and Alexander Yeats, “Production Sharing in East Asia: Who Does What for Whom, and Wh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197, 1999.

正是伴随东亚区域服务价值链环节的延伸与转移，特别是各类与制造业发展联系紧密的生产性服务的提供和使用，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规模、种类和范围的扩张势不可挡。既往东亚生产网络形成的发达国家前端工序生产—东亚国家组装加工—最终产品流回发达市场的“三角贸易模式”（Triangle Trade Pattern）已日渐模糊^①；现实中更多的是，生产过程的不断碎片化和分散化，设计和服务外包的不断转移和层级化，服务价值链上的布局和制约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共享”及“服务共享”上变得更加相互依赖。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市场作为最终销售地不再一家独大，东亚新兴终端市场的不断壮大，也推动了要素流动和商品流动在域内外同步循环发展，将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由此，开放性的服务生产网络逐渐成为整个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结构动力，带来开放的、复杂的和网络状的多边与区域相融维度下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问题。

四、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治理互动

如上文对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特征的分析，从东亚地区合作的功能而言，开放性的服务生产网络作为促进参与国际合作获益的治理设计和安排正在悄然形成，东亚服务生产网络通过与区域内外各国经济利益交织的日益密集，逐渐成为整个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结构动力，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形成有效的治理互动。

伴随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开放性发展，传统价值链理论所认为的终极采购商通过合同关系控制全球供应商的中心地位已出现动摇，组织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市场已不完全是最终产品流向国，而有可能是众多中间产品的汇聚地。尽管价值链的层级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但现实中服务提供和订单转移不可能随时调整。因此，贸易流向的区域化与扩散化，使得像东亚服务生产网络这样处于价值链中下端的地区，所具有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就本质而言，东亚服务生产网络是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规模经济，通过东亚地区与域外国家实行高度专业化分工，协调形成一体化国际生产，最大限度追求全球资源整合效率和价值增值的经济结果。因此，跨国公司要实现由地理上分散和不完整的生产服务体系，转向跨区域性甚至全球性一体化生产、服务和分销体系的目标，就必须有效实现跨国协调成本的降低、投资政策壁垒的消除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治理的加强。

^①刘中伟、沈家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影响与中国的应对》，《太平洋学报》2013 年第 1 期。

同时，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则需要通过开放性的区域经济合作，将各类生产、服务、投资和贸易行为纳入到全球服务生产网络之中，以充分发挥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提升整体产业结构并实现均衡发展，增加自身在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中的话语权。可以说，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相互依赖、互相促进的联系日趋显现，东亚服务生产网络正在以开放性为特征，发挥其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的功能性作用，从企业、市场、社会 and 贸易层面的地区集体意志出发，寻求从理念到实践的东亚开放性地区合作。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东亚服务生产网络与区域经济合作治理互动的内涵。

第一，开放性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根本基础是分工问题，分工产生的效率使得企业与市场的地理边界越来越模糊。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下，服务供应企业可以依托地区内经济体形成的地理上的“网格节点”，即结合处于不同区位服务经济部门的特点和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环境特征，在开放性区域分工中构建竞争与合作关系和网络组织形态。

第二，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在微观层面以跨国公司为主，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形成对包括研发、制造、销售在内的企业间或部门间的开放性跨国生产服务协作。由于跨国公司具有“潜在的地理柔性”，通过全球战略布局将不同服务和生产环节分布在最有效率和成本最低的区位，灵活利用不同区位上成本、资源、物流和市场的差别获取利益。同时，在区域贸易一体化和投资便利化机制作用下，东亚地区内各类企业参与的最终产品跨境生产服务体系将得以更为有效地运行。

第三，东亚各经济体在宏观层面依托各自的要素禀赋，以自由贸易和跨境投资为纽带，开展开放性区域经济合作，强化“区域公共物品”的政策协调和治理机制。随着更多的经济体参与最终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提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将通过整合既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RTA/FTA）相关条款，统一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放宽贸易和投资限制，促进服务贸易领域发展等，构建跨境生产和服务的有利制度及政策环境，从而促进东亚服务生产网络日趋成熟和完善。

第四，东亚服务生产网络与区域内各类产业集群和企业的发展存在互动关系。经济全球化并没有降低生产和服务的地理集聚，区域的空间结构也没有走向完全的系统平衡。从服务生产网络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视角看，全球化力量促进了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全球扩展和区域服务生产网络的形成，而地方化力量则导致企业更加依赖于生产和服务网络，

并形成不同的产业集群,^①实现交易成本降低、生产效率提高和激励方法改进等多种集聚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具有扩大地方各类产业集群,加快东亚经济整体“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作用,还将推动东亚区域内外经济体间的互动,促使企业不断创造和保持价值,丰富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发展的内涵。

因此,全球价值链和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发展,已经成为区域内绝大多数经济体获得长期发展收益的载体,与其说是否参与其中,不如说如何参与适应其中。同时,不断深化的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发展,以及区域内外经济体间的贸易和投资扩展,要求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能够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和治理保障。成功的全球价值链升级之路,不仅需要扩大和开放本国与其他经济体在其中的协作,还需要向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和复杂性不断加强的服务出口转移和调整,并寻求更具开放性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合作。

参考文献:

1. 刘中伟:《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当代亚太》2014 年第 4 期。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3. 吴锋:《生产边界与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研究述评》,《上海经济研究》2009 年第 5 期。
4. 朱妮娜、叶春明:《全球及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研究文献综述》,《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6 期。
5. 姚战琪:《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战略及重点领域——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升级视角的研究》,《国际贸易》2014 年第 7 期。
6. 浦华林:《产品内国际分工与贸易对我国贸易平衡的影响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1 年第 4 期。
7. 刘德伟:《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论文,2010 年。
8. 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中国投资指南网。
9. 张珺:《全球产业转移下的服务生产网络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科技管理研究》2010 年第 11 期。
10. 原小能:《国际服务外包与服务企业价值链升级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2 年第 10 期。
11. 王中美:《全球价值链的新趋势、新平衡与关键命题》,《国际经贸探索》2012 年第 6 期。
12. 刘中伟、沈家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影响与中国的应对》,《太平洋学

^①刘春生:《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中国经贸》2011 年第 2 期。

报》2013年第1期。

13. 刘春生：《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中国经贸》2011年第2期。

14. Gary Gereffi, “The Organization of Buyer – Drive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How U. S. Retailers Shape Overseas Production Networks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in Gary Gereffi and Miguel Korzeniewicz, eds. ,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Westport: Praeger, 1994, P. 74.

15. United Nations Industr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Report 2002/2003, 2002, PP. 107~116.

16. T. Sturgeon and J. Lee, “Industry Co – 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a Shared Supply Base for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paper presented at Nelson and Winter Conference, Aalborg, 2001.

17. J. Henderson and P. Dicken, et al. ,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9, No. 3, March 2002, PP. 436~464.

18. Dieter Ernst and Paolo Guerrieri,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Changing Trade Patterns in East Asia: The Case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DRUID Working Papers 97 – 7, 1997.

19. Mitsuyo Ando and Fukinari Kimura,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NBER Working Papers No. 10167, 2003.

20. Ayako Obashi, “Stability and Resiliency of Produc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Recessio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nd GEP Conference in China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eld on November 10 – 11, 2009.

21. Jones, R. , &Kierzkowski, H. , “The Role of Services in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Jones, R. and Kierzkowski, H.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asil Blackwell Inc. 1990.

22. Markusen, J. R. , “Trade in Producers Services 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 PP. 85~95.

23. Francois, J. F. ,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 and th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 (23), PP. 109~124.

24. B. Lüthj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The Case in Electronics Contract Manufacturing”, East – 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 2004.

25. Gary Gereffi and Karina Fernandez – Stark, “The Offshore Services Value Cha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Crisis”,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262, 2010.

26. David Roland – Holst, Iwan Azis, and Li – Gang Liu, “Regionalism and Globalism: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Trade Relations in Wake of China’ s WTO Accession”, ADB Institute Research Paper Series, 2003, P. 16.

27. Francis Ng and Alexander Yeats, “Production Sharing in East Asia: Who Does What for Whom, and Wh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197, 1999.

责任编辑：李 蕊

(上接第 57 页)

参考文献：

1. 国家外汇管理局：《2014 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2014 年 9 月 29 日，<http://www2.chinaforex.com.cn/index.php/cms/item-view-id-36013.shtml>。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从流动性驱动的市场转向经济增长带动的市场（2014 年 4 月）》，贺韬、王慧荣、柯莉萍译，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 年版。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 年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 年版。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3 年年报：促进实现更安全和更稳定的全球经济》，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3 年版。
5. 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三联书店 2010 年版。
6. 樊纲、贺力平：《金融改革开放与中国国际收支再平衡》，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2 年版。
7. 焦武：《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3 年版。
8. 姜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及其应对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9. 孟秀惠：《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10. 翟晓英：《中国金融外部失衡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11. 吴念鲁：《中国外汇储备研究：考量与决策》，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 年版。
12. 胡乃武：《汇率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理论与国际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责任编辑：黄启云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 应对“竞争中立”规则

冯 雷 汤 婧

摘要：TPP 框架下的“竞争中立”规则给我国国有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带来了挑战。国有企业界定为区域贸易安排中的大国博弈提供了重要空间，我国国有企业是“竞争中立”规则的潜在目标，“竞争中立”规则将对我国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形成冲击。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治理的分类立法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加快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分类多元化改革，提升信息披露与决策透明度，在双边及诸边自贸协定中重新定义“竞争中立”的内涵，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创造更大的空间。

关键词：TPP “竞争中立” 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

作者简介：冯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汤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竞争中立”是美国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中极力推动的一项高端国际经贸规则，给我国国有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比照美英等国有关国有企业的法规及运营模式，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通过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方面推动国有企业的国内改革，另一方面有效应对“竞争中立”规则的国际挑战。

一、TPP 框架下“竞争中立”规则的挑战

美国利用其在 TPP 中的主导地位，力推所谓的“高质量、严标准”新议题，其中主要包括竞争、跨境服务、金融服务、合作和能力建设、电子商务、海关、环境、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 9 个方面。“竞争中立”构成了竞争议题的核心理念，TPP 法律文件中的竞争文本已经将建立和维持竞争法和有关当局、竞争法执法的程序公正、透明度、消费者保护、私人诉讼权利和技术合作、政府不得在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间构成歧视等一系列内容纳入其中，目的是促成竞争性的商业环境，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保证 TPP 成员国间的企业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可以说，专门为中小型企业减少壁垒、确保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TPP 是迄今第一个纳入此项议题的区域自由贸易协议。

美国在 TPP 谈判中提出的有关国有企业“竞争中立”规则，主要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提案中涉及到对国有企业“竞争中立”规则的一些细化内容，也由其提供标准化措辞的范本。其中，包括界定国有企业的严格标准，TPP 成员国均应通报各自国有企业的情况，并施以条件限制，确保国有企业不会无视或损害其在商品、服务或数码产品上所做出的 TPP 承诺等。从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来看，国有企业的界定始终是“竞争中立”规则中的首要问题。

二、美英等对国有企业的界定与分类运营模式

（一）美国国有企业的分类运营模式

第一，联邦公司的两种类型。美国的国有企业一般称为“联邦公司”。有关法律文件、政府报告以及各种学术探讨给出过多种定义，始终未能统一，是一个争论颇多的问题。美国全国公共管理学会的权威分类，把联邦公司分为政府企业和政府公司。政府企业包括法人和非法人两种形式的各种企业，非法人政府企业包括联邦邮政等。政府公司根据政府拥有的资本比重和董事会成员的构成，细分为全资政府公司、混合政府公司和私人公司；这里的私人公司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私人公司，差别在于这些私人公司是根据政府的特别法令设立的。

第二，联邦公司的专门立法。就这一类私人公司的特点来说，在美国虽然没有针对联邦公司进行统一调整的类似于公司法的专门立法，但是，每一个联邦公司都有其各自的特别立法加以规范，都是依据其相应的立法创立的。

第三，联邦公司的组织特征。一是联邦公司是由联邦政府全部或部分拥有和控制，或虽非联邦政府拥有、但是由联邦政府特许资助并受其控制或监督的组织。二是联邦公

司采取私人公司的组织形式，主要从事商业性活动，同时也履行政府的公共职能，是一种介于公私领域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三是联邦公司是一种自我维持、自我发展、独立经营的企业法人组织，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拥有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财产责任；同时，不必接受联邦行政机构的行政审计、预算管理和行政审查。

第四，联邦公司的运行架构。联邦公司采取普通商业公司的管理模式，除少数公司直接归政府部长的领导外，绝大多数实行董事会决策、总裁执行的管理体制。董事会的性质和作用、选任程序及其结构以及与政府的关系与一般商业公司不同。联邦公司的运营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只允许从事私人无法做、做不好或无利可图的行业，如邮政、公共交通、自来水、污水处理及环保、博物馆、公园森林、航空管制等；二是只向同级的议会负责，建立与撤销、经营范围及领域、价格制定、拨款贷款、高管任免和薪酬等都必须得到同级议会的批准；三是享受政府经议会批准的固定贷款，但不得上市融资。

（二）经合组织（OECD）的国有企业

第一，国有企业的界定较为宽泛。按照 2004 年 11 月颁布的《OECD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中认定，对于国家行使重要控制的企业，无论是全资，还是占多数股权或少数股权，都被称为“国有企业”。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战略利益为公共交通、邮政、电信、电力和供水等一些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提供了国有化动机，这些部门或公共物品呈现自然垄断的特征，为这些部门的国家所有权提供了支持。

第二，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状况是 OECD 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OECD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确立了国家即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所有者权利的行使应在政府行政监管部门内得到明确的界定，行使协调或所有权职能的机构（类似我国的国资委）向议会负责，决定董事会的提名和任命程序，并参与提名和任命事务。与美国国有企业不能上市融资的特点不同，在 OECD 的治理框架下，其国有企业可以上市融资。

（三）英国与欧元区国家的国有企业

英国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煤炭、铁路和邮电行业，分别隶属于政府的各个部门，如英国煤炭公司隶属于能源部，英国铁路公司隶属于运输部。

欧元区国家的国有企业所具有的特殊法律地位在私有化的浪潮下有了明显的改变，国家放宽了对其经营行为的约束，以响应国家减少干预和市场自由化的趋势要求。国有企业不参与市场竞争，通常不受破产法的约束，致使债权人很难强迫执行他们的合同、获得应有的补偿。

（四）西方国有企业的影响力有限

总体来看，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对经济的影响力有限。美国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影响十分有限，其生产总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5% 左右，远不如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就 OECD 整体而言，国有企业的经营规模大约占到 GDP 的 20% 和就业机会的 10%。英国保守党政府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执政以来，对国有企业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先后出售了 50 多家国有企业，其结果使得国有企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不过只有 4%。

三、TPP 对国有企业的界定

（一）围绕国有企业的大国博弈

国有企业由于在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其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直接关系到贸易伙伴之间在贸易利益分配中的格局，关系公平贸易的实现。因此，对国有企业的界定就成为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出于不同利益的考虑，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拥有较强话语权的国家会按照自身的利益来界定所谓的国有企业，以利于本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地位。当然，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的界定被滥用的风险，导致偏向于本国和本国所属利益集团的方向。

当美国借 TPP 在经贸层面上实施其重返亚洲的战略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界定以及在各自经济体中的运行实践发生了碰撞。美国之所以在 TPP 框架下如此重视针对国有企业推行“竞争中立”规则，根本原因就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的潜力。在实践中，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模式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所显现出对经济危机的抵抗能力以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能力，被广为接受并被新兴经济体纷纷效仿。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希望通过所谓的“竞争中立”概念确立新的国际经贸规则，避免我国等新兴经济体利用政府手段扶持国有企业，限制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竞争中立”规则通过“边境内措施”来规范贸易对象国的国有企业在本国境内的行为。譬如，TPP 中有关国有企业的最新条款，要求取消针对国有企业的特惠措施，如补贴、融资优惠、政府采购的偏好，甚至涉及国有企业的投资及贸易地位等，这种高门槛、严标准的全球竞争规则对我国国有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主体地位和经营行为提出了新的挑战，甚至可能使国有企业在传统市场中的经营活动受阻，同时加大开拓新兴市场的难度。

我国国有企业正处于新型开放政策下推进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国际市场的有

利时机，“竞争中立”规则的国际化使得我国在海外市场的中坚力量受到遏制，国有企业通过长期努力积累起来的贸易与投资优势将被削弱，我国经贸的发展空间将面临被严重挤压的风险。

（二）美国的“深受政府影响”主张的潜在目标

在 TPP 框架中，美国提出了“深受政府影响”这一界定国有企业的概念，并开始认定拥有“20%及以上的股权”就可视为所谓“深受影响”的界限。在 2014 年 2 月 23 日举行的新一轮部长级会议上，美国这一立场有所松动。TPP 谈判成员就采用以“政府拥有 50%以上的表决权”或“政府拥有指名半数以上股东的权利”作为条件展开了讨论。

国有企业的认定标准决定了“竞争中立”规则的适用范围，同时也就限定了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的空间。对于国有企业，各国有不同的认定标准。有些国家（例如澳洲）采取广义说，即不论哪级政府成立的企业，只要其透过销售服务或商品获利，或与民营企业具有竞争关系，则无论其组织形态，都属于国有企业的范畴。有些国家采取狭义说，仅认定以商业组织形态（如公司）设立的企业，才属于国有企业，甚至排除政府持股低于 50%的企业。

早在 2011 年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在 TPP 谈判问题上表示，我们的提案旨在确保在任何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竞争的领域内，都由相应的规则来保证贸易协定的目标和利益不会受到竞争所在国政府补贴的损害；并提议要求国有企业在采购与出售商品和服务时以商业方式进行，在重要的国家项目上不能歧视他国企业，限制政府补贴和信贷支持。尽管当时贸易谈判的直接目标是越南，其国有造船企业严重亏损，并以国有资金弥补其亏损，然而，越南造船业的发展对美国的影响甚小，真正的目标在于其实现重返亚洲战略时面对着我国的国有企业。据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 2011 年 10 月发布的一份关于我国国有企业的报告称，我国国有企业及其控制的企业规模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0%，或可能达到 50%，国家所有权作用突出，且中国国资委已明确了一些关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将继续部分或大部分地受到政府控制。这份报告对于美国通过 TPP 谈判来确立未来贸易协定的指向目标具有重要的影响。

“国有企业”的概念在美国的手中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具有依照其意图不断调整的空间，以达到控制区域经贸安排的目的。这与我国（或一国）对国有企业的概念如何界定的出发点截然不同且又息息相关。

（三）我国对国有企业的界定

我国法律规范对“国有公司、企业”的界定，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

的解释主要适用于刑事司法领域，分别在最高人民法院文件（法释〔2001〕17号、法释〔2005〕10号）中规定，认为国有控股、参股企业非国有企业，企业资产不是纯粹的国有资产，只有国有全资的公司、企业才属于国有公司、企业。广义解释广泛适用于国有资本（资产）监管领域。伴随当前企业股权多元化发展的大背景，国有企业的外延也随之扩展调整。国资委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中（国资发产权〔2007〕108、109号、国资厅产权〔2008〕80号）明确了对“国有”企业界定为国有全资和控股企业的基本态度，即把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企业也纳入国有企业的范畴，但对于相对控股企业是否也归属其中，尚缺乏明确的态度和成熟的标准。

四、“竞争中立”规则引发对我国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冲击

（一）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给出了国企改革的方向——“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要“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并“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这标志着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起步。新一轮国资改革涉及面广，需要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同时推进：在宏观层面，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重新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方向，破除行政垄断，在多个领域向民间资本、国际资本开放，建设公平的市场环境，提升经济活力；在微观层面，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优化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改善治理机制，提升国有企业效率。至少应明确两大问题：一是如何确定国资分类管理的标准，这是推进国资改革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如公益性国企、自然垄断性国企和竞争性国企，应该进行分类管理和指导，实施不同的改革策略。二是如何引进民间资本，在多大比例上分配股权，推进混合所有制建设。

（二）“竞争中立”规则对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冲击——国有企业的合理界定

“竞争中立”规则对国有企业的界定标准会显著影响国有企业未来产权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如果恶意扩大“竞争中立”规则对国有企业的适用范围，很可能导致国有企业产权结构调整走向过于分散的极端路径。客观而言，“竞争中立”规则的规范目标应是政府投资并能产生控制力的企业。这种控制力的衡量标准应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入手，不能采用一刀切的片面方法。质量标准即政府在企业管理和投资中能够实施决定性影响；数量标准即股份的比例，或能够决定企业董事会的成员数量。按此，政府参股的企业，在无法对企业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为国有企业。

美国主张的国有企业界定范围有两方面的不合理性：一是控股达到 20%即可适用“竞争中立”的国有企业条款。20%的投资比例难以说明国有企业对其参股公司具有实质控制权，与传递不当竞争利益更无必然联系。二是美国力推的“竞争中立”规则也只针对国家层面的国有企业。在国际惯例中，国有企业仅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美国主张的投机之处在于美国国有企业大多属于州立的范畴，以国家层面的国有企业为规范对象的“竞争中立”规则使美国各州及其他联邦制国家在州这一层面上设置的国有企业免受冲击。与欧美等联邦制国家不同，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国有企业主要设置在国家层面上，虽然也有地方层面的国有企业，但越是重要的行业或领域，国家层面的国有企业越是集中。因此，对这一规则的感受及可能受到的冲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完全不同。这也是 TPP 各成员对国有企业条款争议较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实践中，国有企业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并不存在中央与地方的本质区别，两个层级的政府都能够为国有企业创造出不正当的竞争利益。

（三）“竞争中立”规则约束国有企业行为的途径

在 TPP 和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纳入上述有关国有企业议题的提案，主要源于美国的倡议，其他谈判方给予的支持有限。从目前的形势看来，美国利益相关方正密切参与文本的起草和修改，由于相关文本内容仍未公开，有些分析主要是建立在对美国认定的公平竞争机制基础上的推测，相关内容可以追溯到美国商会和服务业联盟的联合报告及 2012 年 2 月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

第一，通过“边境内措施”来规范政府对国有企业行为的影响。在美国的极力推动下，OECD 已构建出所谓的“竞争中立框架”，旨在“限制各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保证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公平竞争”。该框架提出了一整套涉及债务、税收、定价权等方面中立的政策建议。TPP 针对国有企业的最新条款基本采纳了这些政策建议，包括要求取消补贴、取消国有企业特惠融资措施、撤销政府采购的优惠偏好、国有企业的投资及贸易地位等，有意通过“边境内措施”来规范政府和企业行为。

第二，通过严格的报告和强制执行制度，保证信息的全面及时披露。美国在处理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的执行问题上，很可能会借鉴“圣地亚哥原则”的经验。该原则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制定，用于约束主权财富基金（SWF）的行为，要求 SWF 必须具有更高责任感与透明度。按此要求，“竞争中立”规则的执行制度至少会要求各方提交完备的年度披露清单，包括政府拥有所有权或控制利益的所有国企及其业务市场与市场

份额，获得所有形式的政府支持包括担保、国有银行贷款利率和条件、土地特许使用或类似情况；国有供应商的供应合同；主要采购供应合同的参与条件；与关联方的重要交易；以及重大风险因素。

第三，通过审查、质询以及制裁制度，强化“竞争中立”规则的执行力。在信息披露义务的基础上，美国倡导“竞争中立”规则的各方专家提出建议，应依照 WTO 信息披露方式，建立常设工作组专门负责审查质询，如成员国不遵循，应要求其加快信息公示；告知后再违反，给予评估强制执行——根据该国国企预期的补贴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代理费率调整国企出口关税，以搁置关税减让。

五、应对“竞争中立”规则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

针对美国 TPP “竞争中立”规则以及 OECD 国家在国有企业界定方面的实践，探索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应对竞争中立规则的新思路，进一步推进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一）加快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调整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深度探索市场化经营的有效途径。混合所有制的实质，不能简单理解为国企产权的多元化，而是在此基础上实现国企股权结构的优化、调整或整合。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带来体制性突破，避免流于形式。

第一，以吸收民间资本的扩张方式，推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吸收民间资本，推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适当控制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份额，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市场份额。民间资本的进入，一方面可以降低国有资本的控股比例，完成国有企业向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过渡；另一方面也会提升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国有资本的活力。

第二，突出国有相对控股理念，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企业整体上市，推进国企股权结构多元、优化调整，让集体资本、民营资本等中小股东分享国有企业发展的红利。从中央与地方层级来看，混合所有制在央企层面很难有大的突破，更多突破应体现在地方国企层面上。目前，118 家中央企业中已经有 43 家实现了主营业务整体上市，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断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日趋完善。比较而言，地方国企股权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地方政府“一股独有”和“一股独大”的行政惯性较大，这应该是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的重要领域。

第三，创造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的转换空间。在全方位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前提下，针对以国家层面上的国有企业为规范对象的“竞争中立”规则，我国国有企业应该

有针对性地、适当地分解央企的区域性业务，通过定向吸收地方民间资本，推动央企向地方国企的转变。为保证对国家战略性产业的有效控制，可以考虑建立由政府主导的、非企业化的区域业务协调机制，以避免央企向地方国企转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控或央企与地方国企相互并购、交叉持股的现象。

（二）分类推进国有企业产业结构多元化调整

分类改革是探索国有企业如何走向市场的有效路径。按照 OECD “竞争中立框架”的分类标准，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性和非商业性两大类型。商业性国有企业，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对国民经济运行安全影响较小、非自然垄断性的行业，如房地产业、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其中的国有企业应尽量减少持股比例，但也不必完全退出，在竞争性行业中保留部分国有资本能够为政府调控市场提供有效的依托，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非商业性国有企业，一般包括提供公共产品或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在这些领域应尽量避免深度的市场化倾向，国家应保证对这些领域或行业的控制权。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建立在分类改革之上进行，战略意义高或国际敏感度低的行业，可以适当放缓步伐，反之，宜于迅速推进产权结构调整，向多元的混合所有制结构演变。

（三）提升信息披露和决策透明度，增强国企信息公开自律意识

决策过程不透明，人事、投资和财务信息披露不充分一直是我国国有企业遭受欧美等国家质疑的主要原因之一。信息披露和决策透明方面的要求，将对我国国有企业在国家重大工程、政府采购、税收优惠、国有银行低利率贷款及国有企业管理等方面提出新的挑战。应该说，这些问题正是我国新一轮改革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需要，问题是如何有序地安排这些问题的解决、争取主动。一是可以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捆绑解决国有企业享受优惠贷款的问题；二是必须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过程中捆绑解决政府采购偏好问题；三是应该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解决补贴及其在投资与贸易活动中的优势地位以及报告、信息披露、审查制度等问题。就政府而言，既要包括对包括国企、民企在内的税收、贷款、技术创新、政府采购等支持政策进行政府信息公开，又要对国企规定严格的强制信息披露义务。通过制定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指引和实施细则，建立国有企业信息平台，充分披露（非保密部分）国企财务、经营成本、利润等重要信息。就国企而言，要强化自愿公开信息的意识，最终形成自律诚信与政府监管相衔接的信息披露机制。

（四）有效利用双边及诸边自由贸易协定，增加对我国有利的“竞争中立”条款

当前，美国与 TPP 其他成员国，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秘鲁、智利和越南，针对国有企业议题存在较大分歧。这些国家都有着国有企业主导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如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智利国家铜矿公司、秘鲁矿业公司等国有企业在其经济运行中仍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面对“竞争中立”规则对国有企业的约束，这些国家一方面担心政府丧失对国有企业控制权，另一方面更担心可能影响本国国有企业和整体经济的平稳发展。对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大部分 TPP 成员国与美国在“竞争中立”规则条款上的分歧，针对那些拥有国有企业主导经济发展背景的 TPP 成员国，积极推进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完善已有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增设并重新定义“竞争中立”条款，如以“以增加信息披露和透明度”为核心，争取与这些国家就国有企业规则达成共识，在国有企业的界定标准、受约束的国有企业商业行为等问题上缩小认定范围，同时针对废除国有企业优惠待遇的规定，积极争取适度的过渡期，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争取更大的空间与时间。

参考文献：

1. 金碚：《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学习与探索》1999 年第 3 期。
2. 金碚：《再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中国工业经济》1999 年第 3 期。
3. 金碚：《三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中国工业经济》1999 年第 7 期。
4. 程恩富、何干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海派经济学》2008 卷第 24 辑。
5. 刘鹏：《我国国有企业的类型和功能定位》，《武汉学刊》2012 年第 1 期。
6. 干潇露：《竞争推进与竞争中立：政府反竞争行为规制研究》，《浙江树人大学学报》第 12 卷第 2 期，2012 年 3 月。
7. 王婷：《竞争中立：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新焦点》，《国际经济合作》2012 年第 9 期。
8. 唐宜红、姚曦：《竞争中立：国际市场新规则》，《国际贸易》2013 年第 3 期。
9. 黄志瑾：《国际造法过程中的竞争中立规则——兼论中国的对策》，《国际商务研究》2013 年第 5 期。
10. 张卓元：《深化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中国科技产业》2013 年 12 期。
11. 薛颖：《国企反垄断：不妨试试“竞争中立”》，《经济观察报》2013 年 5 月 20 日。
12. 郭飞：《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国有企业改革》，《光明日报》2014 年 4 月 12 日。
13. 常修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人民日报》2014 年 4 月 30 日。

-
14. “Competitive neutrality occurs where no entity operating in an economic market is subject to undu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r disadvantages.” See OECD (2012), *Competitive Neutrality: Maintaining a Level Playing Field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Business*, p. 15.
15. “Government owned or government controlled economic entities that generate the bulk of their revenues from selling goods and services” . See World Bank (1995), *Bureaucrats in Business: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
16. Antonio Capobianco and Hans Christiansen. *Competitive Neutrality and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Challenges and Policy Options*. OECD Corporate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No. 1, 2011.
17. Australian Government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About Competitive Neutrality* [EB/OL] . 2012. <http://www.pc.gov.au/agenco/competitive-neutrality>.
18. Capobianco, A. and H. Christiansen (2011), “Competitive Neutrality and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Challenges and Policy Options”, OECD Corporate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s, No. 1, OECD Publishing.
19. Commission Directive 80/723/EEC of 25 June 1980 on the transparency of financial relations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public undertakings (OJL 195, 29.7.1980, p. 35) .
20. OECD (2012), *Competitive Neutrality: Maintaining a Level Playing Field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Business*, p. 15.
21. Rennie M. A. and F. Lindsay (2011), “Competitive Neutrality and State – owned Enterprise in Australia: Review of Practices and their Relevance for Other Countries”, OECD Corporate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s, No. 4, OECD Publishing.
22. US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Principles for Prospe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EB/OL] . 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7/169012.htm>. (2012 – 12 – 25) .
23. Kenneth J. Vandevelde.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History, Policy,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 Matthew Rennie & Fiona Lindsay. *Competitive Neutrality and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in Australia: Review of practices and their relevance for other countries*. OECD Corporate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s, No. 4, 2011.
25. *Competitive Neutrality: A Compendium of OECD Recommendations, Guideline and Best Practices* (2012), <http://www.oecd.org/daf/ca/achievingcompetitiveneutrality.htm>.

责任编辑：刘英奎

人民币国际化回顾与新常态 初期展望

王冠群

摘要：近年，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断上升，尤其是 2014 年已实现多项突破，但人民币国际化总体水平尚处初期阶段。在新常态初期，相关工作艰巨繁重。展望 2015 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决定了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针对“三期叠加”实际、大力推动创新驱动、配合与借助我国“一带一路”国际战略，继续夯实和发展综合国力，主动捕捉美国经济复苏、国际资本流动、能矿价格大幅波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带来的机遇，因势利导，重点深化人民币国际化基础性工作，增加和创造人民币国际需求，防范化解国内外经济金融风险，稳妥积极巩固和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新常态 展望

作者简介：王冠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金融学博士后。

近年，尤其是 2014 年，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了大量新的突破。同时，与现有主要国际货币相比较，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尚属起步阶段，人民币国际职能和跨境使用程度仍有巨大不足，特别是国际储备职能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差距明显。持续提高、深化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和程度，仍需深入夯实我国综合国力，防范与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充分利用国

内外市场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我国政府和货币当局统筹作用，加强国际合作，积极稳妥地重点突破相关基础性瓶颈。在不断释放人民币国际化已有潜能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和创造人民币国际需求，建立和完善满足发展人民币国际需求的系统性机制。

一、人民币国际化重要领域回顾

截至 2014 年末，人民币国际化主要进展包括以下内容。

（一）人民币与多种外币实现直接交易

2014 年内，人民币与韩元、新加坡元、欧元、英镑和新西兰元实现了直接交易。加上此前已经实现与人民币直接交易的外币，即马来西亚林吉特、俄罗斯卢布、加元、澳元、日元，在全球范围内人民币已与除美元以外的 10 种外国货币实现了直接交易。在已经实现直接交易的外币中，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为中心国际货币或重要国际货币，人民币与这些国际货币实现直接交易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突破。

表 1 已与人民币实现直接交易的外币币种

货币名称	实现与人民币直接交易日期
林吉特	2010 年 8 月 19 日
卢布	2010 年 11 月 22 日
日元	2012 年 6 月 1 日
澳大利亚元	2013 年 4 月 10 日
新西兰元	2014 年 3 月 19 日
英镑	2014 年 6 月 19 日
欧元	2014 年 9 月 30 日
新加坡元	2014 年 10 月 28 日
韩元	2014 年 12 月 1 日

数据来源：人民网，截至 2014 年末。

（二）境外人民币清算中心、全球人民币清算中心和离岸市场不断建立与完善

截至 2014 年末，我国已建立了多个境外人民币清算中心，主要包括：东京人民币清算中心、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中心、伦敦人民币清算中心、新加坡人民币清算中心、多伦多人民币清算中心、悉尼人民币清算中心、首尔人民币清算中心、吉隆坡人民币清算中心和曼谷人民币清算中心等。同时，我国央行对应上述人民币清算中心还授权多家以中资为主的商业银行和个别外资银行成为境外人民币清算行，支撑境外人民币清算业务。此外，我国计划于 2015 年内建成上海人民币清算中心，力争基本确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

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目前看相关工作基本顺利，预计届时可以达成相关目标。最后，人民币离岸市场作用不断加强。除中国香港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在新加坡、英国、美国、中国台湾、法国、澳洲和德国均有不同程度发展。总体认为，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国际清算体系和离岸市场体系正在不断拓展、深化和完善，已初步具备基本功能。

表 2 人民币海外清算中心

人民币海外清算中心	合作备忘录签署时间
东京人民币清算中心	2012 年 5 月
新加坡人民币清算中心	2013 年 2 月
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中心	2014 年 3 月
伦敦人民币清算中心	2014 年 3 月
巴黎人民币清算中心	2014 年 6 月
卢森堡人民币清算中心	2014 年 6 月
首尔人民币清算中心	2014 年 7 月
多伦多人民币清算中心	2014 年 11 月
悉尼人民币清算中心	2014 年 11 月
吉隆坡人民币清算中心	2014 年 11 月
曼谷人民币清算中心	2014 年 12 月

数据来源：新华网、人民网等，截至 2014 年末。

（三）人民币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水平不断上升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有效支撑。从利率市场化角度看，2013 年我国央行宣布自 2013 年 7 月 20 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2013 年 10 月，我国贷款基础利率（简称 LPR）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开始运行，央行不再指导贷款基础利率。2013 年 12 月，央行宣布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法人（存款类金融机构），可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款凭证（同业存单）。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以市场化方式定价，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存单均参考同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定价。上述说明，我国已在加速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绝大部分资金价格已实现市场化形成机制，拆借、债券、商业票据及贷款利率均已放开，仅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实施管制。同时，截至目前，上海已经放开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业已推出。种种迹象表明，在最近一两年内，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将会出现新突破，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机制将会基本实现。

从汇率市场化角度看，2014 年 3 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 2014 年 3 月 17 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将由 1%扩大至 2%，即每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可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公布的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上下 2%的幅度内浮动。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提供当日美元最高现汇卖出价与最低现汇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当日汇率中间价的幅度由 2%扩大至 3%，其他规定仍遵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汇价和外汇指定银行挂牌汇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0〕 325 号）执行。2014 年 7 月 6 日，央行公布《关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汇价和银行挂牌汇价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通知》）。据此通知，银行可基于市场需求、定价能力对客户自主挂牌人民币对各种货币汇价，现汇、现钞挂牌买卖价不做限制，其



图 1 人民币利率水平变动（2006 年－2014 年）

数据来源：Wind，短期贷款利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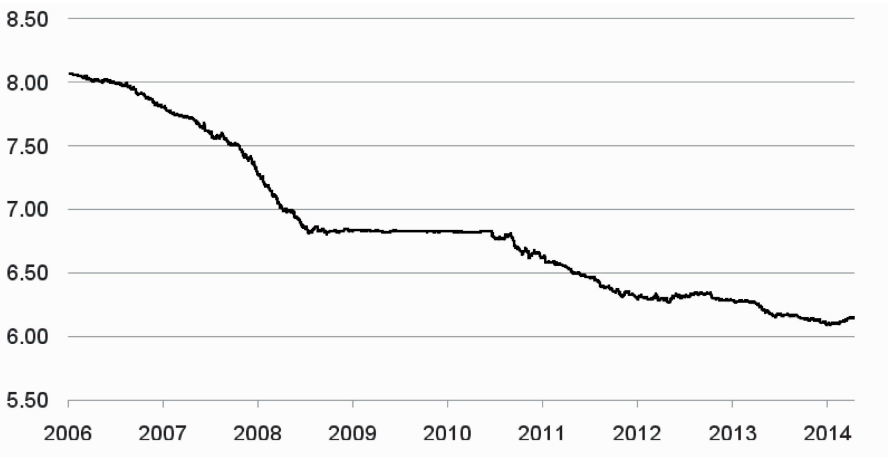


图 2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2009 年－2014 年）

数据来源：Wind，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

价格可由市场供求自主决定。上述说明，我国汇率市场化正在逐步深化。但同时，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仍有改革空间。目前，我国汇率市场化范围仅限于居民换汇，适用范围较窄，今后应扩大汇率市场化适用范围，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水平。

（四）人民币自由兑换领域有较大改革空间

截至 2014 年，在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基础上，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已有实质进展。国家外汇管理局报告表明，1996 年 12 月我国宣布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而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资本项目分为七大类 40 项，我国资本项目有 5 项实现完全可兑换、8 项实现基本可兑换、17 项实现部分可兑换、10 项仍完全不可兑换，总体上 85%以上资本项目处于部分可兑换状态。同时，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仍有不足。资本和货币市场交易工具、衍生产品和其他交易工具各 2 项尚处于严格管制状态。人民币自由兑换仍有较大改革空间，某种程度制约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重视的是，在 2015 年内及短期后，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需要妥善处理与经济金融风险防范的关系。

表 3 已实现自由兑换项

项 目					状 态
1	资本和货币 市场工具	资本市场 证券	股份或其他参 与性证券	非居民当地购买	部分可兑换
2				非居民当地出售或发行	部分可兑换
3				居民境外购买	部分可兑换
4				居民境外出售或发行	部分可兑换
5			债券或其他 证券	非居民当地购买	部分可兑换
6				非居民当地出售或发行	部分可兑换
7				居民境外购买	部分可兑换
8				居民境外出售或发行	部分可兑换
9		货币市场工具		非居民当地购买	部分可兑换
10				非居民当地出售或发行	部分可兑换
11				居民境外购买	部分可兑换
12				居民境外出售或发行	部分可兑换
13		集合投资证券		非居民当地购买	部分可兑换
14				非居民当地出售或发行	部分可兑换
15				居民境外购买	部分可兑换
16				居民境外出售或发行	部分可兑换
17	衍生品和其他工具			非居民当地购买	不可兑换
18				非居民当地出售或发行	不可兑换
19				居民境外购买	部分可兑换
20				居民境外出售或发行	部分可兑换
21	信贷业务	商业信贷		由居民向非居民	部分可兑换
22				由非居民向居民	部分可兑换

续表 3

项 目			状 态	
23	信贷业务	金融信贷	由居民向非居民	可兑换
24			由非居民向居民	部分可兑换
25		抵押，担保，金融 备份机制	由居民向非居民	部分可兑换
26			由非居民向居民	部分可兑换
27	直接投资	对外		部分可兑换
28		对内		部分可兑换
29	直接投资清偿			可兑换
30	房地产交易		居民境外购买	部分可兑换
31			非居民当地购买	部分可兑换
32			非居民当地出售	部分可兑换
33	个人资本 交易	贷款	由居民向非居民	不可兑换
34			由非居民向居民	不可兑换
35		赠送，捐赠，遗产 继承	由居民向非居民	部分可兑换
36			由非居民向居民	可兑换
37		移民境外债务清偿		可兑换
38		资产转让	移民向境外转移	部分可兑换
39			移民向境内转移	可兑换
40		赌博和奖励所得转让		

（五）人民币与外币互换不断发展

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 and 经济体数量不断增加，货币互换规模不断加大。自 2009 年，我国央行先后与 27 个国家、地区和货币组织签订了本币互换协议，包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新加坡、冰岛、新西兰、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哈萨克斯坦、泰国、巴基斯坦、阿联酋、土耳其、澳大利亚、乌克兰、巴西、英国、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欧洲中央银行、瑞士、俄罗斯、卡塔尔和加拿大，并且部分协议已经续签。广泛的货币互换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积极因素，为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发挥了先导作用。

（六）实现沪港通显著提高了国内外资本市场联通程度和人民币双向流动机制，提高了人民币国际投资职能

沪港通是指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在该机制中，我国大陆和香港两地投资者可以委托上交所会员或联交所参与者，通过上交所或联交所在对方所在地设立的证券交易服务公司，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在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沪港通机制由沪股通和港股通两部分组成。2014 年 11 月 10 日，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联合宣布自 2014 年 11 月 17 日，沪港通涵盖的股票交易可以按照相关约定开始交易。沪股通总额度为 3000

表 4 已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国家和地区

国家和地区	首次签署时间	国家和地区	首次签署时间
韩国	2008 年 12 月 12 日	阿联酋	2012 年 1 月 17 日
香港	2009 年 1 月 20 日	土耳其	2012 年 2 月 21 日
马来西亚	2009 年 2 月 8 日	澳大利亚	2012 年 3 月 22 日
白俄罗斯	2009 年 3 月 11 日	乌克兰	2012 年 6 月 26 日
印度尼西亚	2009 年 3 月 23 日	巴西	2013 年 3 月 26 日
阿根廷	2009 年 3 月 29 日	英国	2013 年 6 月 22 日
冰岛	2010 年 6 月 9 日	阿尔巴尼亚	2013 年 9 月 13 日
新加坡	2010 年 7 月 24 日	欧洲中央银行	2013 年 10 月 9 日
新西兰	2011 年 4 月 19 日	瑞士	2014 年 7 月 21 日
乌兹别克斯坦	2011 年 4 月 19 日	斯里兰卡	2014 年 9 月 16 日
蒙古	2011 年 5 月 6 日	俄罗斯	2014 年 10 月 13 日
哈萨克斯坦	2011 年 6 月 13 日	卡塔尔	2014 年 11 月 8 日
泰国	2011 年 12 月 22 日	加拿大	2014 年 11 月 8 日
巴基斯坦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亿元人民币，每日额度为 130 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总额度为 2500 亿元人民币，每日额度为 105 亿元人民币。沪港双方可根据试点进展调整投资额度。从货币国际化角度看，香港是全球重要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证券市场是国际资本市场重镇，其地位与作用极为特殊，历史上香港曾是我国与外部进行金融衔接的主要桥梁，乃至是唯一桥梁。实现沪港通提高了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增加了人民币资本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度，提高了人民币双向流动机制建设水平，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上海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作用。总体上，实现沪港通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对人民币国际化发挥了阶段性重大作用。

（七）人民币履行国际职能水平上升

截至 2014 年，人民币职能国际化进程基本顺利。人民币的国际定价、结算、投资和储备功能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在国际结算职能方面，根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统计，截至 2014 年 10 月，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约为 1.54%，同比增长了 98%，但远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

在国际投资职能方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2015 年 1 月发布数据，截至 2014 年年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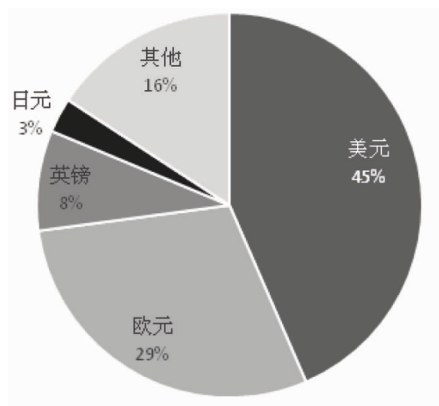


图3 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其他货币在全球
国际支付总额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SWIFT RMB Monthly Tracker Nov. 2014。

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 1866 亿元，同比增长 117.99%，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 8620 亿元，同比增长了 92.37%。

人民币国际间接投融资不断发展，主要表现在境外人民币存款、境外人民币债券和股票总额等不断上升。在国际储备职能方面，截至 2014 年，根据公开资料和不完整统计，全球 40 多个国家央行不同程度持有人民币，准备积极效仿的国家数量仍在不断增多。同时，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表示，一些发达国家已在不公开地将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资产范围。虽然缺乏精确统计，但利用人民币承担国际储备职能的国家和经济体数量加快上升，由发展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扩散，由亚洲向其它洲扩散的趋势已基本明朗。但总体上，人民币国际储备职能薄弱仍是基本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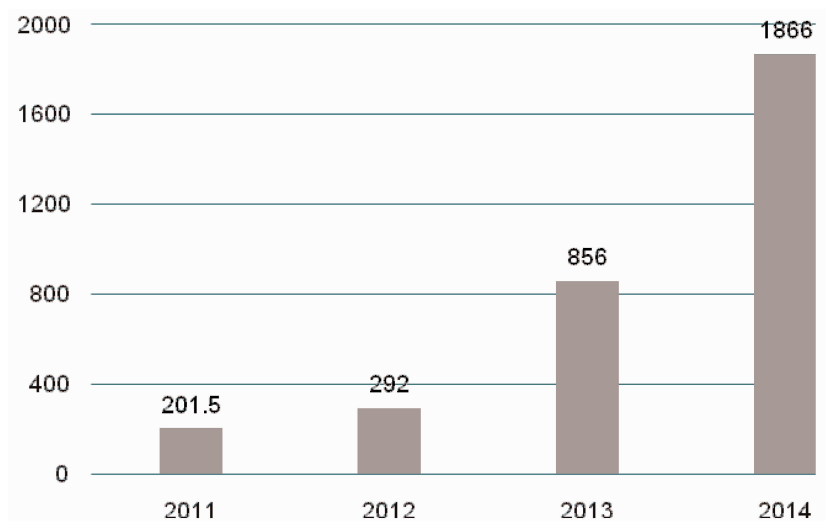


图4 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年度总额（2011年—2014年）（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各年金融数据统计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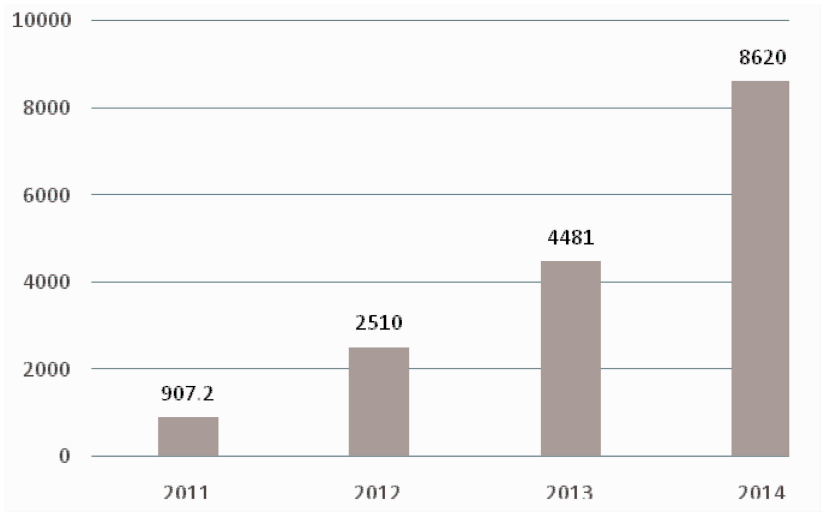


图 5 外商人民币对我国投资年度总额 (2011 年—2014 年) (单位: 亿元)
数据来源: 人民银行各年金融数据统计报告。

综合上述, 人民币国际化已有较大进步, 但部分关键领域仍有较大发展潜力, 需稳妥积极地加快改革。

二、2015 年人民币国际化展望

未来, 稳妥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需保持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目标稳定、国际合作和国内政策措施相机抉择的综合平衡。从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看, 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如下。

(一) “新常态” 经济特征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总体看,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发展乃至综合国力提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集中反映。因此, 人民币国际化与我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变化整体合拍。我国进入“新常态”的正确论断表明, 在未来中期阶段, “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 将是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特征, 加之我国生态资源环境承载已达上限, 基本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重在提升质量, 同时兼顾与之相适应的发展速度。立足大局的“高质量、中高速” 发展, 有助促进我国国力发展在实现目标和战略目标之间的综合平衡, 更有助于为我国改善民生留有余力和回旋空间。在“新常态” 前期, 人民币国际化动力将主要源于人民币国际化基础性突破带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潜能释放, 而在新常态后期, 人民币国际化动力则更多体现为我国核心竞争力的大幅提升。由此判断, 人民币国际化也会有与之对应的进程与节奏。总体看, 人民币国际化应是拾级而上、步步扎实、缓急并存的过程, 其节奏将

主要取决于我国经济转型的实际效果、综合国力升级的节奏以及国际机遇和相关风险因素。

具体看，人民币国际化与下列因素紧密相关，相关因素呈对应特征。一是货币政策不会过紧过松，货币供给增速将更大程度与高质量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货币政策中，“定向与定量政策”将是主流内容。在现有财富格局下，货币政策过紧会直接威胁民生和就业底线，同时也对经济中高速增长产生威胁。货币政策过松，则会滋生资产泡沫，全面创新驱动倒逼机制将会回归规模和速度至上的老路。二是通货膨胀水平有可能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下水平。新常态条件下，民生保障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高通胀极易破坏民生。同时，创新任务繁重，不合理通胀会重创实体经济，破坏创新驱动所需正常的经济环境。三是利率应基本呈现中等或较低水平。存款利率上升和贷款利率下降，商业银行存贷差减少应是基本趋势。金融服务是支持创新驱动、巩固发展实体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利率过高将会破坏发展创新驱动的金融环境，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四是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对内贬值和对外升值局面均可能有所减缓，更多呈现双向波动特征。基本判断是，人民币升值预期不会成为人民币输出的主要动力，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呈下降趋势。五是国内资本市场趋于活跃，但不应形成严重的、系统性的资产泡沫。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应主要针对各领域创新亮点。六是产业发展将更多体现为核心竞争力上升，而不是相对简单的规模扩张。缺乏创新的规模扩张将加大产业转型成本和风险。七是产业核心竞争力上升将会改善我国进出口结构。高质量的货物和服务将逐步成为我国国际贸易主要内容。进口与出口升级将是我国国际贸易主要发展方向。八是自主创新能力上升将提高我国对外投资的安全性、主动性和收益性。我国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海外投资，自主创新是我国海外投资顺利的基本保障。

总体看，上述因素均对人民币国际化在币值稳定、资本市场、产业和国际贸易全球竞争力等方面发挥重要影响。妥善处理好相关问题对提高人民币国际职能具有夯实基础和拓展空间的双重战略性作用。

（二）“一带一路”战略是人民币国际化重大机遇

在原有重点国际合作工作基础上，“一带一路”战略已明确成为我国新时期国际合作重大举措，将对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同时辐射更多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战略喻示的我国国际合作新方向，将在基础设施、区域、产业、金融等领域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区域、路径和侧重产生极大影响。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深化和发

展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在全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机遇之一，也是在全球范围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探索和支撑。

（三）“三期叠加”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使得在 2015 年乃至今后中期阶段，我国发展约束条件增多，在此条件下，化解我国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难度上升。在金融领域，我国金融体系安全、地方债务压力和部分领域资产泡沫等直接形成威胁我国金融系统性和区域性安全的重要因素，直接威胁我国金融国际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和国际贸易竞争力，从而阻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历史表明，破坏货币国际化进程的最大威胁源于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往往源于金融危机并由金融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货币国际化进程中需要时刻警惕的重大问题，而政治稳定则是货币国际化更为致命的关键因素。

（四）世界经济格局演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总体估计，美国经济金融调整基本完成，经济复苏基本稳固。日本经济仍在积极复苏中，欧元区经济逐步复苏，俄罗斯受能矿价格和经济结构因素影响较大，其他金砖国家经济很难极为出色，但印度经济潜能不容忽视。从金融角度看，全球资本将加快流向美国，美元汇率坚挺、美元利率会基本持平或逐步上升，美国资本市场会较为繁荣，美国科技和高端制造业将会发挥全球性影响，美国金融业竞争力会显著增强等。欧元对美元基本呈贬值趋势，其经济发展将部分受益于美国经济增长和中国因素，其金融服务业对美国和中国均有较强合作意向，欧元货币供给仍会进一步加大，欧元仍将基本维持较低利率水平，美国因素对欧元区经济影响具有两面性。日本经济受美国影响与欧洲具有某种相似性，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元升值会增加美国对日本的进口需求；另一方面，倾向美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将影响日本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而妨碍日本经济复苏。俄罗斯经济借助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机会较少，其发展将更多需要借助内生动力、中国和中亚因素，卢布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会受到压缩。

综合上述，人民币国际化对欧元区和俄罗斯似有较好机遇，对金砖国家应有较好机遇可以把握，对美日似不应过于乐观，对我国周边国家的机遇应有区别性把握。

（五）能矿价格巨大波动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无论全球能矿价格跳水的主要影响因素源于科技进步、政治因素或市场因素，从未来一段时期看，能矿价格已经进入下降通道，短期恢复至历史高位可能性较小。能矿价

格跳水已经并继续将对全球能矿主要出口和进口国及与能矿紧密相关的行业、经济体产生巨大持续影响。通过能矿与其他能源间联动作用，未来一段时期其他能源的价格不容乐观。整体而言，能矿价格整体走低对能源优势国家具有消极影响，对能源不足经济体较为有利。

从人民币国际化角度来看，在海外投资领域我国以往曾投资不少能矿丰富国家，较大数量地使用了人民币进行投资，这些国家受能矿价格波动影响，短期履约能力下降，冲击了我国人民币投资的规模和潜在空间，同时也增加了相应风险。在产业领域，世界能矿价格下降将会在一定时期内改变对能矿依赖较大产业的发展趋势与竞争格局。使得世界供给与需求匹配出现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海外投资增加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经济复苏以及能矿价格深幅调整，对国际贸易主体、供求结构和价格均会产生连锁反应，会使人民币国际结算领域出现新的机遇与挑战。从消费角度看，全球能矿价格下降部分地降低了某些国家、地区和行业的成本压力，会部分增强这些领域的消费和支出能力，但同时，也会因总需求不足产生若干负面影响。总体来看，全球能矿波动至少会在中期对全球经济产生普遍性影响，其影响将从能矿领域、相关产业、相关贸易和消费等各领域扩散到全球各个角落，将从能矿主要输出和输入国，向其他相关性较弱国家蔓延。上述变化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交汇点均会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机遇与挑战。

（六）国际政治格局等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货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归根到底不是孤立的经济金融活动，政治因素对货币国际化也有重要影响。某种程度而言，货币的国际职能和国际影响力是发行主体经济和政治国际影响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综合表现。货币在特定领域、区域和职能上发挥国际作用，必会受到相关政治格局影响。

未来一段时期，大国博弈、恐怖主义、宗教冲突、乌克兰问题、亚洲问题等与全球主要经济体政治稳定和国际博弈有关的因素错综复杂，对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和仍将产生重要影响。对部分经济体而言，政治、文化和宗教因素甚至超出经济因素，对人民币施加更大的影响。在政治阻力较大的国家、地区和产业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的复杂性超出了经济领域范畴，但如能因势利导，相关不利因素也会成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机遇。例如，人民币在穆斯林世界、俄罗斯、中亚、东盟和非洲的使用，以及中欧之间货币合作等均有可能将相关挑战转化为机遇。

三、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措施建议

总体看，货币国际化是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或货币当局）双重作用的结果，国际乃至国内需求是人民币国际化长期根本动力，国际货币合作是货币国际化关键内容。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乃至军事实力是货币国际化重要基础和关键影响因素。因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须总览全局，立足国内，具有全球视野。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尚处初级阶段，发展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需要夯实基础，抓住关键，捕捉机遇，防范风险，积极与稳妥兼顾。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战略应稳定清晰，具体举措应机动灵活，相机抉择。

（一）扣紧自主创新，大力发展综合国力

从全球综合博弈高度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是更广泛全球综合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始终明确，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金融国际战略重大目标，更是推动我国综合国力领先全球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要立足我国综合国力，又要围绕促进我国综合国力跃升的宏伟目标。某种程度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功夫在诗外”。在多个领域，我国均是大国而非强国。客观而论，在科学、技术、产业、文化、教育、生态环境和社会治理等领域创新能力不足已严重制约了我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潜力。我国在各个领域大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创新驱动发展局面，并在全球各领域形成突出优势，已成为我国夯实和发展综合国力、支撑人民币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货币的关键性任务。

（二）深化和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基础性工作

在特定国力水平上，人民币国际化基础性工作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深度、广度和持续性。在未来一段时期，应重点做好下述基础性工作：一是稳妥积极推进人民币利率与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形成长期利率机制、加大汇率双向浮动幅度和适用范围是重点工作。二是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当前，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依然不足。过快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易招致金融风险。从今后一段时期看，应在加快自由兑换和风险防范间建立平衡机制，重点抑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热钱冲击，在加快建立、完善和升级对跨境资本监管调控机制基础上，加快提升沪港通的市场效率与规模，积极总结经验，为在更大范围推进金融市场开放创造条件。三是加快建立完善人民币国际清算体系。一方面尽快建成上海全球人民币国际清算中心，为人民币全球国际清算形成核心支撑。另一方面，加快在重点区域建立海外人民币区域性清算中心，形

成支撑全球人民币国际清算的网络和体系。同时，在现有基础上，要将“一带一路”所涉区域和国家的人民币国际清算中心建设视为重中之重，狠下重手。同时，支持我国商业银行在更大范围发展人民币国际结算业务。四是大幅提高我国金融机构海外竞争力。应尽快筹划建立我国大型的，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业务的，结构合理均衡的综合性金融集团，大力发展人民币海外业务，全面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五是在严控风险基础上，放宽乃至放开我国投资机构海外人民币投资。我国经济总量较大，但人民币国际投资发展不足。这种现状既有我国相关机构国际竞争力不足的原因，也有我国相关政策约束我国投资机构发展人民币海外投资的历史原因。强化人民币海外投资能力，提升人民币国际投资职能，应在合理掌控化解相关风险条件下，鼓励中国资本走出去。具体而言，我国保险资金、社保资金、央企、地方国有资产以及其他经济主体均应本着积极探索态度，有计划分步骤，兼顾风险与机遇因素，加大对外股权或实业投资，一味简单回避相关风险对我国加快发展人民币海外投资能力不利。从根本上看，我国人民币海外投资能力薄弱的结症在于我国产业竞争力、品牌竞争力、科技竞争力、人才素质和商业渠道等国际投资软硬实力不足。解决上述问题的出路在于创新机制，激发活力，增加实战磨练，应尽早调整我国现行的、仍需大幅改进的对国内相关机构和企业海外投资政策约束，通过市场机制激励和约束我国经济主体海外投资活动。六是围绕创新驱动大幅提升产业全球竞争力，提高我国国际贸易主动性。我国产业和国际贸易主动性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主动性的重要因素。产业对外依赖，国际贸易就很难具备主动性；产业和国际贸易主动性较弱，我国就很难拥有产业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结算的货币选择权，发展人民币国际职能也就丧失基础。近年，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既反映了我国国民福利不断上升的佳绩，也加大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加之生态环境和资源约束趋于临界，我国产业发展几乎只剩创新驱动一途可循，破解之道唯有自主创新。七是积极获取国际金融重大规则制定话语权和风险监管参与权。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良好国际金融规则环境配合。目前，在全球重大金融规则制定和监管方面，我国参与度、影响力和决定权仍然较弱，一定程度加大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和风险。解决上述问题既需我国充分发展综合国力予以支撑，也需在上述领域积极寻求突破，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服务。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在已有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中争取更大份额和有利地位；另一方面，也要有立足现实、前瞻谋划和布局、具有亚洲乃至全球影响力、具有广泛国际代表性的国际金融机构。“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国际金融战略是重要抓手和突破点。八是科学改进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突出中央银行首要作用，增加一行三会工作协同度。从货币国际化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需统一协调我国整体金融资源形成合

力。目前，一行三会既享分业监管之利，也易有多头管理形成的不足，仅靠央行领导级别较高和部级协调机制，协调效果和机制长期性不足，应建立更为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九是积极争取在重大国际金融组织中提高人民币地位与作用。例如，应力争增补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篮子等等。

（三）捕捉重大机遇，释放和创造人民币国际需求

在 2015 年中，立足全球基本格局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预计人民币国际化领域可能出现如下机遇。一是美国经济复苏形成的国际资本回流，为扩大人民币海外投资规模创造了空隙机遇。初步判断，未来国际资本流动会一定程度降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流动性，借助近年我国产业实力、金融实力和海外投资能力延伸，人民币“走出去”有可能存在一定拓展空间。二是我国参与设立国际性金融机构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应急储备机制、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均有可能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建设相关机制，应立足多赢、分期演化，又要抓住机遇、文章做足。三是“一带一路”战略为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了发展思路和空间。“一带一路”所涉区域和领域应是扩展和深化了人民币国际化重点方向。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国际经济战略合作是重要内容，在我国产业和贸易国际合作中，国际金融合作是重要驱动力和共赢产物，货币合作作为国际金融合作的交汇点，承担了重要桥梁作用和制高点作用。紧扣“一带一路”战略，大范围、深层次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必会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出大量新机遇，有可能孕育出人民币国际化高地。四是国际能矿价格波动形成的机遇。能源作为全球重要经济要素，其价格大幅波动必会导致全球经济格局、结构和国际合作的全局性变化。我国作为能源需求大国，总体上受益能矿价格下降较多。鉴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我国受益较多的基本判断，我国开展国际合作的能力与空间加大，存在借助全球经济调整、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很大可能性。五是利用国际政治格局变化，捕捉人民币国际化机遇。从目前看，能矿价格大战、乌克兰问题和美欧关系问题，均与国际政治问题或与国际政治因素密切相关，整体判断相关矛盾存在加剧可能性，如可因势利导，相关因素会为中国深化与相关主体加强经济合作、金融合作和货币合作创造条件。归纳而言，捕捉机遇的着眼点是捕捉全球对人民币的国际需求、主要经济体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需求、主要经济体对自身稳定发展的需求。

（下转第 122 页）

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的 协同策略研究

吴维海 郭慧文

摘要：本文基于全球化环境和“中国梦”的国家战略，从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的研究背景、基本概念、起源与特征、趋势分析等入手，分别从关联性研究、协同模型两个角度，分析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的协同现状；通过研究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现状、产业趋势与存在的三大缺陷，分析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存在的六大问题或障碍；进而对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剖析，构建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关系模型，提出中国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的协调策略与政策措施，推动中国智慧城市的节能化、环保化，提高中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城市聚集度和智慧程度。

关键词：智慧城市 节能环保 产业协同

作者简介：吴维海，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执行总监、研究员；

郭慧文，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

一、背景分析

（一）研究背景

智慧城市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最高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融合”的发展思路，将信息化建设（包括智慧城市）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高度。智慧城市作为中国信息化与工业化高度融合的载体，借助智慧技术，以更智慧的方法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关键信息，改变

政府、企业和市民相互交往的方式，对各种需求做出快速和智能的响应，提高城市管理的智慧水平，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密切相关。智慧城市包含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包括对现有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对节能环保产业的智能化等，它与节能环保产业是高度交叉和相关的。节能环保建筑是节能环保产业的实践应用和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实施平台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信息化推动工业化、城镇化的时代体现和具体落实，是 21 世纪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结构重整、财富增长的新兴平台，是承载绿色发展、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路径，它与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目标是高度一致的。我们有必要构建规范的概念模型与运行机制，推动两者的协同发展。

以节能环保为重点的绿色产业及其相关产品将在今后全球经济、技术应用和国际贸易等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中国要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不断提升节能环保产业的规模和质量。

（二）基本概念

智慧城市是根据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理念，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泛互联网和信息全面感知的基础上，实现人、物城市功能系统之间无缝连接与协同联动的智能自感知、自优化，从而对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功能、商务活动等城市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形成具备可持续内生动力的“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城市形态。智慧城市包含了智慧环保、绿色发展等理念。由此可知，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

关于智慧城市的内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认为，智慧城市的实质是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的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的居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①

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存在关联性，因此，需要研究节能环保产业的概念及其组成要素，以及两者协同的概念和主要内涵。节能环保产业指为节约能源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环境提供技术基础和装备保障的产业，主要包括节能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和环保装备产业，涉及节能环保技术与装备、节能产品和服务等。节能环保产业的组成要素包括：节能技术和装备、高效节能产品、节能服务产业、先进环保技术和装备、环保产品与环保服务。《“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节能环保产业重点发展高效节能、

^①张梅艳、宋拥军：《苏州建设智慧城市的定位思考》，《商业经济》2013 年第 9 期。

先进环保、资源循环利用关键技术装备、产品和服务。节能指应用技术现实可靠、经济可行合理、环境和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有效地利用能源，提高能源设备使用或工艺的能量利用效率。狭义的环保产业是指在环境污染控制与减排、污染清理以及废物处理等方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广义的环保产业包括生产中的清洁技术、节能技术，以及产品的回收、安全处置与再利用等，是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全程管理。

协同论主要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己内部的协同作用，自发地出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协同论认为，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

（三）起源与特征

国外智慧城市建设最早可追溯到 1992 年，新加坡首次提出了“智慧岛”计划。IBM 在 2008 年提出“智慧地球”的理念，将其作为应对金融危机“振兴经济”的重点领域。欧盟的“欧洲 2020 年战略”、日本的 U-Japan、韩国的 U-City、新加坡的“智慧国 2015 计划”都提出了本地化的智慧城市愿景及发展目标。

从系统工程角度看，智慧城市的理念是把城市看成生态系统，城市中的市民、交通、能源、商业、通信、水资源构成功能各异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形成普遍联系、彼此影响的整体。IBM 在《智慧的城市在中国》中对智慧城市的特征做了界定，具体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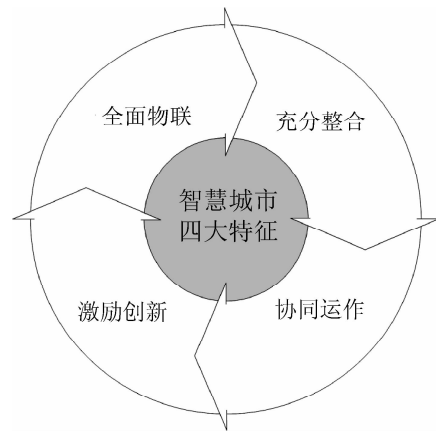


图 1 IBM 关于智慧城市的四大特征

全面物联：智能传感设备将城市公共设施物联成网，对城市运行的核心系统实时感测；充分整合：物联网与互联网系统完全连接和融合，将数据整合为城市核心系统的运行全图，提供智慧的基础设施；激励创新：鼓励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智慧基础设施之上

进行科技和业务的创新应用，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协同运作：基于智慧的基础设施，城市里的各个关键系统和参与者进行和谐高效的协作，达到城市运行的最佳状态。^①

（四）趋势分析

在全球化战略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的挑战，把实施绿色新政、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刺激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的重要内容，通过推进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等绿色产业发展，降低单位能耗和环境污染，实现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生态发展。中国政府提出的“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等建设目标，与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等目标、思路，构成了城市建设的国家目标导向。

为实现《“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单位 GDP 能耗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等约束性指标，中国必须不断提升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和服务水平，为大规模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这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必然选择。国务院以及国家发改委、环保部、住建部、工信部等部委出台有关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的政策文件，包括：《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年－2020 年）》《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交通运输业智能交通发展战略（2012 年－2020 年）》等。国家住建部 2012 年公布 90 个智慧城市试点城市，2013 年公布 103 个试点城市。2014 年 8 月 22 日，住建部、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 2014 年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启动 2014 年度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申报。中国已有超过 400 个城市宣布计划建立智慧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入加速期。在第十六届高交会的智慧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长预计，全球智慧城市市场规模 40 万亿美元，估计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 4 万亿元人民币。

节能环保产业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产业方向，也是实现各国、各地区智慧城市的基础保障，受到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欧美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每年保持了较快增长。据统计，全球环保产业的市场规模从 1992 年的 2500 亿美元增至 2013 年的 6000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8%，远远超过全球经济增长率，成为世界各国积极推动的“朝阳产业”。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环保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环保市场的主要力量。2010 年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 2 万亿元，从业人数 2800 万人。2013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国发〔2013〕30 号）》中提出：“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速在 15% 以上，到 2015 年，总产值达到 4.5 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

^①陈秉钊：《和谐的城市，生活才美好》，《规划师》2010 年第 8 期。

新的支柱产业。”在“2014（第五届）中国钢铁节能减排”论坛上，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表示，2011 年环保产业总产值约为 2.3 万亿元，从业人数达 2800 万人。“十二五”后三年（2013 年－2015 年），通过推广节能环保产品预计可拉动消费需求 4900 亿元，通过增强技术能力预计可拉动投资需求 3.66 万亿元。这给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高能耗、环境污染、管理粗放、信息化手段落后等问题，这制约了中国产业转型与智慧城市建设，也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核心的“中国梦”有所冲突。因此，研究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的协同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协同现状

（一）关联性研究

智慧城市应用一般包括智慧商业、智慧家庭、智慧文教、智慧政务、智慧安全、智慧市政、智慧医疗、智慧社区、智慧能源、智慧交通和智慧金融等，基本涵盖了公共服务、商业产业和居民生活等三大领域。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多以政府主导、行业应用示范为主，智慧城市体系一般自下而上分为感知层、设施层、数据支撑层和应用层四个层次。

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具有关联性。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2012 年徐汇区街道制定了低碳社区建设规划，选址南丹小区进行“风光互补”（太阳能车棚改造），通过信息化手段控制和监测，较好地解决了居民充电难、停车难等问题，实现了居民对节能环保技术的实践应用。徐汇区通过这一措施达到二氧化碳排放每年减少约 1500 千克，节约用电 3000 度，通过互联网等监控手段，利用上海电费错峰收费政策，降低了用电费用。这是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典型案例。^①

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在政策关联、技术应用、产业融合等方面有较高的相关性。智慧城市具有节能环保的特征，同时智慧楼宇和信息技术系统等都与先进的节能技术、环保产品的应用紧紧相连，彼此交叉。

智慧城市建设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成长的重要发展契机，将带动一大批有广泛市场前景、能源消耗低、产业带动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发展，催生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旅游、智慧交通、智慧环境、智慧物流、智慧安全等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直接拉动作用的新兴产业，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

^①徐汇区：《徐汇区推进节能智慧社区有成效》，《上海节能》2014 年第 4 期。

智慧城市有助于提升城市运营管理水平，能直接带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发展，还可以间接推动城市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各级政府、各地区已经意识到节能环保产业与重大项目的智能化、信息化和城市管理的智慧化程度是紧密相关、相互促进的。少数城市开始探索和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不断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和智慧城市的逐步融合。

（二）协同模型

分析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是否存在关联，需要从协同模型研究入手。

1. 欧盟智慧城市评估模型

欧盟中等城市的智慧城市评估模型，包括智慧产业、智慧民众、智慧治理、智慧移动、智慧环境、智慧生活六个方面。其中，智慧环境包括：自然环境魅力、污染、环境保护和可持续资源管理。智慧产业的生产率、智慧生活的文化设施、居住质量等也与节能产业相关。欧盟中等城市的智慧城市评估指标体系清晰地阐述了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具有较高的协同关系，具体描述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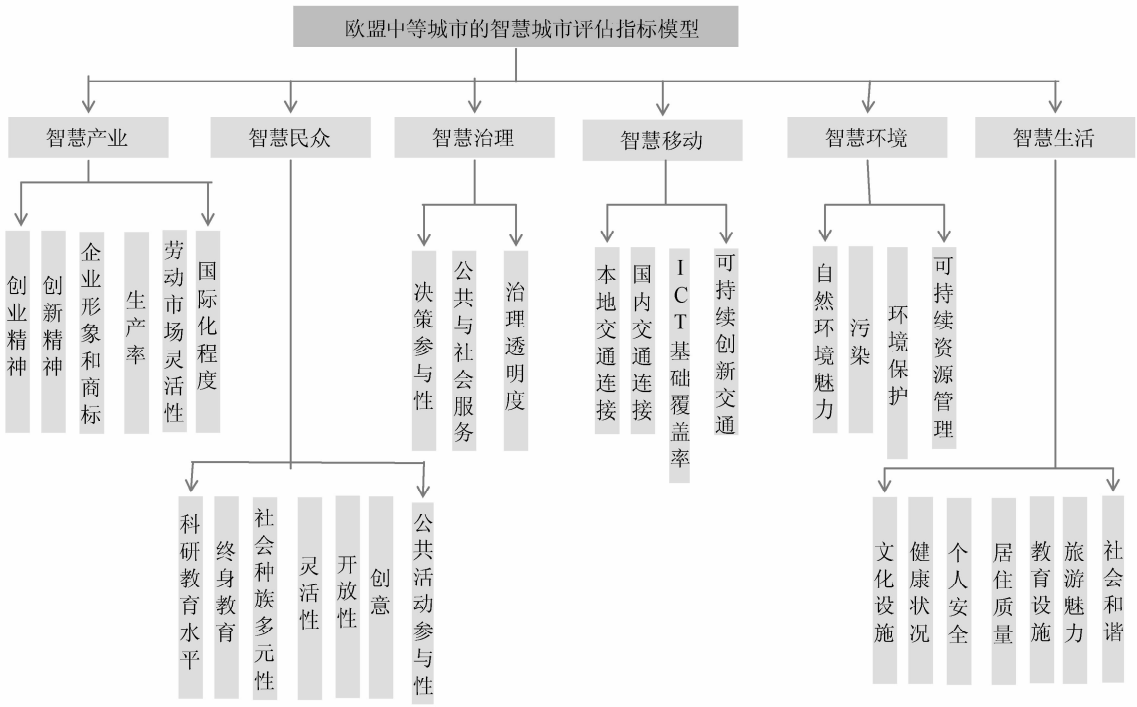


图 2 欧盟中等城市的智慧城市评估指标模型

2. 中国智慧城市模型

中国各级政府、国家部委和上海、北京、无锡等试点城市结合各自特征和城市管理实践，积极推动智慧城市指标模型的构建与优化。为规范和推动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住建部、科技部于2014年8月22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2014年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启动2014年度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申报。2014年8月29日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科技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也是国家首次就智慧城市出台全局性指导意见，被誉为智慧城市的顶级规划。

从层次结构上看，智慧城市的关注重点包含了节能环保产业的要素和内容。智慧城市建设关注关键技术，确保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把各项技术进行有效集成、有效管理。节能环保产业作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之一，智能化管理是其重要的发展方向。节能环保产业聚集在城市产业园或行政区，其智能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地理空间和产业内容存在交叉。智慧城市的架构一般可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其主要目标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而这三个目标都与节能环保产业相关联。具体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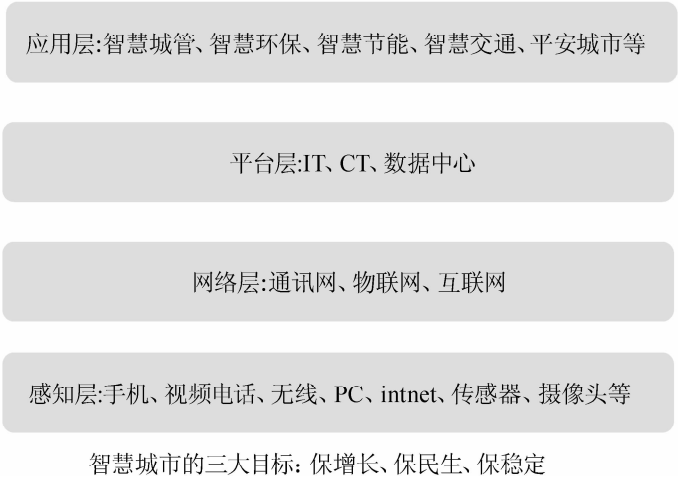


图3 智慧城市的架构模型

智慧环保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内涵，中国城市发展转型将“智慧”作为主导方向，积极参与试点示范，为智慧环保引进先进政策、技术提供了平台。实现智慧环保目标，以环境信息化为基础载体，让信息技术为中国城市环境管理服务创新提供支撑，建立高度信息化、现代化和智慧化的城市，使政府、企业和市民满意。^①

^①杨军、徐振强：《智慧城市背景下推进智慧环保战略及其顶层设计路径的探讨》，《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6期。

从产业价值链上看，节能环保产业主要包括节能产业、环保产业和资源循环利用三大产业，具有产业链长、关联度大的特点。从产业组织的角度看，节能环保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紧密结合的跨行业、涵盖面宽的综合性产业，包括方案设计、技术研发、材料采购、生产制造、销售物流、售后服务等基本环节，需要大数据、云应用、智慧物流、工业自动化、电子商务等支撑，并与智慧城市的相关环节相协同，具体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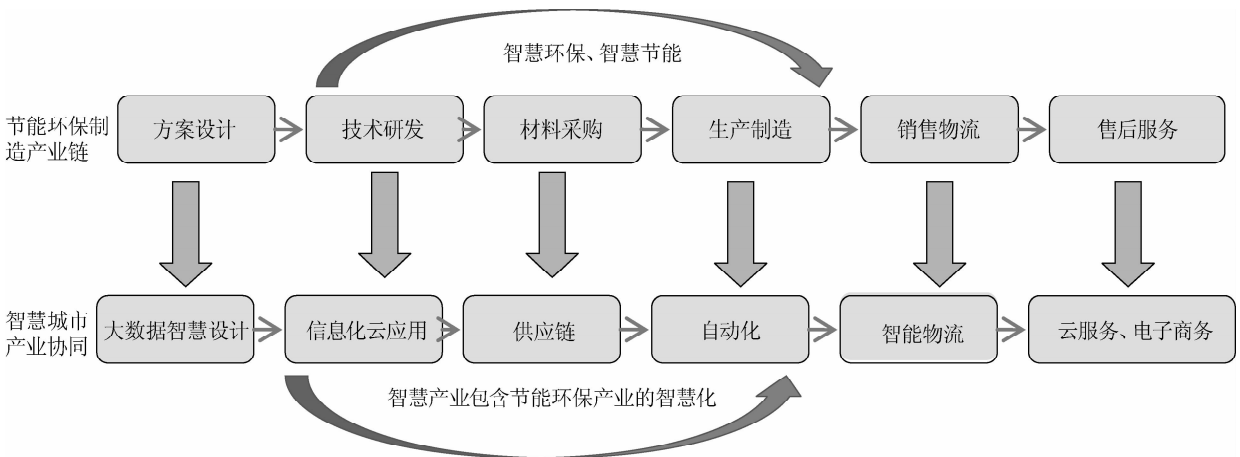


图 4 节能环保制造业产业链与智慧城市产业协同模型

由图 4 可知，智慧城市产业的大数据、智慧设计与节能环保产业的方案设计有机协同；智慧城市产业的信息化、云应用与节能环保产业的技术研发协同；节能环保产业的其他环节包含了或蕴藏着智慧城市产业的要素与内容，如节能环保产业的销售、物流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电子商务、智慧物流等相协同。

从产业协同上看，依据智慧城市四层分析法，对应节能环保产业的有关架构，探索构建两者的产业协同关联模型，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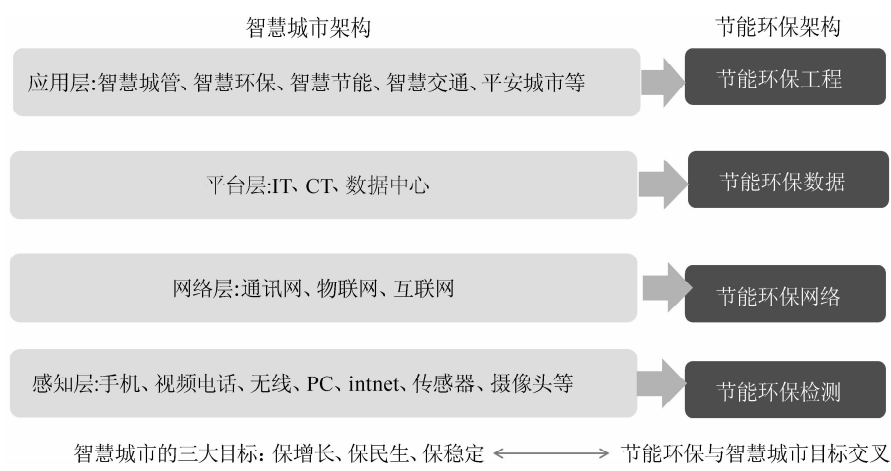


图 5 基于分层对应的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关联模型

由图 5 可知，智慧城市建设包含了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四个层次，各层次分别对应着节能环保部分产业或特定项目的监测与摄像、网络传输、数据和报表处理、行业或企业分析等，两者之间在某些内容和架构上交叉和对应。通过这一对应模型分析，有助于直观而间接地研究智慧城市和节能环保产业之间的关联性，进而揭示其彼此协同的影响与关系。

从经济实践上看，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之间的协同关系有助于构建北京市等智慧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北京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强调“绿色北京”概念，城市建设理念和具体内容都体现了与节能环保产业的协同发展。上海等城市将智慧城市建设列入《“十二五”规划纲要（2011 年—2015 年）》，体现了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的协同。上海的智慧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包含了智慧的环保、智慧的能源管理、政府信息化平台、企业信息化平台等要素；这些要素与上面的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的研究模型大体呼应，即智慧的环保和智慧的能源管理基本处于应用层和平台层，政府信息化平台和企业信息化平台基本属于平台层、网络层和感知层。使用这一模型进行关联性分析，基本反映了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的协同性，展示了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在服务平台支撑等方面的资源共享与统筹规划的必要性。杭州市以“智能 + 互联 + 协同”为理念，建设以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系统平台为基础的综合应用，属于重点构建智慧城市的平台层、感知层、数据层等建设内容，较好地推动了智慧城市建设，也会对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住建部有关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从保证体系与基础建设、智慧建设与宜居、智慧管理与服务、智慧产业与经济四个维度进行评估，其中包含了节能环保产业等智能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住建部《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为中国智慧城市试点建设提供了标准依据。在该指标体系的制定过程中，住建部参考了《绿色 GDP 指标体系》《智慧 GDP 指标体系》《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研究》《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指标》等多项国内外指标文件，借鉴了上海浦东新区、南京、武汉等智慧城市建设地区的规划标准。

3. 产业协同趋势

分析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的协同程度，有助于科学研究和前瞻性制定产业政策，进行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提高跨产业系统设计的质量。

从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方向上看，智慧城市建设呈现出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融合的趋势。日本《朝日新闻》2014 年 7 月 7 日报道，可灵活调配太阳能发电和蓄电的日本首个环保型城市“柏之叶智能城市”正式启动，该智能城市由三井不动产公司以筑

波快线的柏之叶校园站为中心，投资约 1 千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61 亿元）。该项目除了供应中心街区和商业设施的太阳能电力外，还设置了 1.6 万千瓦的备用蓄电池，其容量为一般家用蓄电池的 3 千倍。该项目在电力充裕时先储存电力，工作日供应电力给写字楼、假日供应电力给商业设施、在灾害发生时优先供电给住宅区使用等，将电力提供给必要的设施。迪比克市是美国第一个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城市，绿色环保是其建设的初衷。迪比克市携手 IBM，以连接城市所有资源（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为目标，将能源、水务以及交通三大系统建设作为优先发展领域^①，动态监测城市的资源使用状况，并智能化地做出响应。

中国“十二五”期间，国家从总量减排四项约束性指标和固废、危废监管等重点领域开始，启动国家级环保物联网重点应用示范工程，为全行业物联网的建设提供典型示范。2011 年前后，无锡、哈尔滨、北京、河北、浙江等地探索实施环境监控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项目与智慧环保产业建设，推动了智慧城市建设。

工信部副部长杨学山认为，“智慧城市是当今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与城市转型发展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城市走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需求”。杨学山将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的目标——“绿色、低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阐述。

4. 产业协同表现

中国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的协同发展，主要表现为：

一是节能环保产业与智慧城市建设理念的一致性。解决环境安全问题，保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在要求。节能环保产业以降低能耗和改善环境质量为前提，它是国家大力推进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是节约能源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的保障性产业，它与智慧城市的核心理念——低碳、节能、绿色、环保、宜居等相一致、相协调。2013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明确指出，资源环境制约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解决节能环保问题，是“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经济基础。“智慧北京行动纲要”确立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战略任务。“智慧北京”的基本特征是宽带泛在的基础设施、智能融合的信息化应用和创新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其中，“绿色北京”的智慧城市战略任务

^①佚名：《“智慧城市”就是要解决城镇化的问题》，<http://www.gushijiuba.com/lishigushi/11900.html>。

体现了环保、节能的核心理念，这从侧面印证了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在建设理念、建设内容等行业或领域是高度一致、产业协同的。节能环保产业属于典型的政策法规驱动型产业，需要突出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之同时，加强政府引导，驱动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市场。这些都与智慧城市的建设方针密不可分。智慧城市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代表，是以物联网为桥梁的高度联通的社会。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善民生，确保智慧城市建设的顺利、有效进行。二者存在理念上的高度一致性和交叉性。

二是节能环保产业与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技术手段、实现路径的一致性。中国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在发展战略方面强调“绿色”、泛在和协同的综合应对方案。“绿色”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灵魂，智慧城市的基本要素以“绿色”为核心，围绕节能减排和优化环境进行规划布局，不断提高城市的宜居度、智慧化。“泛在城市”即实现各城市内和城市间在智慧技术支持下的跨越时空的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网络数字信息联系，使各类资源的效能最大化和最优化，藉以提高市民生活和工作的便捷度。协同城市实现城市社会管理各要素间的整合与转型，以信息产业集群为基础，实现跨系统、跨部门、跨网络的应用集成、信息共享、融合互通，提高城市管理的灵敏度。从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技术手段和建设路径上看，节能环保产业与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下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需要构建以云应用和大数据为核心的技术路径，形成政府、产业和企业等为服务对象的信息基础设施综合服务平台。以智慧环保为例，中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建设内容包括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空气质量自动监控系统、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控系统、机动车排放监控系统、危险品抛弃物监管系统、区域生态监测系统、环境应急指挥系统等，而这些是智慧城市中“智慧环保”的重要内容。

三是节能环保产业与智慧城市在智慧化产业链的重点环节具有一致性。智慧城市产业链，主要包含智慧规划、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应用、智慧服务、智慧治理、智慧人文、智慧生活等。其中，智慧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驱动力，智慧产业与智慧应用是智慧城市的主要载体，节能环保产业的智慧化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方向。

5. 可能的协同概念模型

研究智慧城市和节能环保的现有政策、标准体系，有助于我们归纳与提炼两大产业的协同关系。

北京市“智慧北京行动纲要”及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建设“资源和生态环境智能监控”工程，完善北京市节能监测体系，实现对工业、交通及大型公共建筑、公共机构等

主要用能行业（领域）及场所、单位的能耗监测；建设智能的土地、环境和生态监管体系，实现对全市土地利用、生态环境、重点污染源、地质资源和灾害、垃圾处理等领域的动态监测。这表明了智慧城市建设与节能环保产业在技术研发、产业应用等环节具有较高的协同性和融合度。2014 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关于成立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协调推进组、总体组和专家咨询组的通知》中指出，为加强中国智慧城市标准化工作的统筹和协调管理，国家标准委经过与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协商，成立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协调推进组、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总体组和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专家咨询组，发布了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协调推进组名单、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总体组名单以及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专家咨询组名单。这表明了国家部委层面在积极推动智慧城市与环保产业发展的协同机制与政策协调。

从现有产业政策和标准体系的研究初步断定，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的建设理念、建设内容、技术融合、支撑平台等方面有较高的协同性。两者的协同关系模型，如图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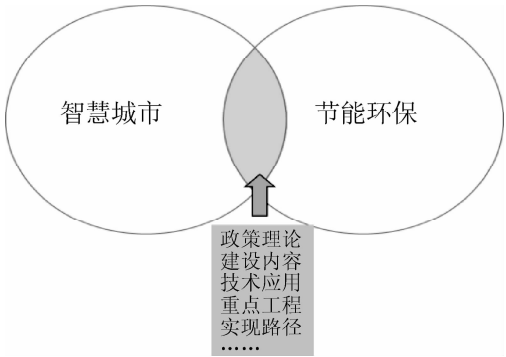


图 6 节能环保与智慧城市产业协同关系模型

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在政策理念、建设内容、技术应用、重点工程、实现路径等方面，具有较高的融合与交叉性，智慧城市在这些方面都体现了节能环保的意识或宗旨，在具体工程上有一些兼容性；同时，节能环保产业本身也体现为智慧城市的“智慧产业”中的智慧环保、智慧节能等具体组成部分。

按照前面分析的智慧城市建设的产业政策、建设理念、建设内容、核心技术、重点产业和服务平台等框架体系，可以初步探索和构建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的概念模型（见表 1）。

表 1 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概念模型

分析维度	主要内容	一级指标	协同度（理想状态）
国家政策	基于节能环保或智慧城市理念的政策	政策融合性 政策一致性 政策适应性	
发展理念	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理念是否一致	发展思路一致性 发展模式协同性	
建设内容	智慧城市建设内容是否贯彻节能环保	基础设施建设	
		电子政务建设	
		重点应用项目	
技术融合	物联网相关技术运用的融合性	节能环保的信息技术应用 物联网硬件融合	
产业融合	产业重要节点的融合性	重点环节的融合 重点环节的促进	
支撑平台	多级支撑体系	政府平台	
		企业平台	
		公众平台	

 ¼ 极少协同  部分协同  ¾ 协同  高度协同

注：本表使用特尔非法，借鉴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评估。

通过从不同分析维度与影响要素的系统研究，对智慧城市和节能环保各层级的一级指标进行初步探索与概念性设计，有助于对智慧城市和节能环保产业的关联性进行量化研究，更好地推动智慧城市和节能环保产业的协同度监测与产业发展。

三、缺陷研究

（一）主要缺陷

我们通过研究智慧城市建设的案例，分析与提炼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与本质。

当前，中国城市污染问题形势严峻，城市管理的信息化程度不高，严重制约各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地空气污染严重，空气质量堪忧；北京等地的沙尘暴、光化学烟雾和灰霾等时有发生，PM2.5 成为加剧大气环境问题的温床，导致了

中国特大城市空气质量下降，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也对智慧城市建设和节能环保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智慧环保对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生态环境改善具有显著的效能与潜力，节能环保产业的智慧化管理与监测等方面的市场需求巨大。

从整体上看，中国一些城市与地方政府在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实践中，往往各行其事，相互分离，容易忽视两大产业的协同规划、资源统筹与产业促进，各地区在智慧城市建设与节能环保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研究北京、上海、无锡、广州、重庆等智慧城市案例可以发现，中国地方政府在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的协同方面存在如下图 7 所示的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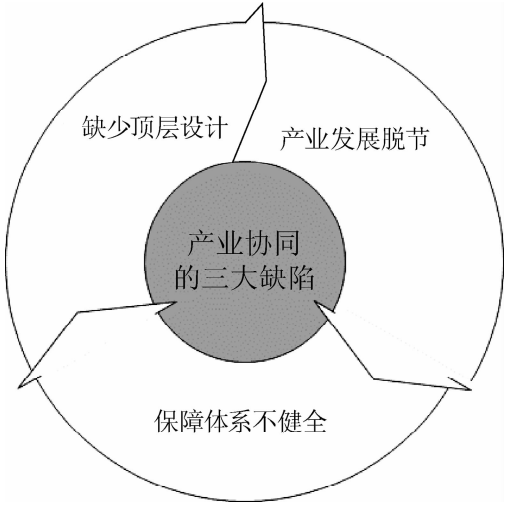


图 7 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存在的三大缺陷

1. 缺乏跨产业的顶层设计和宏观指导。国务院和各部委有关的政策规划和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不明确、基础建设标准模糊、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的关系不清晰、相关部门各自为政等。
2. 智慧城市建设与节能环保产业脱节。个别城市推动的智慧城市偏重于技术层面和智能交通等个别领域，存在盲目性、长官意志、面子工程与业绩导向。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往往忽视智能化和互联网技术应用等，存在两层皮的脱节现象。
3. 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由于缺乏国家政策约束和统一指导，各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存在随意性、主观性和信息“孤岛”，少数城市喜欢聘请外资公司进行技术设计和硬件配套，存在国家信息安全漏洞等问题。智慧城市建设财力有限，投资分散、资源重复浪费、没有构建城市安全防火墙和隔离手段，有关节能环保等方面的信息化平台和城市监测系统没有形成规范、严谨、实用、前瞻的规范标准。

(二) 协同障碍

分析中国主要城市智慧城市建设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情况，总结两者协同中的缺陷和障碍，有助于研究制定下一步的改进措施。目前两者协同发展的主要问题或障碍，直观描述如图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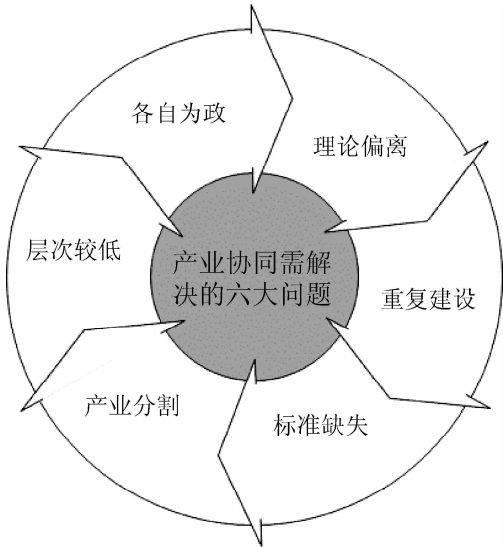


图 8 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需解决的六大问题

中国智慧城市和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存在六大问题或障碍。

1. 各自为政。在国家政策制定方面，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在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领域往往出台各自独立的文件，有些文件、规定相互之间不一致；跨部门协调和沟通较少，容易导致部委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本位主义和各自为政。比如，目前国务院、发改委、住建部、工信部、环保部等各自颁布了一些智慧城市、信息化建设文件，各自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导致了地方政府无所适从，或者主管部委太多造成的相互扯皮或跨部门协调困难。
2. 理念偏离。在发展理念方面，住建部的文件和地方政府往往追求大而全的智慧城市建设，这与西方欧美国家的行业性、区域性智慧城市做法存在较大差异。与之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在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中不能做到与智慧城市“一盘棋”，容易出现各个主管市长各唱各的戏、各念各的经，结果是各部门之间、负责人之间不一致，投资重复和规划重复。
3. 重复建设。在建设内容方面，有些地方政府和试点城市出现了智慧环保、智慧交通、智慧水务等各自的智慧信息系统，各套信息系统各自投资，其技术路径、信息源、大数据平台相互分散、分离，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信息和相关人员不共享，造成了巨

大的浪费和不必要的能耗。

4. 标准缺失。在技术融合方面，国家没有构建统一的行业规范、技术标准和实现路径，智慧城市、节能环保产业信息化建设的制度要求和其主管部门都不统一，各层级跨部门的技术沟通与协同研究少，存在相互分割现象。

5. 产业分割。在产业融合方面，智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往往是由政府成立一个信息化部门管理并推进，节能环保产业的信息化一般由工信部及其下属机构推动，各个部门的职责与目标不协调，以及部门之间职责分工不明晰，容易导致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融合的协调机制缺失，无法以系统的、协同的心态进行规划设计，以及主动沟通与推进各产业的健康发展。

6. 层次较低。在支撑平台建设方面，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由于缺少资金和技术，多数地方推动电子政务比较多，与智慧城市相关的企业云、产业云、电子商务等方面实施困难。同时，服务于节能环保产业的大数据基本空白，多数城市没有建立节能环保产业的智能化监控与管理信息系统，这些都是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由上可知，中国智慧城市和节能环保产业的协同存在政策融合不够、各自为政、认知理念有差距、项目重复投资、缺少协同标准、产业分割、协同层次较低等问题和障碍，两者协同的理想目标与实践操作差距很大。

四、政策措施

为推动中国智慧城市和节能环保产业的协同发展，应采取如下的政策措施：

（一）强化国家层面的政策协调和产业融合顶层设计，提高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支持与窗口指导

国务院成立智慧城市工作领导小组，由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等各部门参与，定期召开专题会，研究有关政策，出台跨产业协同的发展规划；协调各自的行动，明确不同阶段的工作目标；部署各自的重点任务，协调解决产业协同中的难题；重要事项提请工作协调小组研究决策，修订和出台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法规与操作办法。

强化国家、地方政府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的顶层规划与行动计划。重新审议现有智慧城市规划、管理模式和各部委的操作机制，从国家层面进行智慧城市标准设计和产业规范；将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有机结合，通过两者的融合实现智慧城

市的落地；将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目标和技术方案、主管部门、产业实现路径、运行机制等进行新的谋划与优化，确保国家、部委等顶层设计的规范性、连续性和一致性。

（二）构建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的组织运行机制

成立部委沟通协调、责任分工的国家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日常管理办公室，具体设在发改委或住建部。各地成立省市长、县区长挂帅的智慧城市建设与产业协同工作组，完善发改委、住建部等职能部门的责任与分工，制定并下达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的行动路线图，规范产业协同标准、重大决策与实施流程，确保两大产业的协同发展和智慧城市项目的低碳化、循环化、减量化，以及重大节能环保项目的智能化、融合化。

（三）构建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的技术融合方案

以全球化标准进行智慧城市建设的体系设计，选择全球先进的技术和操作流程；不断研究和创新技术研发、技术应用的新模式、新思路，跟踪国际前沿的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核心技术；引进专业机构，进行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协同发展的技术路径选择和顶层设计，进而确定合理的资源共享方案；推动两大产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技术研发、技术选择、技术应用和技术融合，提高技术应用的共享性和扩展性。

（四）构建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融合方案

以国家产业政策和城市发展趋势为指引，研究全球和中国新兴产业发展路径与操作模式，分析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从产业融合的视角，进行跨部委、跨产业的工作协调和项目推进，打破各部门、各行业的部门割裂和本位主义；以集约的、融合的、协同的、泛在的发展理念，制定和执行政府、开发区、部门的智慧城市和节能环保产业融合行动计划。在跨产业融合方案中，充分体现智慧的、环保的、节能的理念和要求。以智慧城市建设推进节能环保产业的信息化、智能化、泛在化，以节能环保产业推进、引导和落实智慧城市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中国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的高度协同与均衡发展，提高地方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

（五）构建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的绩效考核体系

转变政府业绩考核导向，以智慧城市和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为主要业绩考核目标，分解各自的职责与工作任务，明确指标与开发进度，分工到部门和各个岗位，进行定期考核与检查评比，逐步提高两大产业协同发展的执行力和绩效力。

立足各地区、各时期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需要，制定与评估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智慧化水平，确定节能环保产业协同的关键指标，明确各类指标的责任主体，逐步形成《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协同发展关键指标责任表》，与各地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的绩效考核挂钩，同部署、同考核、同兑现。国务院各部委、各级政府、各部门根据责任分工和任务分解，明确各自重点，制定分解年度实施方案，强化相关计划执行。

建立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的第三方评估机制，按照责任分工、任务分解计划与年度实施方案，开展季度、年度评估和产业协同成果考核，将评估考核内容纳入各级政府、各部门和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与兑现范围。

（六）构建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的支撑平台体系

加强跨产业协同规划制定与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的协调与资源共享。以智慧城市综合服务平台和专业化服务平台为重点，构建智慧环保、智慧节能（智慧工业节能、智慧农业节能、智慧交通节能等），形成节能环保产业的智能化监测体系与控制机制，促成智慧城市的节能化与环保达标，提高中国智慧城市与节能环保产业的协同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 张梅艳、宋拥军：《苏州建设智慧城市的定位思考》，《商业经济》2013 年第 9 期。
2. 李迅、曹广忠、徐文珍：《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发展研究》2010 年第 1 期。
3. 徐汇区：《徐汇区推进节能智慧社区有成效》，《上海节能》2014 年第 4 期。
4. Blair M. M. & Lynn A. S. , A Team Production Theory of Corporate Law. 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1999 (4): 751 – 806.
5. Giffinger R, Fertner C, Kramar H, et al. , Smart Cities: Ranking of European Medium – Sized Cities. Vienna, Austria: Centre of Regional Science, Vien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2007.

责任编辑：黄启云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5年2月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全球经济需求至今仍未恢复元气

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2月26日表示，虽然市场投资者确实都预期美联储将加息，不过美国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滑，全球经济状况仍然疲软，事实上有效需求非常弱，当前全球经济的有效需求可能并不比2008年—2009年经济危机期间高出多少。虽然目前经济危机不会卷土重来，而当前全球总体经济状况却仍是上一轮经济危机结束之后最糟糕的。格林斯潘指出，即使在发达经济体中相对表现最好的美国，其整体经济数据也“不强劲”。

（二）“货币战”威胁全球经济增长

“债券大王”格罗斯近期表示，各国“不宣而战”，打响了货币竞相贬值的战争（即所谓的“货币战”），不仅不会刺激经济增长，还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骏利资产管理集团（Janus Capital Group Inc.）的投资展望报告写道，央行政策已导致欧洲出现负利率，中国和日本等国明显在推动货币贬值。尽管这样的行动降低了债务负担、降低了出口价格，但总体而言却会伤害全球经济。

格罗斯认为，按照常识，全球经济无法自我贬值，要么是强势美元削弱了目前的全球增长火车头（美国），要么是他们不约而同的贬值行动未能实现预期效果。更重要的

是，低到负数的利率打击了资本市场的功能，促使投资者承担更大风险以促进回报率，令金融体系更加容易受到冲击。这就是美联储看似最早将在 6 月份加息的原因之一。

（三）全球经济增速在 2014 年略有提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3 月 11 日发表报告称，全球经济增速在 2014 年略有提升，欧元区出现了温和的复苏，印度的增速抬头，抵消了中国和日本经济的放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合并计算 20 个最大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2014 年有 3.4% 的增长，略高于 2013 年的 3.2%。G20 集团在全球经济产出中约占 90%。报告称，经济增速的提升受到欧元区恢复增长的带动，相比 2013 年 0.5% 的下降，2014 年实现了 0.9% 的增长。美国的经济增长趋势没有明显变化，中国的增长率从 7.7% 放缓至 7.4%。印度和英国在 2014 年有明显的经济增长加速，而日本的增幅明显放缓。

对全球经济而言，2014 年又是令人失望的一年，经济大局尚未从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衰退中完全复苏。而 2015 年的情况也不会太好——欧元区和日本还在试图强化各自萎靡的复苏走势，中国已经有进一步放缓的迹象，俄罗斯和巴西也各自面临动荡。

（四）“去全球化” 损害世界经济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网站 2 月 1 日发表外交学会东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乔舒亚·柯兰齐克的文章《大规模的去全球化》称，最新的去全球化趋势造成的冲击可能会造成长期损害，削弱经济增长。

1. 去全球化曾经多次发生

自 21 世纪的头 10 年末以来，全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去全球化时期。全球贸易增长比正常水平显著放缓。银行在本国以外的投资和贷款急剧减少，投资者从发展中国家的股市抽身，跨境移民数量下降。历史表明，这种向国境内收缩的情况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现象，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曾多次发生，而且令人感到担忧。有时候，大战发生后会出现去全球化时期；还有些时候，去全球化是全球经济震荡造成的。每个去全球化时期过后，世界最终都会恢复正常，但去全球化时期的影响可能相当大。

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体系一直在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循环之间交替轮换。在全球化时期，世界似乎变小了，贸易发展，跨境投资上扬，国际移民增加，国际交流网络的联系更加紧密。去全球化时期的情况则相反，贸易增长放缓，政府征收关税并实施其他保护主义措施，投资缩减，国家间的文化和人际联系减少。

2.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未消散

当前的去全球化时期是 2008 年至 2009 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引发的。危机始于美国和欧洲，然后蔓延到了全世界，衰退造成的影响在数年后的今天仍未消散。原因之一是，危机发生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银行大幅度减少了给别国企业的贷款。欧洲国家的银行是发展中国家新兴企业迄今为止最主要的资本来源，如今却通过立法迫使这些银行更多地投资于本国企业，以降低银行风险，同时向欧洲企业提供支持。瑞士信贷银行估计，在接下来的 20 年，由于欧洲的银行回归本国市场，新兴市场将损失 1 万亿美元的资金。同时，美国和日本的银行也减少了海外贷款。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跨境资本流比 2008 年之前减少了 60%。

危机发生后，那些全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政府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保护本国行业，这些措施导致了全球贸易缩水。英国经济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最近发表报告，对 2009 年到 2013 年实施的贸易相关措施展开了综合分析。报告发现，2013 年最富裕的国家比 2009 年多采取了 23% 的保护主义措施。

知名经济学家、英格兰银行外部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克丽斯廷·福布斯在 2014 年 11 月份发表讲话时说，跨境资本流严重倒退，已经收缩至冷战结束和银行业实现计算机化之前的 1983 年的水平。她说，现在不能再大谈全球化了，要反思全球金融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的说法，银行业的去全球化将产生深远影响。

3. 富裕国家孤立主义加剧

历史表明，当前这样的去全球化时期可能会产生持续数十年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的影响之一，是富裕国家的孤立主义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对美国人展开的调查显示，坚信美国应该减少在国外发挥作用的美国人比例达到了 50 年来的最高值。由于没有其他大国能够承担全球主导作用，如果美国或德国退出，将会留下危险的权力真空，一旦爆发严重危机，没有哪个国家能组织采取对策。

去全球化还可能会对世界经济造成长期损害。减少银行跨国贷款将会削弱创业精神，因为世界各国的小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找到帮助它们成长的人。此外，国有企业往往会利用与政府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影响力压垮规模较小的私营竞争对手。

从长期来看，去全球化可能会加剧贸易的总体下滑，而这会削弱整体国际经济的活力。多项研究表明，自由贸易能促进国际贸易增长以及支持贸易国家的增长率。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带来全球发展机遇

麦肯锡公司全球总裁鲍达民 2 月 26 日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主要依赖于投资，而居民消费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分别超过 70% 和 65%。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结构中消费比重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虽然近年来在产品研发方面投入大量的资源，但是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空间依然很大。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将有所下降，但总体仍将维持巨额增量，同时产业结构也将发生巨大变化。鲍达民认为，在诸多变化中，最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国内环境的改善、消费和服务比重的提升、创新驱动能力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活力的增强，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可持续性将得到提升。

谈及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鲍达民坦言，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依然巨大，前景非常乐观。其中，城镇化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城镇化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大量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意味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城市内部，中产阶层数量和规模的不断增加，将带动消费者整体消费能力的上升，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提供动力。

在中国未来经济结构方面，鲍达民认为，城镇化发展和消费能力的提升，无疑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结构中消费所占比重。当前，中国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产业，不仅使电子商务这一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也将在未来促进中国汽车制造、化工、金融、医疗，以及房地产等产业与互联网产业实现融合式创新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产品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占全球投入比重已经从 1993 年的 2.2% 上升至 2014 年的 17.5%。随着未来中国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中国工业部门在国际产业链向上移动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展望中国经济新常态对于海外投资者的影响，鲍达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将受到城镇化发展、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深刻影响，与此相关的教育、医疗、食品产业等部门将在未来 10 年内快速发展；互联网将推动未来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并带动物流业迅速发展。此外，清洁能源技术等绿色产业也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时期。在中国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和市场开放力度的背景下，未来中国上述领域的机遇也将成为全球市场参与者的发展机遇。

（二）政府对今年经济增速达不到 7% 的容忍下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3 月 5 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了今年经济增速等目标。摩根大通研究报告认为，经济增长目标与普遍预期一致，但认为政府今年对增长目标达不到 7% 的容忍度下降。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稳增长是创造就业机会和确保就业形势稳定的关键。另外，今年通胀目标为 3.0%。摩根大通表示，对 2015 年全年通胀率水准的预测仅为 1.0%，远低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目标。通胀目标通常表示的是一个上限，也就意味着通胀目标并不代表约束性限制。相比之下，当前低通胀环境将为资源定价机制改革和货币宽松提供更大空间。鉴于松紧适度的信贷政策和金融中介趋势，报告预期 2015 年广义货币实际增速可能在 11.4% 左右。

报告指出，2015 年财政预算赤字目标为 1.6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2.3%。其中，地方政府发债额度在 2014 年 4000 亿元的基础上升至 2015 年的 5000 亿元。上述目标低于摩根大通对于预算赤字占 GDP 比重 2.9% 的预测，也加重了对未来财政负担将拖累经济增长的担忧。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设定为 15%，贸易增长目标为 6%，零售总额增长目标为 13%。报告认为，尽管所有这些目标和去年相比都有所下调，但仍然预期上述三个目标将与 2014 年一样无法达成。原因包括价格影响、CPI 和 PPI 通胀水准、大宗商品价格均远低于 2014 年初始预期。

报告指出，出于金融稳定的考虑，对货币宽松保持相对中性的态度，这表明进一步降息的空间有限。鉴于今天对货币政策相对温和的讨论和不再具有支持性的财政政策，目前预计 2015 年第二季度将会再次降息 25 个基点。此外，预计 2015 年银行贷款将会增长约 13.5%，新增贷款 11 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很可能会增长 13% 至 17 万亿元。

（三）中国经济迈向缓慢但更平衡的增长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 月 5 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 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 左右，城镇新增就业 1000 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 4.5% 以内，进出口增长 6% 左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

野村证券对此指出，经济增长目标下调预示着中国未来会有更缓慢但是更平衡的增长。野村经济学家 YangZhao、ChangchunHua 及 WendyChen 认为，增长目标调整反映出中国政府意识到经济增速下滑，同时还反映出中国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野村预计，2015 年中国 GDP 增速将放缓至 6.8%，小幅低于政府目标。该机构预计今年货币政策将维持宽松，二季度基准利率将被下调 25 基点，而在今年剩余的三个季度，央行将在

每个季度都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50 基点。

（四）中国金融、国企、财政改革最重要

评级机构惠誉就“两会”发表点评指出，一般分析断定，中国在经济增速减慢与债务负担之间，存在无可避免的取舍。但惠誉认为，此看法过于悲观。如果中国政府能推行结构性改革，将可为更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创造发展空间，让中国经济摆脱债务陷阱。

中央政府提倡可持续及更均衡的经济发展。惠誉指出，有三个方面的改革对达成此目标至为重要。第一是金融改革，其中最有效的措施是利率市场化。第二是国企改革，以收窄国企与民企营运效率的差距。第三为财政改革，尤其是加强地方政府财政资源。

不过，惠誉补充，目前中国经济仍有相当多的问题未解决，包括楼市降温、土地收入下降等。中国推行改革的决心还值得继续观察。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上接第 98 页）

（四）积极防范，化解国内外经济金融风险

“三期叠加”使得我国金融体系、部分区域和行业经济金融风险明显上升。人民币国际化需以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为基础。有鉴于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和其他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需密切关注金融机构、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金融风险，进行深入前瞻把握，确保我国经济和金融不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变化，我国前期海外投资风险有所上升，甚至大幅上升，其连锁反应及国际资本流动问题极易对我国经济均衡发展造成突出影响，进而威胁我国国际收支平衡。上述内容均程度不同地会影响我国利率、汇率、投资、贸易、产业、金融市场和国际收支等，进而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展望未来，防范和化解相关风险是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保障和基础。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2013 年—2016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 年 1 月)				
世 界	3.3	3.3	3.5	3.7
发达国家	1.3	1.8	2.4	2.4
美 国	2.2	2.4	3.6	3.3
欧元区	-0.5	0.9	1.2	1.4
日 本	1.6	0.0	0.6	0.8
发展中国家	4.7	4.4	4.3	4.7
印 度	6.9	7.4	6.3	6.5
俄罗斯	1.3	0.6	-3.0	-1.0
巴 西	2.5	0.1	0.3	1.5
世界银行(WB,2015 年 1 月)				
世 界	2.5	2.6	3.0	3.3
发达国家	1.4	1.8	2.2	2.4
发展中国家	4.9	4.4	4.8	5.3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15 年 3 月)				
世 界	2.4	2.6	2.8	3.2
美 国	2.2	2.4	3.1	2.9
欧元区	-0.5	0.9	1.4	1.7
日 本	1.6	0.0	1.1	1.7
印 度	6.9	7.4	6.3	

注:1.IMF 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2013 年及 2014 年数据为印度官方大幅上修后数据,而 2015 年及 2016 年数据系参照原官方数据的预测结果,故与 2013 年—2014 年官方数据不可比。3.各国 2013 年、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2 2013 年—2016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世 界	3.4	3.1	3.8	5.3
进口				
发达国家	2.0	3.0	3.7	4.8
发展中国家	5.5	3.6	3.2	6.1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5 年 1 月预测。

表 3 2013 年—2016 年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 年 1 月)				
发达国家	1.4	1.4	1.0	1.5
发展中国家	5.9	5.4	5.7	5.4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15 年 3 月)				
世 界	2.8	3.0	2.5	3.0
美 国	1.5	1.6	0.3	2.1
欧元区	1.4	0.4	0.0	1.2
日 本	0.4	2.9	0.7	1.1
印 度	9.5	6.4	5.5	5.8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国 2013 年、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4 2014 年 2 月—2015 年 2 月消费者价格同比
上涨率(上年=100) 单位: %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4 年		3.6	1.7	7.8
	2 月	3.2	1.3	7.2
	3 月	3.4	1.5	7.5
	4 月	3.7	2.0	7.5
	5 月	3.9	2.0	7.9
	6 月	3.8	2.0	7.7
	7 月	3.8	1.8	7.9
	8 月	3.7	1.7	8.0
	9 月	3.7	1.7	7.8
	10 月	3.6	1.7	7.7
	11 月	3.5	1.5	7.7
	12 月	3.4	1.2	8.1
2015 年				
	1 月	3.1	0.9	7.6
	2 月	3.2	1.0	7.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2014 年 2 月—2015 年 2 月工业生产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4 年		3.2	2.7	5.2			
	2 月	3.8	3.2	4.9	53.2	54.6	54.6
	3 月	3.2	3.1	4.9	52.4	53.5	53.2
	4 月	3.8	2.8	4.7	51.9	52.9	52.6
	5 月	3.8	2.2	5.5	52.1	53.5	53.1
	6 月	3.2	2.1	5.3	52.6	54.0	54.1
	7 月	3.8	2.3	4.8	52.4	53.8	53.9
	8 月	2.5	1.1	4.8	52.5	53.7	53.8
	9 月	3.1	1.7	5.9	52.2	53.2	52.9
	10 月	3.1	1.7	5.1	52.2	53.0	52.8
	11 月	2.5	1.4	4.9	51.8	52.3	52.3
	12 月	3.1	2.0	5.3	51.5	52.0	52.0
2015 年							
	1 月	2.5	1.9	4.1	51.7	52.9	52.3
	2 月				52.0	53.3	52.3

注:1.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2012 年—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2 年		2.3	1.8	-1.4
	1 季度	2.3	2.8	-2.7
	2 季度	1.6	1.3	-0.4
	3 季度	2.5	1.9	2.7
2013 年	4 季度	0.1	1.9	-6.0
		2.2	2.4	-2.0
	1 季度	2.7	3.6	-3.9
	2 季度	1.8	1.8	0.2
2014 年	3 季度	4.5	2.0	0.2
	4 季度	3.5	3.7	-3.8
		2.4	2.5	-0.2
	1 季度	-2.1	1.2	-0.8
	2 季度	4.6	2.5	1.7
	3 季度	5.0	3.2	4.4
	4 季度	2.2	4.4	-1.9

表 7 2012 年—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8.3	3.3	2.3
	1 季度	9.1	1.3	1.7
	2 季度	4.4	4.8	4.0
	3 季度	3.1	2.1	-0.6
2013 年	4 季度	6.6	1.5	-3.5
		4.7	3.0	1.1
	1 季度	2.7	-0.8	-0.3
	2 季度	4.9	6.3	8.5
2014 年	3 季度	6.6	5.1	0.6
	4 季度	6.3	10.0	1.3
		5.3	3.2	4.0
	1 季度	0.2	-9.2	2.2
	2 季度	9.5	11.1	11.3
	3 季度	7.7	4.5	-0.9
	4 季度	4.5	4.5	10.4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2012 年—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2 年		2.3	1.8	-1.4
	1 季度	2.6	1.7	-1.8
	2 季度	2.3	1.8	-1.8
	3 季度	2.7	1.8	-0.5
2013 年	4 季度	1.6	2.0	-1.7
		2.2	2.4	-2.0
	1 季度	1.7	2.2	-2.0
	2 季度	1.8	2.3	-1.8
2014 年	3 季度	2.3	2.3	-2.4
	4 季度	3.1	2.8	-1.9
		2.4	2.5	-0.2
	1 季度	1.9	2.2	-1.1
	2 季度	2.6	2.4	-0.7
	3 季度	2.7	2.7	0.3
	4 季度	2.4	2.9	0.8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8.3	3.3	2.3
	1 季度	11.1	4.0	3.1
	2 季度	10.1	3.6	3.4
	3 季度	6.6	3.1	2.4
	4 季度	5.8	2.4	0.4
2013 年		4.7	3.0	1.1
	1 季度	4.2	1.9	-0.1
	2 季度	4.3	2.2	1.0
	3 季度	5.2	3.0	1.2
	4 季度	5.1	5.1	2.5
2014 年		5.3	3.2	4.0
	1 季度	4.5	2.8	3.1
	2 季度	5.6	3.9	3.8
	3 季度	5.9	3.8	3.4
	4 季度	5.4	2.4	5.6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月份		%	%		%	%	
2014 年	23445.3		2.8	28492.4		3.4	-5047.1
1 月	1927.5	0.0	2.8	2315.9	0.6	0.8	-388.4
2 月	1880.4	-2.4	0.0	2299.4	-0.7	0.1	-418.9
3 月	1942.1	3.3	3.9	2370.0	3.1	5.9	-427.8
4 月	1945.9	0.2	3.6	2401.7	1.3	5.3	-455.8
5 月	1968.3	1.2	5.1	2400.6	0.0	3.5	-432.3
6 月	1959.7	-0.4	2.9	2373.8	-1.1	4.6	-414.1
7 月	1978.6	1.0	4.2	2385.1	0.5	4.0	-406.5
8 月	1985.9	0.4	4.2	2385.0	0.0	3.6	-399.2
9 月	1951.8	-1.7	2.6	2385.5	0.0	2.6	-433.7
10 月	1987.1	1.8	2.4	2406.1	0.9	3.2	-419.0
11 月	1967.9	-1.0	1.0	2363.2	-1.8	2.4	-395.3
12 月	1950.0	-0.9	1.1	2406.0	1.8	4.5	-456.0
2015 年							
1 月	1894.1	-2.9	-1.7	2311.6	-3.9	-0.2	-417.5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4 年		0.8		6.2	264.9
	2 月			6.7	18.8
	3 月	-4.7	0.6	6.6	22.5
	4 月			6.2	33.0
	5 月			6.3	23.6
	6 月	2.9	1.1	6.1	28.6
	7 月			6.2	24.9
	8 月			6.1	21.3
	9 月	3.9	1.2	5.9	25.0
	10 月			5.7	22.1
	11 月			5.8	42.3
	12 月	-2.2	-0.1	5.6	32.9
2015 年					
	1 月			5.7	23.9
	2 月			5.5	29.5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2 年		1696.8	3113.5	-1416.7
	1 季度	292.5	1045.6	-753.0
	2 季度	523.1	704.1	-181.1
	3 季度	449.3	915.9	-466.7
	4 季度	432.0	447.8	-15.9
2013 年		2307.7	3283.4	-975.8
	1 季度	433.1	812.1	-379.1
	2 季度	604.6	1011.3	-406.8
	3 季度	559.9	914.2	-354.4
	4 季度	710.2	545.7	164.4
2014 年		924.0	3369.4	-2445.5
	1 季度	-1075.5	490.4	-1565.9
	2 季度	684.6	847.2	-162.6
	3 季度	853.3	976.5	-123.2
	4 季度	461.6	1055.3	-593.7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2012 年—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2 年		-0.7	-1.4	-0.5
	1 季度	-0.1	-0.3	-0.3
	2 季度	-0.3	-0.5	-0.3
	3 季度	-0.2	-0.1	-0.2
	4 季度	-0.5	-0.5	0.0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0.2	-0.2	0.2
	2 季度	0.3	0.2	0.0
	3 季度	0.1	0.2	0.3
	4 季度	0.3	0.1	-0.3
2014 年		0.9	1.0	0.7
	1 季度	0.3	0.2	0.2
	2 季度	0.1	0.2	0.2
	3 季度	0.2	0.5	0.2
	4 季度	0.3	0.4	0.2

表 14 2012 年—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4.1	2.5	-0.9
	1 季度	-1.1	0.8	0.0
	2 季度	-1.8	0.9	-0.2
	3 季度	-0.6	0.7	0.3
	4 季度	-1.3	-0.6	-0.9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1.6	-0.8	-0.8
	2 季度	0.1	2.3	1.6
	3 季度	0.5	0.1	1.1
	4 季度	1.0	1.4	0.7
2014 年		0.9	3.7	3.8
	1 季度	0.4	0.4	0.6
	2 季度	-0.5	1.3	1.3
	3 季度	0.0	1.5	1.7
	4 季度	0.4	0.8	0.4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4 年					11.6
	1 月				11.8
	2 月				11.8
	3 月	0.1	-2.20	26.6	11.7
	4 月				11.6
	5 月				11.6
	6 月	-0.3	0.90	49.0	11.6
	7 月				11.6
	8 月				11.5
	9 月	-0.1	-0.46	35.0	11.5
	10 月				11.5
	11 月				11.5
2015 年	12 月	0.21	1.84	19.7	11.3
	1 月				11.2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2012 年—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2 年		-0.7	-1.4	-0.5
	1 季度	-0.2	-1.3	-0.3
	2 季度	-0.5	-1.3	-0.6
	3 季度	-0.7	-1.6	-0.6
	4 季度	-1.0	-1.5	-0.7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1.2	-1.4	-0.2
	2 季度	-0.6	-0.7	0.0
	3 季度	-0.3	-0.4	0.6
	4 季度	0.5	0.2	0.2
2014 年		0.9	1.0	0.7
	1 季度	1.1	0.6	0.6
	2 季度	0.8	0.8	0.6
	3 季度	0.8	1.1	0.7
	4 季度	0.9	1.4	0.8

表 17 2012 年—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4.1	2.5	-0.9
	1 季度	-2.7	2.8	-0.7
	2 季度	-3.9	3.3	-0.8
	3 季度	-4.1	2.8	-1.0
	4 季度	-4.8	1.9	-0.8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5.2	0.2	-1.7
	2 季度	-3.4	1.6	0.0
	3 季度	-2.4	1.0	0.9
	4 季度	0.0	3.0	2.6
2014 年		0.9	3.7	3.8
	1 季度	2.3	3.6	3.7
	2 季度	0.9	3.1	3.7
	3 季度	0.1	4.0	3.9
	4 季度	0.1	4.1	4.0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
月份		%	%		%	%	减进口额
2014 年	19391		2.3	17415		0.1	1976
	1 月	1488	1.2	0.9	1487	1.6	-2.6
	2 月	1544	1.4	3.2	1400	0.0	-0.1
	3 月	1644	-0.7	-1.0	1483	-0.3	2.9
	4 月	1597	0.0	-1.6	1447	-0.4	-2.4
	5 月	1602	0.7	0.4	1455	0.8	0.2
	6 月	1627	-0.5	3.2	1466	0.5	3.2
	7 月	1735	0.4	2.8	1524	0.2	0.9
	8 月	1405	-1.2	-3.2	1320	-2.5	-4.3
	9 月	1724	4.1	8.6	1542	2.4	4.1
	10 月	1806	0.0	4.2	1568	-1.1	-0.1
	11 月	1640	0.5	1.0	1430	-0.3	-1.9
2015 年	12 月	1624	-0.9	8.3	1384	-2.1	1.5
	1 月	1482	-0.9	-0.4	1403	-0.2	-5.6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8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60	642.7	-581.4
	1 月	271	363.0	-92.4
	2 月	-215	-209.5	-5.2
	3 月	-386	-240.3	-146.2
	4 月	-33	153.8	-187.1
	5 月	258	151.5	106.5
	6 月	94	15.2	78.8
	7 月	15	34.1	-18.7
	8 月	150	60.0	90.0
	9 月	111	410.0	-299.0
	10 月	116	107.0	10.0
	11 月	-115	170.0	-285.0
2015 年	12 月	-205	-372.0	167.0
	1 月	72	121.0	-50.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8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

表 22 2012 年—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2 年		1.5	2.0	1.7
	1 季度	3.3	3.7	2.2
	2 季度	3.2	3.0	1.3
	3 季度	-0.2	0.9	1.5
2013 年	4 季度	-0.3	0.7	2.0
		1.6	2.1	1.9
	1 季度	0.5	1.9	1.5
	2 季度	1.4	1.9	2.6
2014 年	3 季度	2.2	2.3	2.0
	4 季度	2.3	2.3	1.5
		0.0	-1.2	0.3
	1 季度	2.4	3.4	0.2
	2 季度	-0.3	-2.8	0.1
	3 季度	-1.4	-3.0	0.3
	4 季度	-0.8	-2.2	0.6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8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2012 年—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2 年		1.5	2.0	1.7	
	1 季度	1.0	0.4	1.5	
	2 季度	-0.5	0.4	-0.6	
	3 季度	-0.7	-0.5	0.4	
	4 季度	-0.1	0.5	0.7	
2013 年		1.6	2.1	1.9	
	1 季度	1.4	1.3	0.8	
	2 季度	0.8	0.8	0.6	
	3 季度	0.4	0.3	-0.1	
	4 季度	-0.3	-0.2	0.1	
2014 年		0.0	-1.2	0.3	
	1 季度	1.3	2.2	-0.3	
	2 季度	-1.6	-5.0	0.4	
	3 季度	-0.7	0.3	0.2	
	4 季度	0.4	0.5	0.3	

表 21 2012 年—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3.4	-0.2	5.3	
	1 季度	-0.1	2.9	2.0	
	2 季度	0.5	-0.5	1.8	
	3 季度	-1.0	-4.0	-0.8	
	4 季度	-0.6	-3.2	-2.0	
2013 年		3.2	1.5	3.1	
	1 季度	0.5	4.3	1.4	
	2 季度	2.4	3.1	2.3	
	3 季度	2.2	-0.5	1.8	
	4 季度	1.3	-0.2	3.0	
2014 年		2.6	8.2	7.2	
	1 季度	3.6	6.5	6.9	
	2 季度	-4.5	-0.3	-5.3	
	3 季度	-0.6	1.5	1.0	
	4 季度	0.0	2.8	1.3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2014 年 2 月—2015 年 2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	%		%	%	口额
2014 年	731052		4.8	858865		5.7	-127813
2 月	60551	5.3	9.8	71270	-6.4	9.0	-10719
3 月	58696	-3.1	1.8	76824	7.8	18.2	-18128
4 月	59290	1.0	5.1	67919	-11.6	3.4	-8629
5 月	57961	-2.2	-2.7	66238	-2.5	-3.5	-8277
6 月	59475	2.6	-1.9	69564	5.0	8.5	-10089
7 月	60269	1.3	3.9	70352	1.1	2.4	-10083
8 月	60343	0.1	-1.3	69400	-1.4	-1.4	-9057
9 月	62441	3.5	6.9	73300	5.6	6.2	-10858
10 月	63718	2.0	9.6	72316	-1.3	3.1	-8598
11 月	64254	0.8	4.9	72981	0.9	-1.7	-8727
12 月	65637	2.2	12.9	72189	-1.1	1.9	-6552
2015 年							
1 月	66974	2.0	17.0	71098	-1.5	-9.0	-4123
2 月	62276	-7.0	2.4	68663	-3.4	-3.6	-6388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10196	125929	-115733
	1 月	1420	12604	-11184
	2 月	-1984	6528	-8512
	3 月	4231	7239	-3008
	4 月	-1349	20383	-21732
	5 月	474	7517	-7043
	6 月	2552	7000	-4448
	7 月	-824	8075	-8899
	8 月	122	6255	-6133
	9 月	2908	7047	-4139
	10 月	-1394	15159	-16553
	11 月	321	14552	-14231
	12 月	3720	13570	-9850
2015 年				
	1 月	-329	11901	-12230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2012 年—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2 年		1.4	0.1	2.5	1.0	4.8	3.4
	1 季度	0.8	0.6	2.7	0.8	6.0	4.8
	2 季度	1.6	0.0	2.9	0.6	4.5	4.3
	3 季度	0.8	0.2	2.2	1.0	4.6	3.0
	4 季度	0.9	0.2	2.1	1.8	4.4	2.0
2013 年		2.0	1.7	2.2	2.7	6.9	1.3
	1 季度	3.2	0.8	1.8	2.8		0.8
	2 季度	2.0	1.7	2.2	3.9	7.0	1.0
	3 季度	2.7	1.6	1.8	2.4	7.5	1.3
	4 季度	2.9	2.4	2.9	2.1	6.4	2.0
2014 年		2.5	2.6	1.5	0.1	7.4	
	1 季度	1.0	2.5	1.9	2.7		0.9
	2 季度	3.8	2.6	1.3	-1.2	6.5	0.8
	3 季度	3.2	2.5	1.6	-0.6	8.2	0.7
	4 季度	2.4	2.7	1.3	-0.3	7.5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2012 年—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2 年		2.3	4.0	1.5	1.5	5.6	6.2
	1 季度	2.8	4.8	0.7	0.5	5.1	6.3
	2 季度	2.4	4.4	0.9	0.1	5.6	6.4
	3 季度	2.1	3.2	1.6	1.4	5.3	6.2
	4 季度	2.1	3.4	2.9	3.8	6.5	6.1
2013 年		3.0	1.4	2.9	2.2	4.7	5.6
	1 季度	2.1	1.0	2.9	1.4	4.2	5.6
	2 季度	2.7	1.8	3.0	2.6	4.5	5.6
	3 季度	3.4	1.6	3.0	1.5	5.0	5.5
	4 季度	3.7	1.1	2.9	3.4	5.1	5.6
2014 年		3.3	2.1	2.3	3.7	6.0	5.0
	1 季度	3.9	2.0	2.6	3.4	6.2	5.2
	2 季度	3.5	1.6	1.8	3.9	6.5	5.1
	3 季度	3.2	2.2	2.7	4.3	5.6	5.0
	4 季度	2.7	2.6	2.2	3.3	5.8	5.0

表 29 2014 年 2 月—2015 年 2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4 年		6.9	6.2	4.8	5.2	25.1
	2 月	7.0	6.9	5.1	5.6	
	3 月	6.9	6.8	5.0	5.4	25.2
	4 月	6.9	6.6	4.9	5.3	
	5 月	7.0	6.5	4.9	4.9	
	6 月	7.0	6.4	4.8	4.9	25.5
	7 月	7.0	6.2	4.9	4.9	
	8 月	7.0	6.0	5.0	4.8	
	9 月	6.9	6.0	4.9	4.9	25.4
	10 月	6.6	6.0	4.7	5.1	
	11 月	6.7	5.8	4.8	5.2	
	12 月	6.7	5.7	4.3	5.3	24.3
2015 年						
	1 月	6.6	5.7	5.3	5.5	
	2 月	6.8		5.9	5.8	

表 30 2014 年 2 月—2015 年 2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4 年		3.5	4.5	3.2	4.0	2.9
	2 月	3.9	4.6	3.1	4.2	3.2
	3 月	3.5	4.8	3.1	4.2	3.0
	4 月	3.7	4.9	3.1	3.9	2.9
	5 月	3.7	4.9	3.1	3.9	2.9
	6 月	3.6	4.8	3.2	3.9	2.8
	7 月	3.4	5.5	3.3	4.0	2.8
	8 月	3.5	5.2	3.3	4.1	2.7
	9 月	3.5	5.1	3.3	4.0	2.7
	10 月	3.5	4.8	3.3	4.0	2.7
	11 月	3.4	4.5	3.3	3.9	2.7
	12 月	3.5	3.8	3.3	3.8	3.0
2015 年						
	1 月	3.4	4.5	3.3	3.8	3.1
	2 月	3.9	4.3	3.3	3.7	

注:1.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表 31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表 34 2014 年 2 月—2015 年 2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4742.1	4624.8	117.3	5061.2	6823.8	-1762.6	2014 年	5736.9	5369.6	367.3	3975.3	4056.1	-80.8
1 月	368.3	346.2	22.2	437.6	567.5	-129.9	2 月	429.1	420.6	8.5	304.6	304.2	0.5
2 月	356.5	348.0	8.5	431.7	529.7	-98.0	3 月	490.7	455.6	35.1	332.4	332.2	0.2
3 月	409.5	388.9	20.6	448.7	576.3	-127.6	4 月	502.7	458.7	44.0	340.7	345.7	-5.0
4 月	389.0	396.1	-7.1	402.7	566.2	-163.5	5 月	475.8	426.1	49.8	343.8	352.6	-8.8
5 月	412.9	408.6	4.3	429.2	572.8	-143.6	6 月	478.3	424.8	53.6	334.7	340.0	-5.3
6 月	415.3	402.8	12.5	415.8	577.3	-161.5	7 月	482.1	458.6	23.4	337.1	346.9	-9.8
7 月	397.6	384.7	12.8	426.9	647.2	-220.3	8 月	462.3	428.7	33.7	333.6	344.8	-11.2
8 月	393.9	398.5	-4.6	355.5	533.5	-177.9	9 月	477.5	443.2	34.3	342.6	336.7	5.9
9 月	416.9	398.6	18.3	426.9	589.5	-162.5	10 月	516.4	552.6	-36.2	370.9	369.4	1.4
10 月	417.0	416.1	0.9	437.0	591.9	-154.8	11 月	468.9	413.8	55.1	323.3	334.1	-10.8
11 月	373.8	370.8	3.0	452.3	434.0	18.4	12 月	497.4	439.6	57.8	341.1	338.6	2.5
12 月	391.5	365.6	25.9	396.9	438.1	-41.2	2015 年						
2015 年							1 月	453.7	398.4	55.3	265.7	298.2	-32.5
1 月	342.8	333.2	9.6	347.8	503.4	-155.6	2 月	414.6	338.0	76.6	296.8	291.2	5.6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5 2014 年 2 月—2015 年 2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910.5	998.9	-88.4	2251.0	2334.3	-83.3	2014 年	5241.3	6007.7	-766.3	3138.4	2742.3	396.1
2 月	75.5	74.7	0.8	159.3	188.9	-29.6	2 月	328.7	414.3	-85.6	212.8	197.2	15.6
3 月	73.9	85.0	-11.1	176.3	183.5	-7.2	3 月	439.3	514.6	-75.3	277.4	258.0	19.4
4 月	73.4	85.6	-12.2	197.2	201.1	-3.9	4 月	408.1	483.5	-75.4	266.0	240.6	25.4
5 月	74.6	81.4	-6.9	207.5	209.4	-1.9	5 月	428.1	486.4	-58.3	266.6	213.8	52.8
6 月	75.4	75.4	0.0	204.7	181.0	23.7	6 月	426.6	486.5	-59.9	267.9	249.2	18.8
7 月	79.9	86.2	-6.3	230.2	214.5	15.7	7 月	442.9	494.9	-52.0	267.5	241.6	25.9
8 月	71.9	87.8	-15.8	204.6	193.0	11.6	8 月	442.1	478.3	-36.2	280.9	240.0	40.9
9 月	82.0	85.3	-3.3	196.2	205.6	-9.4	9 月	471.3	527.2	-56.0	264.3	229.3	35.0
10 月	79.8	99.7	-19.9	183.3	195.1	-11.8	10 月	477.4	534.0	-56.6	269.0	222.8	46.2
11 月	75.8	80.5	-4.7	156.5	180.0	-23.5	11 月	484.8	545.2	-60.3	266.8	224.6	42.2
12 月	76.2	70.3	5.8	174.9	172.0	2.9	12 月	455.0	537.0	-82.0	256.5	212.0	44.5
2015 年							2015 年						
1 月	58.0	78.9	-20.9	137.0	168.8	-31.7	1 月	438.0	484.2	-46.2	251.2	203.2	48.0
2 月				120.9	149.3	-28.4	2 月	327.8	380.1	-52.2	198.6	153.0	45.6
表 33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表 36 2014 年 2 月—2015 年 2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3173.1	4603.8	-1430.7	4966.6	3080.0	1886.6	2014 年	2341.4	2088.7	252.7	1762.9	1781.8	-18.9
1 月	268.1	363.1	-95.0	396.5	209.8	186.7	2 月	178.1	146.5	31.6	146.3	137.9	8.4
2 月	253.0	334.9	-81.9	364.6	240.3	124.3	3 月	197.9	168.9	29.0	151.9	145.2	6.7
3 月	290.8	395.4	-104.6	470.6	274.3	196.3	4 月	203.3	176.5	26.8	142.9	162.6	-19.6
4 月	237.3	358.5	-121.2	476.8	276.9	200.0	5 月	200.8	183.3	17.5	148.2	147.7	0.5
5 月	274.2	394.5	-120.3	441.0	260.9	180.1	6 月	190.2	177.5	12.8	154.1	157.0	-2.9
6 月	261.4	384.9	-123.5	406.4	267.4	139.0	7 月	191.9	180.5	11.4	141.2	140.8	0.4
7 月	267.9	401.4	-133.5	462.1	291.8	170.2	8 月	201.0	188.8	12.2	144.8	147.9	-3.1
8 月	264.9	375.1	-110.2	414.7	252.6	162.2	9 月	200.5	171.5	29.0	152.8	155.5	-2.7
9 月	282.6	430.1	-147.4	381.1	259.6	121.5	10 月	199.0	195.5	3.5	153.5	153.3	0.2
10 月	254.9	393.6	-138.7	411.4	269.2	142.2	11 月	190.6	157.3	33.3	136.2	140.4	-4.3
11 月	264.2	424.1	-160.0	366.6	233.0	133.6	12 月	194.5	168.0	26.5	146.2	144.4	1.9
12 月	254.0	348.3	-94.4	376.1	246.8	129.3	2015 年						
2015 年							1 月	177.5	152.4	25.1	133.6	126.1	7.4
1 月	238.8	322.1	-83.2	275.1	124.6	150.5	2 月				122.9	115.5	7.4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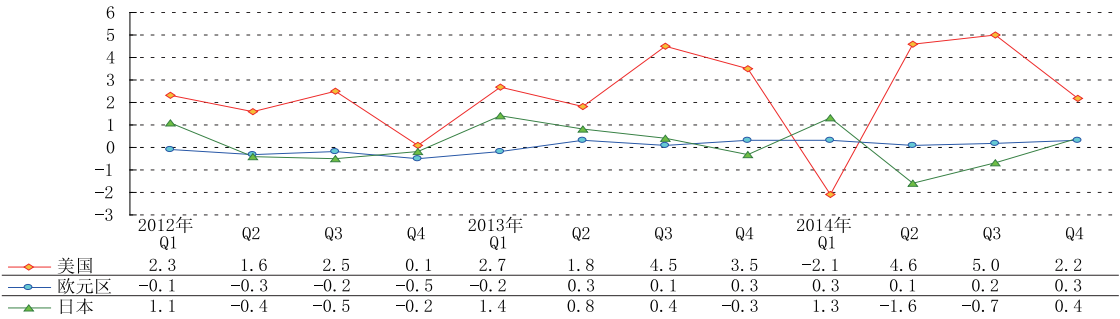


图 1 2012 年—2014 年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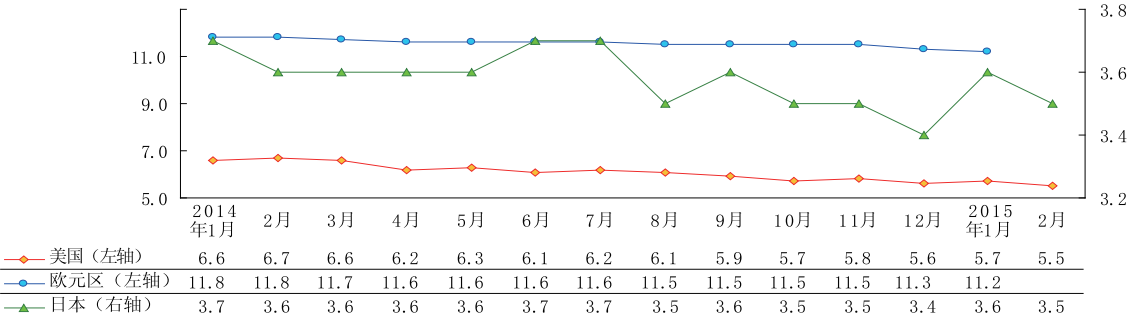


图 2 2014 年 1 月—2015 年 2 月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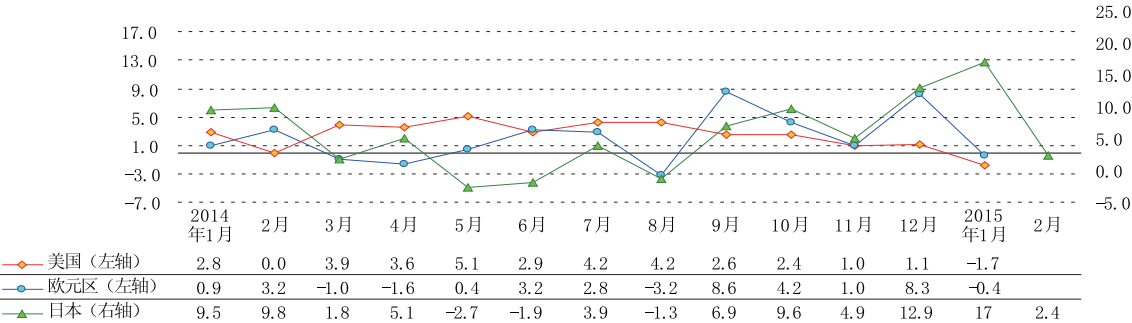


图 3 2014 年 1 月—2015 年 2 月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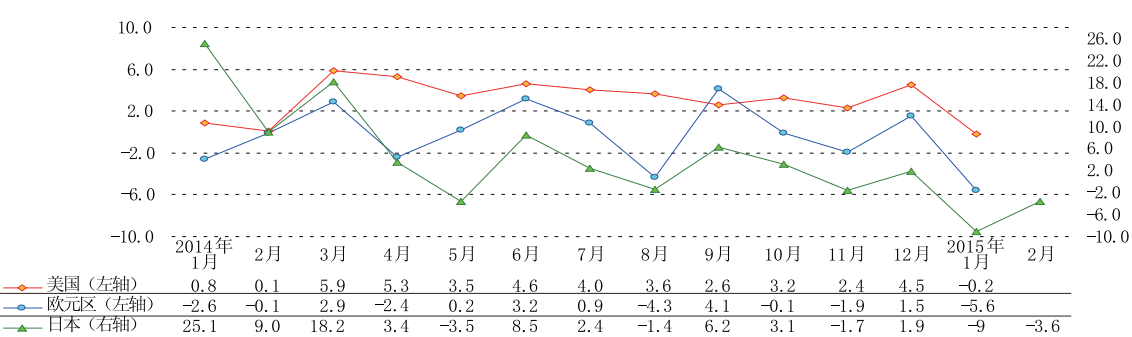


图 4 2014 年 1 月—2015 年 2 月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责任编辑：李 蕊

ABSTRACTS

(1)Innovative Design and Created in China

Lu Yongxiang

The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romoted by design innovation in the industrial era, elabo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ve design in the knowledge network times, that is,3.0 design age,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innovative design leading “made in China” to “created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China’s innovative design capability.

(2)On the 10 Key Issues concern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Yang Weimin

The 13th Five – year plan is not only a plan to wrap up the first hundred – year goal, but also a plan leading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the voyage for the second 35 – year development.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13th Five – year plan must answer the 10 issues such as how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comprehensively, how to maintain stable economic growth, how to improve the income of residents, especially low – income groups, how to reform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 how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how to promote in – depth 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how to advanc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how to optimiz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ow to expand the opening –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3)Analysis on Deflationary Pressure and Countermeasures

Li Deshui

Currently, the expectation of deflation from market has increased, but we still cannot say China has appeared evident deflation. It is notable tha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PPI) is too sluggish. Willpower should be enhanced, and the pressure must be changed into the powerful motive for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the period of time with relatively large deflationary and economic downward pressure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actively adapt to and positively lead the new economic normal, adhere to the problem – oriented mindset, spare no efforts to develop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rectify and standardize the financial order to make better financial services for the real economy, objectively judge and correctly guide deflation expectation.

(4)Strategic Thinking on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nd Actual Utilization

Chen Bingcai, Tian Qing, Chen Anguo, Zheng Hui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re the symbol of one country’s economic strength and status, and the more one country reserves, the greater strategic role it can play.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re assets that country can use at any moment. The safe way of protecting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is investment in real economy.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should be used to increase production capacity so as to increase the world’s supply;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should be adjusted and the proportion of investment in real economy should be expanded. Regarding with investment in real economy, the area of agriculture and new technologies, and overseas investmen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can also be used to push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we should gradually get rid of the dependence on the US dollar clearing system; liquidity demand and investment demand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and the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funds can be directly allocated to the policy banks or commercial banks undertaking policy – oriented projects. Th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in the form of direct investment should be flexible and varied.

(5) Deflation Debate and Positive Analysis

Huang Zhiling

Persistent deflation can severely strike the economy. The paper reviews the academic methods under dispute regarding deflation, discusses that the current hot economic issues facing the world is deflation, puts forward that the current major risks facing various countries worldwide is the risk of deflation. Through positive analysi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China is now faced with the risk of deflation, then presents the proposal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hina's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accurately judge currency supply and demand condition, be more prudent when adopting the deleveraging measures in the deflationary period; measures for the sake of dealing with deflation should be taken wit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deflation levels should be predicted with methods such as big data,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rudent monetary policy and loose fiscal policy can be used, so as to guide social investment and consumer behavior.

(6) Analysis and Outlook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

Liu Xiangfeng

China's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 in 2014 tends to be balanced basically,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negative investment income and structural risk of foreign exchange. The paper also gives the prospect of fluctua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 account and China could be faced with pressure of capital outflow due to global economy growth differentiation, world financial turbulence and national economy growth deceleration.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attain the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s, China government shoul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 accelerate process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n short – term capital flows across borders, and reform 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system.

(7) New trends in Services Produc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Value Chains

Bai Jinfu, Liu Zhongwei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es' cross – border transfe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services production network poses profound impact on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system of the East Asian region.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rvices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worldwide transfer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particular knowledge – intensive services, as well as the adjustment demand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ayout within economies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gradually formed services production network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East Asian region. The paper, through studying the impact of in – depth integr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services production network, analyses and reflects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services produc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and studies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rade in services, and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governance mechanisms.

(8) Vigorously Develop Mixed Ownership for the Response to “Competitive Neutrality” Rules

Feng Lei, Tang Jing

“competitive neutrality” rules under the TPP framework challenges the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Es. The definition of SOEs provides important space for the great powers' game under the 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s, China's SOEs are the potential targets of “competitive neutrality” rules, which will bring big shock toward China's SOEs' ownership structure. Learns can be taken from Western countries that SOEs should be classified and governed

through legislation. 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SOEs' reform of diversified classification of ownership structure, enhanc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 of decision making, redefine the connotation of "competitive neutrality" in bilateral and pluri-lateral FTA, create more space for SOEs' mixed ownership reform.

(9) Review on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itial Stage Outlook of New Normal

Wang Guanqun

In recent years, the level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ncreases ceaselessly, especially in 2014, a number of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achieved, but the overall level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still at the early stage.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new normal, related work is still arduous. Looking ahead to 2015,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determines that China's promotion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should base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ree overlay", vigorously advance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match up and make full use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ontinue to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positively capture the new opportunities provide by US economic recovery,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energy and mineral price volatility, glob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changes in the world political landscape, consolidate the basic work concerning the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satisfy, release and create international demand on RMB, prevent and resolve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isk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ctively and steadily consolidate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10) On the Collabor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Smart City and Energy Saving Industries

Wu Weihai, Guo Huiwen

Based on the globalized environment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China Dream", the paper, starting from background analyses of collabor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smart city and energy saving industries such as research background, basic concepts, origins and characteristics, trend analyses,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smart city and energy saving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ssociation study and collaborative model respectively. By studying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smart cities' construction, industry trends and the three defects, the paper analyzes 6 problems or obstacles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smart city and energy saving industries in Beijing, Shanghai, Wuxi, Guangzhou, Chongqing and other cities; with case study concerning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defects among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smart city and energy saving industries are analyzed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models between smart city and energy saving industries are build, and coordination strategies and policy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so as to promote Chinese smart cities to develop on the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oad, the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level and extent of wisdom of energy saving industry in China.

(11) On the Path to Eliminate the Western misreading on Chinese la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comparative law research

Gu Huaxiang

The civilization degree of rule of law and the completion extent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every country are the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the ruling parties, the vitality of stat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image. Serious deviation of traditional Western viewpoints toward the Chinese legal status will exist throughou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hich must be fully realized. It must be aware that the cases adopted by western society when studying Chinese laws are very limited, and in-depth analysis always lacked. We should have enough patience and sustained action force to eliminate the confirmed habits of misreading Chinese laws by western society. We should be open-minded and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iminating misreading from western society, and learning from and maintaining exchanges with western society. We should spare no efforts to gather broad social consensus and work together to optimiz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cro-environment for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and build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Editor: Guo Zhouming

“铁的新四军” 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 征稿通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深切缅怀新四军革命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砥柱中流，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伟大胜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同时昭展丹青名家并推书画新秀；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等 8 家单位发起“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活动，参展作品将在全国范围征集，经活动艺委会评选后的 320 幅优秀作品于 2015 年 5 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首展，之后在相关省市巡展并筹台海联展。同时活动中的部分甄选作品将捐由各大博物馆、纪念馆收藏，永世纪念、教育后人。我们诚邀全国画坛诸位艺术家与各界贤达加盟本次展览。

一、组织机构

(一) 组委会

主 任：欧阳淞 蔡 武 陈昊苏

副主任：李忠杰 杨志今 左中一 王占生 邓淮生 薛德堂 毋瞩远 黄如军

委 员：张永新 张光东 韩铁成 桂建平 叶小楠 何光耀 乔泰阳 张淮流

刘延淮 周善平 赵黎明 邓小燕 张末生 彭 华 吴长江 赵长青

葛 华 颜 宁 张士明

(二) 主办单位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 中组部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中国海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 承办单位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四师淮北分会

中海外爱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四) 协办单位

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区）美协及新四军研究会

(五) 军史专家委员会

寿小松 黄如军 耿成宽 徐维国 王传厚 张学忠 徐君华

(六) 艺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大为

主 任：吴长江 副主任：徐 里 杜 军 秘书长：丁 杰

二、展出日期、地点

2015 年 5 月（拟定），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展出规模

本次展览展出美术、书法作品 320 余幅，其中特邀美术名家名作百余幅，全国征稿入选优秀作品 100 件，同书法作品共同展出。评选委员会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聘请专家组成。

四、作者待遇

1. 该展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作者具备申请加入中国美协会会员的一次条件。
2. 优秀作品 100 件（税前收藏费：中国画作品 50 件；15000 元/件。油画作品 50 件；25000 元/件）。
3. 画展将出版画册，每位参展作者均可获赠一本。
4. 组委会向参展作者颁发证书。

五、参展要求

1. 参展作者需提供送展作品照片 1 张（10 寸以上）参加初评，照片注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初评入围者接到电话通知后邮寄原作（送原件地址另行通知），同时通过邮局汇寄 150 元评选费进行终评，初评未入围作者不另行通知，照片不退。终评落选作品退件。

2. 参展作品一律为原始真实创作，如检测后发现作者使用高仿作品参评，中国美术家协会将在三年内拒绝此作者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任何展览活动。

3. 初评投递作品照片，相同作品照片如反复多次投递，中国美术家协会将视为无效稿件取消参评资格。

4. 送件要求：中国画幅尺寸不小于 6 尺整张，横竖不限；油画画芯尺寸：不小于 1 米×1 米。送件作品背面右下角请用铅笔写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和画面相同）、尺寸（高×宽 CM）、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送件须妥善包装并挂号或特快专递邮寄，防止邮寄中破损遗失。

5. 联系方式。收件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一号院 32 号楼 A 座 710，邮编：100083；收件人：张英财；联系电话：(010) 59759683。画展信息可登录 www.caanet.org.cn（中国美术家协会网站）查看。

六、特别声明

1. 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对参展作品有展览、研究、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权。
2. 凡送作品参评、参展作者，应视为已确认并遵守征稿启事的各项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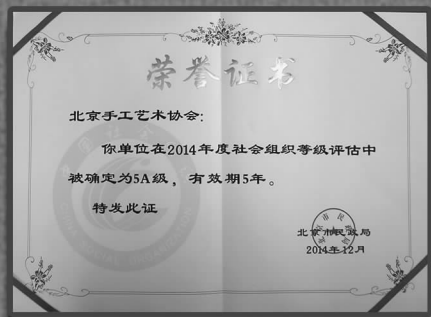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3 年 12 月



北京手工藝術協會
BEIJING CRAFTS COUNCIL

北京手工艺术协会（英文译名：
BEIJING CRAFTS COUNCIL，缩写：BCC）
是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并被评为5A级
的社会组织。协会是由手工艺术工作者
及相关机构自愿组织建立，是中国大陆
唯一手工艺术行业组织，协会受各地方
业内人士委托组织全国各类活动，并邀
请全国手工艺术领域专家共同撰写、制
定手工艺术师职业资格认证标准，于
2012年6月获得人社部全国新职业实
验基地批准，对手工艺术职业人员进行
培训、考试、认证，使这个古老的新职
业有了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和认证，手工
艺术师职业称谓在中国首次被国家认可
承认。



协会成立后，首批中国手工艺术师
已经获得认证，与中国文化管理协会茶
文化研究中心、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
北京艺术馆、全国政协文史馆等机构举
办多次全国性学术交流和展览活动。同
时，协会开展的“手工艺术惠民工程”
得到了主管部门和社会的高度好评。

协会与科研单位合作研究开发了手
工艺术作品全信息认证系统，并对纯手
工艺术作品开始鉴证鉴定。



本协会业务范围：

● 举办手工艺术领域的国内外交
流、推广、宣传以及手工艺术市场咨询
服务等相关活动。

● 通过会刊、期刊、网站等媒体
发表和传播国内手工艺术传承与创新的
研究成果及成功经验，同时定期发布国
内、国际手工艺术领域的动态及行情。

● 举办各类手工艺术讲座（论坛）
及手工艺术相关培训活动。

● 承接政府、机构或个人委托的
手工领域中的管理、推广、宣传、策
划、科研课题、调研等活动。

● 手工艺术及相关领域的文化遗
产研究、指导等相关工作。

● 组织对手工艺术作品进行鉴证。

● 策划、组织、参与国内外手工
艺术行业的展览展示活动。

● 邀请国外手工艺术领域相关人
士交流访问。

● 编辑出版、制作手工艺术领域
的图书、刊物和音像资料。

● 手工艺术行业相关标准的制定
与实施。

● 组织手工艺术师国家职业资格
评定。

● 它与手工艺术领域相关的各项
活动。



北京手工艺术协会

联系方式：010-57793594

邮箱：shouxieguanyou@sina.com

网站：www.bjcraftscouncil.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大街鲜鱼口86号